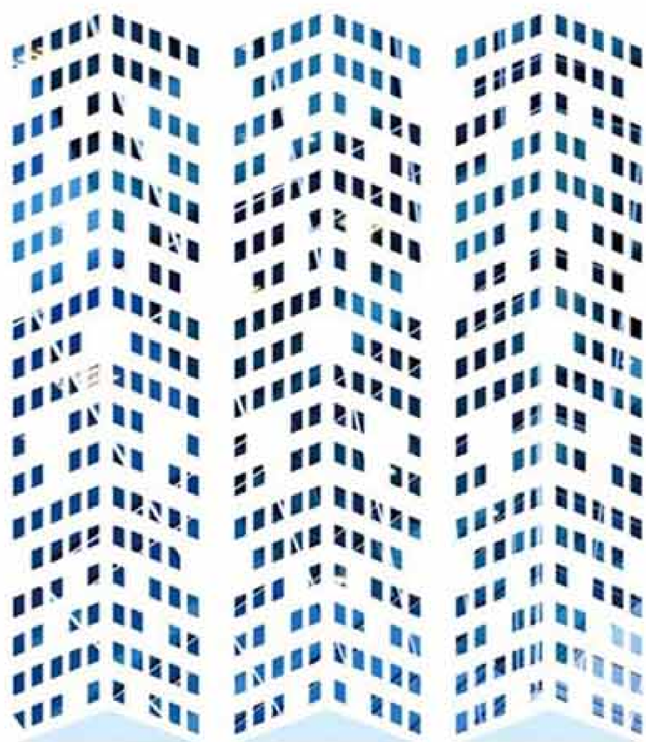
颠覆世界的城市化



陈功 著



URBANIZATION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颠覆世界的城市化

作者:陈功

ISBN:9787508658599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前言

究竟是谁制造了现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是隐藏在某个角落的金融天才，还是某些国家的政府？资本泡沫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吗？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是周期性的吗？产能过剩是怎么形成的？什么因素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如何理解这些频繁发生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

这本源自一份研究报告的小书尝试性地解答了这些问题。你可能同意这里的观点，也可能不同意。这显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关键是这本小书，开创了一个领域，从一个人们颇为陌生的角度解读了城市化是造成资本过剩的根源；也阐述了事情的机理和原因，让我们了解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城市化的关系。同时这本小书还创设了一个“危机三角”的理论模型，可以方便地解释城市化所导致的种种非理性现象。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并非是在追求学科框架下的论证，吸引我的是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是如此多姿多彩，在魔幻般的亮丽外表之下却又隐藏着如此之多的灾难动因：惊人的城市化速度、货币的滥发、资本的扩张、对自然界的掠夺，无止境的人类欲望……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需要加以归纳和理解，而这就是我努力要做的事情。

我相信世界不应该是这样：永无止境地放纵自己的本能，用各种“进步”的理由去掠夺自然界的宝贵资源，甚至再用各种各样出色的“理论”加以修饰。有时，我们应该安静下来倾听一下舞台幕布另一

面的声音。因为这样的声音，也许可以让众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反思世界以及它的未来。

请您耐心把这本书读完。

谢谢！

陈功

2015年9月1日星期二

于北京

序

威尼斯。

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的首府，威尼斯省的省会。

威尼斯这个城市的风情永远离不开水，蜿蜒曲折的水巷，流动的清波，让这座城市好像是一个漂浮在碧波上的浪漫之梦，诗情画意久久挥之不去。威尼斯还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林立，往往不经意间，一座座隐藏在小巷深处的博物馆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在这些博物馆中，威尼斯学院美术馆以存有一幅世界名作而闻名，这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在1487年前后创作的世界著名素描《维特鲁威人》。

对非专业的游客来说，《维特鲁威人》展示的是一个男人的完美体形。这是许多人熟悉的一幅画面：一个裸体的健壮中年男子，两臂微斜上举，两腿叉开，以他的头、足和手指各为端点，正好外接一个圆形。同时在画中清楚可见叠着另一幅图像：男子两臂平伸站立，以他的头、足和手指各为端点，正好外接一个正方形。这是《维特鲁威人》画作给全世界游客留下的印象，但对城市研究学者来说，《维特鲁威人》所展示的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学术含义了。

达·芬奇描绘的是他之前1500年古罗马杰出的建筑家维特鲁威（Vitruvius），这位著名的古罗马的城市建筑家有一本传奇性的著作《建筑十书》，他在书中盛赞完美的人体比例和黄金分割。而古罗马建筑之所以拥有传世的雄奇壮美，与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使用人体的几何比例作为建筑模数基础有关，这样的比例模数，可以让建筑的高度

和比例与人体真正融为一体，互为映衬。现在英语语言中依然有“英尺”（foot）一词，它其实就起源于古罗马，因为古罗马就是利用人体的“足”来作为度量单位的。所以，达·芬奇描绘的是几何与比例，反映的是古罗马城市的基础和模式。㊟

人类对于城市的追求，源远流长。

《建筑十书》的写作年代，正处于“罗马和平”时代的开端时期，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雄心勃勃，要将罗马建设成一座大理石的城市。㊟这位罗马皇帝要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著名的“七丘城”罗马，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四散分布的草棚屋。《建筑十书》用这样的文字，记载着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 罗马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营建活动集中于两个区域：一是马尔斯广场的开阔地带，二是建筑密集的古老集市广场。这些营建活动，主要是由共和国最后数十年中的主要政治对手及其党羽所发起的，他们是庞培、恺撒、屋大维、阿格里帕，较次要的还有安东尼……与罗马老城区相反，这些纪念性建筑构成了一座辉煌的新城，震撼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斯特拉博（Strabo）在公元前9年至前6年写道：“实际上，庞培、神圣的恺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妻儿朋友及姐妹，对于城市建筑的热情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并为此耗费了钱财。大多数建筑集中于马尔斯广场，因此，除了广场的自然之美外，远远望去更是令人惊叹不已。”
>
> 另一位研究罗马的现代学者彼得·琼斯在《罗马帝国档案》一书中同样也指出：奥古斯都以及罗马皇帝非常清楚公共工程、纪念建筑（无论是世俗还是宗教性质的）在统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修建这些工程不仅可以加强人们对罗马国家的认同，还可以凝聚人心，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民众对罗马的印象。……在罗

> 马，有抱负的显贵、政要都将大量的金钱花在公共工程上，为公众谋福利不仅是分内的职责，对他们的政治前途也颇有裨益。

古代社会，通常财富的来源只有两种：农业与矿产。但这两种财富的产出方式，无论是依赖开山取石，还是依靠天气造化，均极为不易，于是战争和抢掠就成为古代人最常用的致富方式，而且成效非常明显[注]。

早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中期，罗马就占据了2007平方公里的土地，比现在的伦敦市还要大；而到了公元前280年，罗马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的数字迅速增长到15280平方公里。在60年的时间里，罗马人的土地空间增长了7倍。而罗马人每当占领了新的土地，立即就开始移居大量的人口，大兴土木，营造城市。这样的情况在罗马人占领西班牙的时候达到极致，那里有富饶的银矿和铁矿，高峰时有4万名奴隶同时在矿场工作，产出银子的数量，每天高达5.08吨。而这一时期银矿渣所造成的污染也达到耸人听闻的程度，一直到19世纪至20世纪，现代人的污染能力才超过了当时的古罗马人[注]。

城市是金钱铺就的辉煌。

中国的城市，情况也差不多。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样的城市规划思想，代表着当时中国城市规模的宏大，城市建造所耗费的金钱可想而知。

对于城市规模的追求，古今皆然，中外皆然。

问题在于，无论何朝何代，建造城市总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古罗马时代的造城，往往基于战场上缴获的数量惊人的财富；现代社会的

造城，则通过世界金融体系塑造的资本。在城市发展史上，资本与城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城市因为资本而显得无比壮美，但除此之外，资本还会为我们带来和留下什么？这些都是具有深刻影响力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城市化，涉及经济增长，涉及各种各样的市场，也涉及发展经济学。在最终形成一套贯穿始终，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各种危机的逻辑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有关。公元前30年，维特鲁威在所撰写的《建筑十书》中，明确要求城市的建造者们必须要精通哲学，以便理解城市的意义。这样的要求放到当今却颇显讽刺意味，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处理城市与自然界的关系之际，恰恰忘记了哲学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

1. .陈功：《跟着维特鲁威去看古罗马建筑》，发表自《金融读书会》以及众多刊物和媒体，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14904.html。
2. [古罗马]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序言部分，I.D.罗兰英译，陈平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英]彼得·琼斯：《罗马帝国档案》，孙逸凡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
4. 科学家在里奥庭托（Rio Tinto）发现了670万吨古罗马人遗弃的银矿渣，而对格陵兰冰芯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科学家们认为，矿渣是一种极为污染环境的有毒污染物，它是自然界的一种重要污染源，可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污染土壤和水源。——作者注

第一篇
资本爆炸的时代

> 世界各国大搞“量化宽松”的结果是，2008年8月至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了341%，英国央行的扩大了314%，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安倍上台后迅速膨胀，和危机前相比扩大了145%，而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则刚刚开启。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向世界经济体释放出了无与伦比的资本规模……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原来资本不仅仅是钱，也是一股强劲的祸水。

法兰克福，2015年3月10日。

欧洲央行的一位执行董事会成员伯努瓦·克雷高兴地宣布，欧洲央行的大规模债券购买计划“开局良好”，欧洲央行和19个欧元区国家的央行总共购买了32亿欧元的债券。正如克雷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欧洲版的QE（量化宽松）计划”，而目前看来，欧洲央行正在实现其每月购买价值600亿欧元的公共及私人部门债券目标。

欧洲大陆不是第一个推出QE计划刺激经济的地区，欧洲人远比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谨慎，为了推出欧洲版的QE计划，欧洲各国做出了“很长时间的努力”，该计划被认为是欧洲央行对抗通缩的“终极武器”。欧洲的新闻界兴奋地评论称，欧洲为刺激经济复苏而采取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终于“达到了最高潮”[注]。

与欧洲的谨慎不同，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早就先行一步，采用过QE计划刺激经济。

QE计划的全称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指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通过大量印钞、购买国债或企业债券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旨在降低市场利率，刺激停步不前的经济增长。该政策通常是在常规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无效的情况下才被货币当局采用，即存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所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首次公布将购买机构债和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标志着首轮量化宽松政策（QE1）的开始。美联储宣布，将购买政府支持企业（GSE）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还将购买由两房、联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innie Mae）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从2008年11月至2010年3月，美联储总共投入了1.725万亿美元，这就是第一轮QE，世界各国的市场一般将之称为是QE1。

自2010年4月以来，美国经济数据的表现依旧令人失望，步履蹒跚的复苏迫使美联储需要推出另一次的量化宽松，即第二次量化宽松（QE2）。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0年8月在美联储官员的聚会中为第二次量化宽松打开了大门，但他同时谨慎地指出，量化宽松不是一个成熟的补救办法。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量化宽松政策。此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将再次实施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这次美联储将增发货币购买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每个月购买额为750亿，直到2011年第二季度。这就是QE2，即所谓美联储的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QE2的目的是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压低长期利率，借此提振美国经济，特别是避免通货紧缩，并试图降低当时高达9.6%的失业率。

2012年12月13日，美联储宣布推出强化版QE3，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以替代市场扭曲操作[注]，加上QE3每月400亿美元的宽松额度，美联储每月的资产采购额将达到850亿美元。此外，美联储还保持了零利率的政策，把利率保持在0%到0.25%的极低水平。

美联储总共先后宣布了三轮的量化宽松QE计划，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本，直到2013年12月，美联储才宣布将缩减购债规模，但同时还试图安抚市场，暗示其指标利率保持在低位的时间甚至可能长于其先前的承诺。事实上，直到2014年10月29日，美联储才在议息会议中，由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宣布结束购债，标志着第三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面结束，至此美联储总共向市场支付了4万亿美元的资本。

同样是量化宽松政策，英国央行走的QE路线，表面看更低调和稳妥，但实际上，在搞量化宽松方面，英国央行绝对称得上与美联储步调一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央行就开始酝酿资产购买计划，避免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到2009年9月，英国央行已经购买了超过1650亿英镑的资产，包括国债和相对高质量的私人机构债券，一年之后总购买量又增加了100亿英镑。在此后的几年间，英国央行不断祭出新的QE计划，购买资产以国债为主，直到2012年下半年。此后，随着“经济形势好转”，英国央行才决定在接下去的两年内维持国债购买的总体规模以及利率不变。目前，英国的QE整体规模仍然维持在3750亿英镑，基准利率保持在0.5%。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在2008年华尔街泡沫破裂之后搞量化宽松不同，日本央行因为经济十几年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所以始终就在搞所谓的“量化宽松”，只不过在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看到其他国家也在力推QE，所以安倍内阁的胆量和力度空前放大。这一时期，日本央行宣布的最新利率声明，决定将每年基础货币的刺激目标从原先的60万亿—70万亿日元，一举增加到80万亿日元的规模，强化正在实施

的质化与量化宽松（QQE）政策。对日本来说，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实施的是“量化宽松”，那么日本央行实施的则是“量化爆炸”。

世界各国大搞“量化宽松”的结果是，2008年8月至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了341%；英国央行的扩大了314%；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安倍上台后迅速膨胀，和危机前相比扩大了145%；而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则刚刚开启。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向世界经济体释放出无与伦比的资本规模。

这一轮世界性的“量化宽松”在中国也掀起了阵阵涟漪。长期以来，中国央行始终以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目标，无论各国的“量化宽松”搞得多么热火朝天，中国的利率始终维持稳定，甚至还稳定在很高的水平之上，这导致中国本币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升值通道。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面对此种情景一再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央行也要搞“量化宽松”，理由是全世界都在搞，因此中国没有理由不搞。

渐渐地，在中国谈“量化宽松”变成了一种学术时髦；大家动辄谈之、议之，如果反之，则似乎意味着迂腐与过时，至少也不是敏达之辈[注]。在赞同者的眼中，中国版的“量化宽松”将会与过去“4万亿”宏观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相同，只要经济增长指标上去了，别人要想说“不”，也很困难。至于这些“量化宽松”终究会为我们的世界带来什么，我们这个世界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的，如何才能重新走向均衡，似乎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这些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于按照有利的假设去简化现实，而在很多时候，假设已经把现实挤到了一边，显得无足轻重。

“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是现在主张搞量化宽松的经济学家们最常挂在嘴边上的理由。这也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思维——产品价格上不去，那就发行更多的货币，拿出更多的钱来制造需求，从而

消化掉产品；如果货币已经发了很多，但价格依然没有起色，那就说明货币发行得还不够多，依旧还在“流动性陷阱”里面，要加发更多的量才行。很显然，经济学家们的这些冲动假设均来自经济学的部分经典构想，他们瞄准了预定宏观目标的货币政策，却忽视了流动性陷阱的出现本身就是以资本过剩为前提的关联反应。继续大量创造货币资本，只会推动更大规模虚妄而低效的生产活动，对全球的自然资源造成更大的破坏和掠夺。

很多人已经渐渐淡忘的一件事情是，为了走出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孤苦伶仃的日本央行早已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最后以失败而告终。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日本央行早已在全球率先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从2000年开始，日本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此——名义利率已降至零点，但在实际利率为正值的情况下，低迷的货币需求仍不足以令货币政策发挥效力，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安倍内阁上台之后，在“安倍经济学”的名义下，出台了更具力度的七大措施：一、将通胀目标设置为2%；二、促使日元贬值；三、政策利率降为负值；四、无限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五、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国土强韧化），推动城市化；六、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建设性国债；七、修改日本银行法，加大政府对央行的发言权等[注]。不过，莽撞的政策力度并未产生预想的结果，日本政府的债务大规模增加，老百姓担心物价上涨，税率上调，消费反而更加谨慎，使得“安倍经济学”的前景极为暗淡。不过安倍内阁似乎依旧相信，用脚踢铁板而铁板岿然不动的原因只是因为踢得不够用力，于是他们继续加大力度，更加用力地用脚去踢铁板。

安倍内阁所依赖的日本经济学家现在正在面临考验，他们在急于求成的政客面前，将复杂的经济问题进行了不恰当的简化，结果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世界远不只日本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存在着过度投资以及资本过剩的严重情况，只是由于政治和一些其他因素，我们无法客观地去看待这种复杂

的经济形势，进而使得庞大的发展之船渐渐失去了船舵的左右，在激流中危险地团团打转。

流动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一向比较复杂，但并非不可捉摸。假定产能不变而资本过剩，则表现为通货膨胀；假定产能为变量并且资本过剩，则表现为通货紧缩。从时间周期来看，短期的流动性过剩，会比较直观地反映到通货膨胀上面，也就是在物价方面进行表现，这在以往的历史中经常可见，也是教科书式的经典反映。但如果是长期的流动性过剩，比如10年或更长时期的流动性过剩，这个时候因为产能累积较大，未必会直接表现为通货膨胀，而是更容易表现为同时出现的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市场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累积资产价格泡沫，甚至发展到全面的经济紧缩和金融危机。

所以，表面的通货紧缩、流动性陷阱以及产能过剩问题，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实际根源是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全球性的资本过剩，其根源则在于全球财富的虚拟增长。真正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钱”太多了！既然是“钱”多，那么无论用何种看似合理的理由发出更多的钞票，显然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问题还会以它更为愚蠢的一面来戏弄、折磨世界：钱多，债券就会便宜，那就大家发债；债务多了，流动性变得更差，那就发行钞票，购买债券。结果循环往复推动大家发行更多的债券，而且互持的债券也更多。很显然，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死循环。

世界上的政治家们都有自己的宏大政治图景，他们永远都是向上确定自己的目标，来显示政治地位的强大，但现在他们有可能终于发现，我们的世界无奈地走进了一个真正的死循环。由于我们冲动地饮鸩止渴，而且似乎这还是一服必须越喝越多的毒药。因为现实世界中，依然有众多人士赞同和支持资本扩张政策，所以目前看来无止境的量化宽松还必须持续下去。

这样的认知逻辑是否正确？

我们来看看世界的现实。为什么各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能有效地刺激需求，提振全球经济？

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尤其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需求不足进一步恶化了这一问题。企业争先恐后地持续去杠杆化，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从目前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能利用情况来看，各国的产能利用率普遍不足80%，其中美国全部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为78.48%，欧元区17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为76.50%。中国没有披露产能利用数据，但根据一般的模型测算，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应该更低，应该低于70%。

于是，大家忽然间发现，现在这个世界的买卖双方，原来买家是“爷”，卖家反而是“孙子”；只要有人愿意买，还要借钱给你来买，甚至恨不得干脆不要钱了。这样的情景，对于中国这样从短缺经济中走过来的民众，相当难以理解，但偏偏这就是事实。现在的全球性资本过剩，在制造业国家已经清楚地表现为产能过剩，世界进入典型的“买方市场”就是一个明证。

所以世界各国量化宽松所追加的资本，只会变身为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让价格更便宜，迫使买方市场由此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我们的世界中，只有一个国家可能存在例外，因为这个国家的资金成本最低，债务输出的管道通畅而且抢手，科技创新活动最为强盛，这个国家就是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盲目模仿美国同样搞“量化宽松”，只会造成堆积如山的债务以及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

现实中还有一种金融现象也可以证实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的严重问题，这就是全球超长期债券发行量的激增。

美国数据提供商迪罗基公司的统计称，仅2015年前3个月，兑付期超过30年的主权债券和企业债券在全球的销售额就达到创纪录的690亿美元，比2014年的同期增加了12%，是10年前的2倍多。2015年3月10

日，英国再次发售一种53年期的国债，兑付时间居然到了2068年夏天，这是目前世界上期限最长的金边债券之一。而且，由于市场中强劲的投资需求以及到处浮滥的资本，英国政府居然还能以2.62%的历史最低利率借到钱。

我们的世界，还有更邪门的现象。

负利率发债的情况也出现了。

这是因为债券收益率低迷甚至为负值的前景，迫使市场中的投资者着眼于期限较长、收益率略高的债券。事实上，超长期债券发行方的数量最近几年明显增加。瑞士、荷兰、法国、比利时、芬兰，甚至面临艰巨财政困难的意大利，发行的债券都是负利率。欧元区国家发行的大约价值1.75万亿美元的债券，当前的收益率都是为负的。根据荷兰银行（ABN Amro）分析，这部分负利率债券的发行量相当于政府债券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至少对一部分借款人来说，购买债券的金融部门已经变成了某种慈善机构。

这种情况也迅速蔓延到企业。

2015年墨西哥和法国电力公司均发行了100年期的债券，加拿大和西班牙则第一次发行了50年期债券，大众汽车公司也发行了50年期的债券[注]。现在全世界的财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都认为，他们现在终于找到了新的、在这辈子都可能不需要兑付的借款渠道，而这确保了他们有了一个持久的廉价融资来源。

所以，表面上的通缩，实际的资本浮滥，在世界上制造了一个奇异的债券货币化的循环，先发钞，再发债，债券抵押再发钞。世界的金融业在困局之下，自身也出现了某种改变。资本更多的是在产业体系之外运行，金融业虽然号称“服务业”，但实际却在经济体中演变成为一个闭环行业，自我消化，自我运转，与经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

小，金融和资本对经济的有益推进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小。金融业的交易日益像是一场缺乏观众的篮球赛，场面虽然热闹，但对世界有害无利。

如何理解现实世界，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从资本过剩开始，到产能过剩、流动性陷阱以及所谓的通货紧缩，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认识逻辑，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这也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认识逻辑，可以解释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现象，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原来资本不仅仅是钱，也是一股强劲的祸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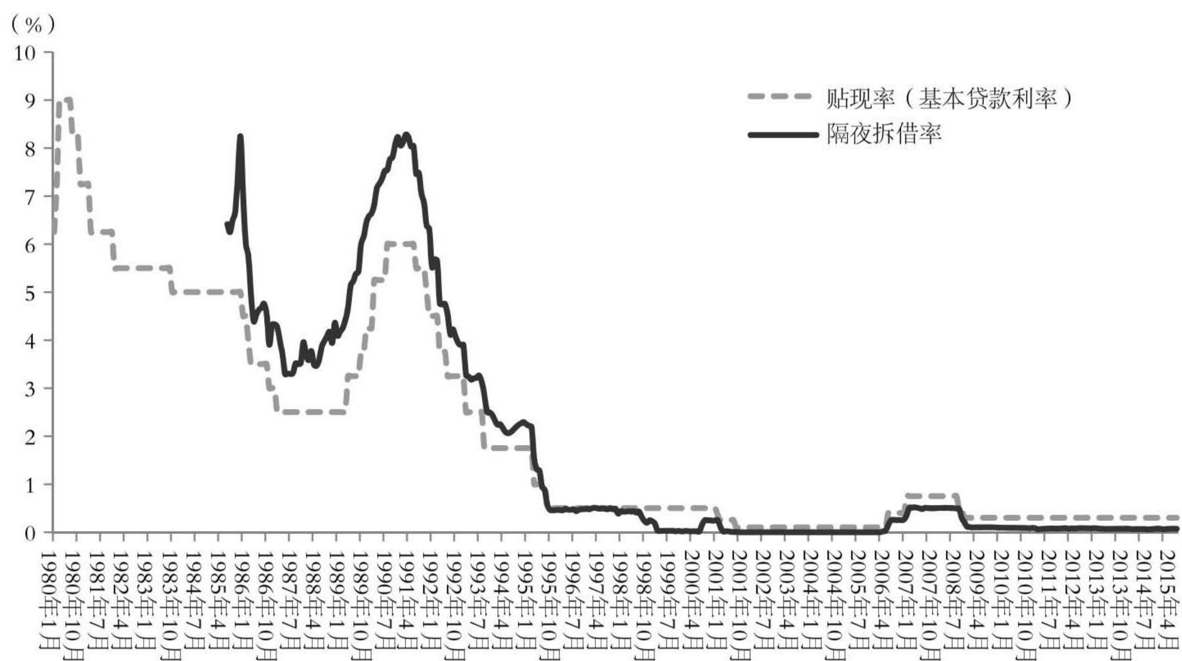


图1－1 日本基准利率走势（1980—2015年）

数据来源：日本央行

说明：世界性的资本过剩，最主要的增量来自发达国家，而日本是西方发达国家制造资本过剩的一个典型，它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城市化在这个阶段取得大幅度的进步，甚至有日益扩张的城市还不够，还有所谓“值得学习的城市圈”之说。但在城市化取得进步的同时，资本过剩的弊病也开始发作。为了改善经济现状，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利率不断下滑，从1995年开始几近于零，但除了继续释放出大量的资本，产生的效果却微乎其微，因而在灾难的路上越走越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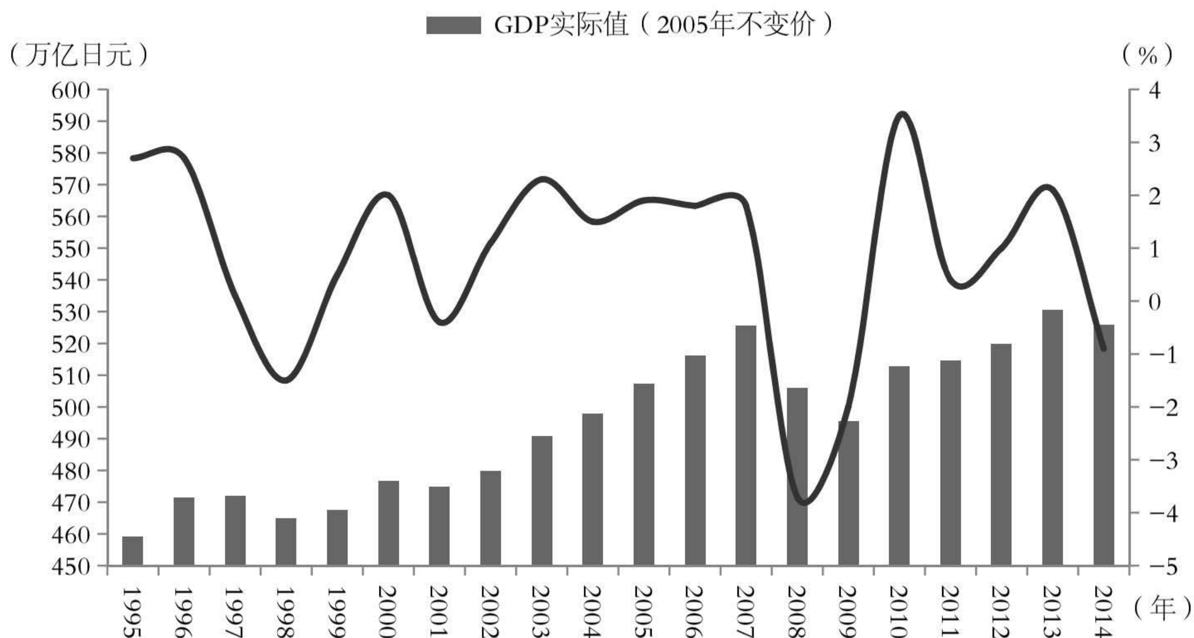


图1－2 日本GDP的变化趋势。GDP单位：万亿日元

数据来源：日本内阁府

说明：从2000年以来的日本GDP增长趋势线可见，日本在“量化宽松”名义下的资本扩张并未带来明确的长期增长，除了带来持续的资本过剩后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也不断下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并且持续加大力度，日本因而成为世界最为典型的资本过剩的国度。这种资本过剩甚至会驱使日本采取更为激进的国家政策，为了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必须四处寻找新的空间和出路，为此安倍政府必然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中日两国之争，深刻背景实际是资本过剩驱动的，是钱多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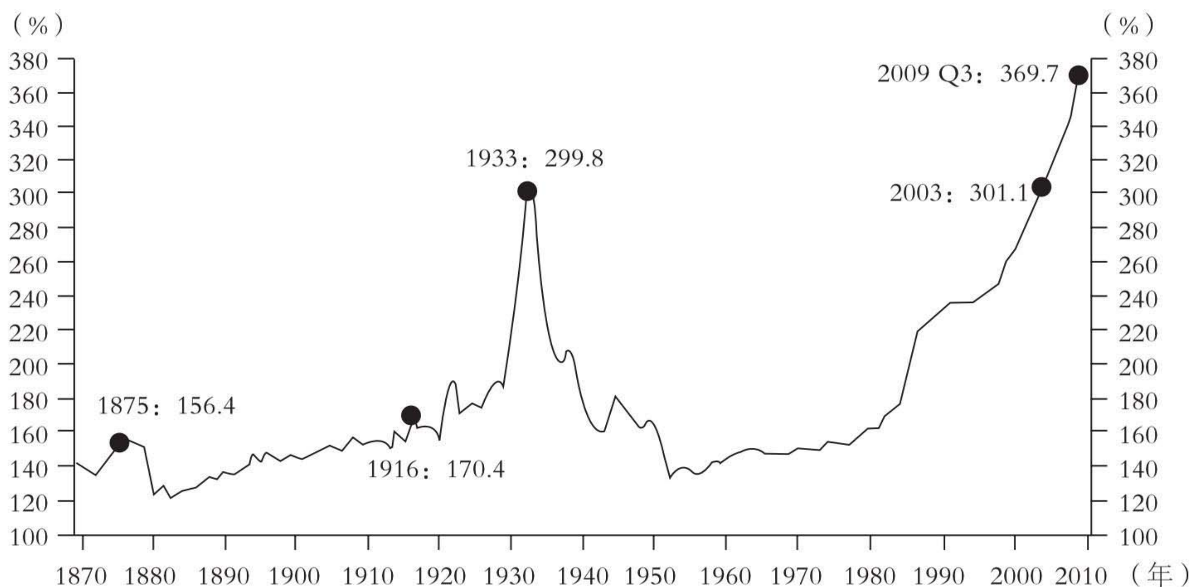


图1－3 直线上升的美国的债务率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说明：这一图形对照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现在的相似情形。世界并没有走出原有的循环，依旧在重复过去的老路，依旧在制造新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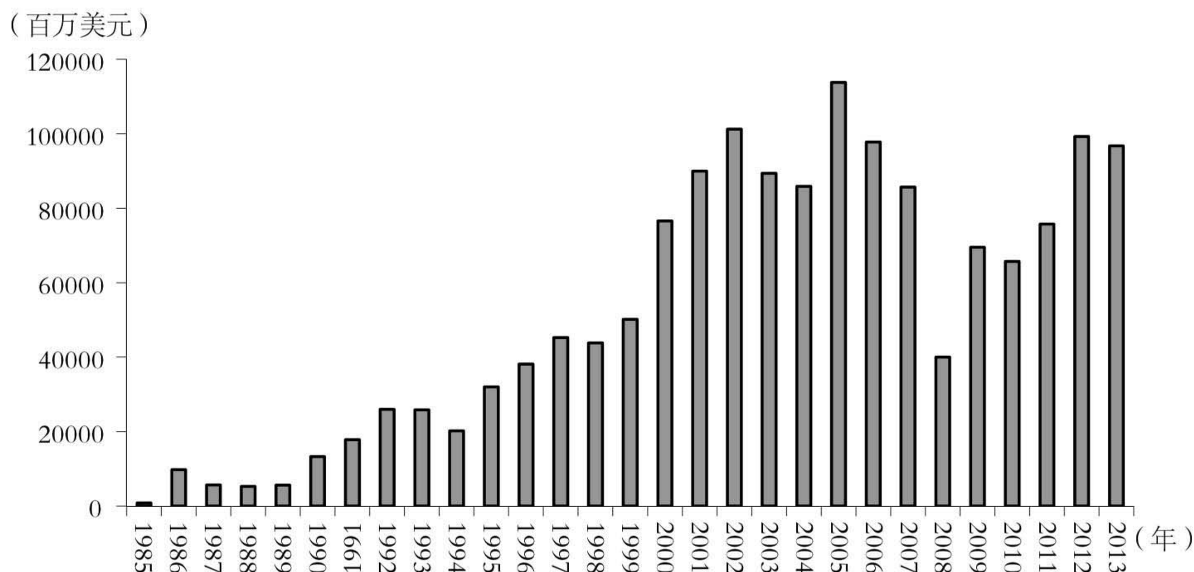


图1－4 从美国汽车贷款ABS发行量（1985—2013年）看消费与资本的关系

数据来源：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

说明：美国的货币宽松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走高，这从消费端可以看得很清楚。除了2008年的金融市场震荡，有过短暂的低落，一直保持了宽松的基本趋势。美国的消费（依汽车为例）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只要城市化还在继续，消费还在增长，金融界似乎就会有恃无恐地延续资本的大量供应。

1. 很多时候，人们“有钱了”，但你是如何有钱的？是什么因素推动你“有钱了”？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就是拿到钱后自己首先要做的事情——营造家庭、营造城市。所以，资本的背后一向躲藏着一个魔鬼，这就是城市化。它装扮了世界，也放出了资本。——作者注

2. 所谓的“扭曲操作”即卖出较短期限国债，买入较长期限的国债，从而延长所持国债资产的整体期限，这样的操作将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从收益率曲线来看，这样的操作相当于将曲线的较远端向下弯曲，这也是扭曲操作得名的原因。——作者注

3. 有关中国版“量化宽松”的讨论，在2015年上半年达到了一个高峰。众多名流学者在看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黯淡之际，认为中国必须实行自己的“量化宽松”，重新回归当年的“4万亿”，否则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无法达到7%。——作者注

4. 通常人们将这七大措施概括为安倍“三支箭”。——作者注

5. .李晓丹：《欧元，打开了低息债券潮盒子》，经济观察网，2015年3月12日，http://www.eeo.com.cn/2015/0312/ 273477.shtml。

第二篇
城市化驱动资本过剩

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中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轮世界城市化的疯狂进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城市化同步叠加，产生了惊人的价格以及资源需求，以此拉动、凝结、消化了大量的全球资本，同时刺激了资本的狂热扩张。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的欲望往往掩盖了资本风险，缩小了市场的名义风险，扩大了市场的实质风险，最重要的结果是推动全球资本走向严重过剩。

资本在我们的世界是如何成为祸水的呢？

丹麦，维兹奥勒。

起初，36岁的本地企业主克里斯汀森女士（Eva Christiansen）并没有很注意数字。银行打来电话说，她通过了银行审批，可以得到一笔小企业贷款。她高兴地叫了起来，手舞足蹈。朋友还给她拍了照片。

“我想我得到贷款时太高兴了，都没听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回忆道。

之后，银行再一次向她介绍了利率：－0.0172%——低于零的负利率。尽管需要支付一些费用，但是银行还会向她付利息。每月才刚刚超过1美元，可还是出人意料(注)。

对欧洲的借款人来说，这是一段诡异的时期，仿佛有一个虫洞打开了，一切惯常的金融原理都不再适用的平行宇宙。投资者明知道德国人不会全额偿付，还是向该国借出了40亿美元。瑞士食品制造商雀巢（Nestlé）发行的债券，最近在市场上的总值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

这种颠覆常理的交易，反映了欧洲地区糟糕的经济前景，此时政策制定者们为了重振经济增长，运用了各种可能的手段，甚至将利率压到零以下以期鼓励借贷和消费。于是在这种环境里，一些最简单的银行业务也变成了奇闻。

消费贷款和按揭的利率直接为负的情况仍然很少见，克里斯汀森似乎是少有的几位实际拿到负利率贷款的人，而银行目前还在琢磨业务该如何推行。现在，另外一些丹麦人把钱存在银行账户里时，银行还会收取费用。

上个月，27岁的学生伊达·莫特尔森（Ida Mottelson）收到了银行的电子邮件，通知她将开始对她的储蓄收取0.5%的保管费。

“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理解错了，结果没错。”她说。

莫特尔森正在读保健学硕士，居住在哥本哈根以西大约100英里的城市欧登塞。她说，她一直在关注央行的新闻，为了确认对电子邮件的理解，还专门给银行打了一个电话。

“我超级天真地问他：‘能给我解释一下吗？’对方努力解释了，但我感觉他的意思是说：你干脆把钱转走不就行了？”

世界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关键在于外表迷人的城市化。

如果穿越到奥古斯都的古罗马时期回望今天，你一定会吃惊的，因为世界的轮回是如此相像，人类对于“造城”的热情，始终不渝。

20世纪90年代末，西班牙政府为了使本国经济迅速地向欧洲平均水平靠拢，制定了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然而，政府并没有将发展高科技和制造业当作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把房地产业视作经济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政府认为房地产业“赚钱”效应大，财富来得快，能够尽快地把西班牙经济带上去。为此，政府于1998年通过了国家土地法律，让全国几乎所有土地都可用于开发，于是房地产开发的“热潮”蓬勃兴起，大量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业，地方政府也靠卖地生财。建筑工地在全国随处可见。工地上塔吊林立，机器声轰鸣；各地的售楼广告让人目不暇接。房地产业从此成为西班牙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据统计，在1999—2008年期间，欧洲新屋建设的三分之二都发生在这个国家。

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西班牙房地产业的繁荣，高度依赖于银行宽松的信贷政策。房地产商搞开发的钱都是银行贷款，这些贷款现在则大都成了不良债务。1999年西班牙加入欧元区后，贷款利率曾经明显下降，银行竞相提供贷款和按揭产品，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开发商和居民能够得到贷款，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但同时也给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埋下了隐患。有关的新闻报道称，西班牙央行承认，目前国内银行投入房地产的5800亿美元资金中，有2400亿存在问题，约占41%。西班牙最大的银行之一Ibercaja的贷款中，有53%是房屋抵押贷款；另一家大银行，马德里Bankinter SA银行的房屋抵押贷款比例为46%[注]。而目前有超过13%的西班牙房产价值已经缩水，并且价格将会继续下跌，预计未来几年会有超过25%的房产总价值跌至贷款总额以下。这样一来，出现后来的结果就不令人奇怪了。西班牙银行坏账比例升至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不良贷款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增长。

人类在消费主义本能的支持下，对壮美城市的追求从未改变过，没有钱的时候会这样追求；有钱的时候，这种追求就会变得更为狂热与失控。1999年后的世界，伴随着欧元的诞生，投资人口的自由流动，欧洲资本从原本集聚的盎格鲁－撒克逊高地向相对廉价的拉丁低地和边缘的高纬度地区倾泻，从而推动欧洲经历了一波欧洲现代史上的再城市化狂潮，掀起了一场资本狂欢。这一轮资本狂潮的基本特征都是，低利率、量化宽松、房价高企，城市化兴风作浪。

即便经过了数年消化，到了2013年，房地产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依然令人瞠目结舌：到2012年底，西班牙市场上还有80万套二手房、70万套刚入市的新房。另外，还有30万套违约被银行强制出售的房子，以及15万套即将被银行强制出售的房子。如果再加上25万套在建的房屋，西班牙的房地产供应量已经超过了200万套。如果对这些西班牙的数据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正常年份的西班牙房地产市场：西班牙总共约有4800万人口，通常每年平均消化的住房只有20万套。这也就是说，西班牙的银行家和开发商合作，为西班牙和来到西班牙的欧洲投资者，准备了10倍于正常需求的房子。

在欧洲，远不仅是西班牙。欧洲的高增长模板，被称为“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的爱尔兰，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有过十分辉煌的历史，它以经济规模计算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这个长期为世界资本所青睐的国家，1994年至1997年的年均GDP增长是7.7%，1998年至2000年更高达10%，成为欧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爱尔兰的人均收入从1万美元，一路上涨到5万多美元，甚至一度超过英国。爱尔兰原本是以农牧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体，结果它却在城市化的路子上跑得飞快，大力发展房地产行业。1996年，房地产业在GDP中的占比是5%，2006年就翻番达到10%。公共住房领域的投资增长成为爱尔兰投资增幅最大的领域，1995年至2000年，用于住房的投资为33亿欧元；2000年至2006年，这项投资就达到了105亿欧元，增幅达到218%。

爱尔兰人将新到手的资本再投资于房地产，开发商将码头变成办公楼，牧场变成了住宅区。仅仅在2006年一年，开发商就建造了9.3万座住宅楼，是10年前的3倍[注]。不过，依靠资本支撑的非理性繁荣终归是靠不住的，爱尔兰从2008年至2013年，住宅楼价下跌过半，其中公寓价格下跌幅度更是高达63%，失业率上升到两位数，连累爱尔兰的银行都要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否则就会破产。城市化和资本过剩的狂潮过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

长期以来，冰岛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渔业、旅游、能源输出，其中贡献比例最大的是渔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冰岛人民逐渐富裕，他们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的一些知名大学学习经济、金融，进而转变了观念，觉得金融业才是高人一等的行业，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在冰岛，许多人开始盲目地转而从事金融服务。在冰岛荒凉的国土上，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写字楼群，荒野极地之上的楼价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大幅上扬。2001年时，全国每套住房的平均价格还仅为1500万冰岛克朗，约合23.6万美元；到了2007年11月这一价格则超过了3000万冰岛克朗，约合47.3万美元，这个酷寒之地的房价整个翻了一番。冰岛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界得以观察资本和金融推动城市化的最极端例子。当然资本泡沫破裂后的结局也非常悲惨，前不久有一位中国房地产商人黄怒波拿了880万美元，就买到了冰岛0.3%的国土[注]。

希腊是欧债危机之后，始终牢牢占据欧洲危机程度榜首的国家。除了欧元对希腊再度城市化有着喷气式发动机般的助推作用之外，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也是一次投资高潮，这一切都导致希腊的资本过剩比别的欧洲国家更为严重。而自从发生债务危机以来，希腊的房地产价格下降了35%—70%不等，即便如此，希腊的房地产依然难以吸引到大量的投资客。原因在于，希腊的房地产市场早已经成为银行业的负资产，希腊银行业早已不对任何本国居民的购房提供贷款。现在购买希腊房地产的都是外国人，其中中国人就占了45%甚至更多。原因在于部分中国人对于希腊政府买房送移民签证的优惠政策很有兴趣。

实际上，希腊政府的债务问题是40年累积下来的。军人政府倒台之后，希腊有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希腊加入欧盟、使用欧元之后，希腊经济增长迅速，为了证明欧元可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希腊政府效仿欧洲其他国家给民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就业保障。为了支持更好的社会福利，政府的钱花了不少，但税收却始终上不来，由此走上了举债发展的道路。加入欧盟的希腊，近10年来经济始终保持4%的增长，增幅比欧盟国家2%的平均水平高了1倍，但政府财政也到了破产的边缘。目前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公共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3%，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和60%上限。而且希腊公务员和政府机构聘用人员高达100万之多，几乎占到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臃肿、庞大的政府机构，成为政府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

在欧洲，还有老牌的豪华型房地产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它们的房地产价格也在欧洲再度城市化的过程中迅速暴涨。事实上，欧洲除了德国这个注重产业立国以及房地产租赁市场完善、法规严格的国家之外，基本上各个国家都没有逃脱这一轮再城市化的投资狂潮，房地产价格都有过显著的上涨，金融、资产管理行业都有过显著的繁荣期，泡沫化特征明显，同时也都在猛然间遭遇华尔街金融风暴和债务风暴的袭击。

欧洲的再城市化以及房地产繁荣是从1999年前后开始爆发的，但这股资本浪潮影响并席卷到美国的时候是2001年。美国在2001年开始的所谓“房地产景气”，背景与欧洲相比稍微特殊，特殊之处是“9·11事件”和网络股泡沫的破灭，美国政治家因势利导，以此为借口释放大量资本，之后又吸引大量全球资本加入美国市场，房地产的狂澜于是兴起。当时，以“防止引发经济衰退”为借口，美联储大幅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1月的6.5%降至2003年6月的1%，使利率水平创下40年来的新低，导致美国进入了实际负利率时代，在美联储逐步降低基准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房地产信贷机构不断放宽住房贷款条件，推动美国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

一般认为，美国的房地产繁荣与美联储两轮激进的货币政策推动密切相关，这两轮激进的货币政策，释放了大量的资本。同一时期，美国30年期限的固定房贷利率从2001年1月的7.07%降至2003年6月的5.21%，2004年、2005年也一直维持低水平。与此同时，一年期可调整抵押贷款利率大幅跳水，从6.68%一路降至3%，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率，贷款成本简直低廉到几乎免费的地步。实际负利率打破了谨慎储蓄与投机风险之间的平衡，大量的资本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心理。

纽约是美国著名的城市，从这个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城市的再城市化过程。纽约房地产总体来看，从1974年至2006年，价格上升了250％，2006年房价是1974年的3倍多。尤其是从1996年起，纽约房地产进入了长达10年的显著繁荣期[注]。房价在城市的每一个街区都在增长，平均房价为过去的124.2％。新建筑大为增加，新建筑的许可证从1996年至2006年10年间翻了两番，城市人口增长迅速。

2006年末至2007年，美国突然发生“次贷危机”，泡沫崩溃，这相当于一轮整体“量化宽松”之后的泡沫挤出过程。美国的银行业紧急抛售房屋，导致美国房价从2007年开始一路惨跌，至2012年底才结束。不过，由于资本过剩的总量依旧在放大，纽约这个云集着金融学家和资本精英的城市丝毫不接受教训，紧接着从2012年底，纽约房价又开始大涨，截至2013年10月31日，平均挂牌价为44.99万美元的纽约房产，最后的平均成交均价能达到56.53万美元，行情再度火爆，房地产价格的增幅越来越大。

城市依靠建筑堆积而成，而建筑不仅仅是用石块，更是用资本堆积而成。人类是在用资本交换自然界的财富，但资本多了、债务多了之后怎么办呢？美国金融学家们的办法是发行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债券，以债换债，以时间换空间，进而使得资本过剩的泡沫越聚越大。担保债务凭证，即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是一种

投资银行利用债务抵押做成的债券，通常销售给对冲基金，CDO的回报通常10倍于基准利率，而且购买了CDO债券的基金机构，还可以用CDO债券做抵押，从银行、投行等机构获得新的贷款和资本，可以用于购买更多的CDO。随着CDO的蓬勃发展，信用违约掉期，即CDS（Credit Default Swap）也出现了，这是一种保险合约，也就是金融机构用从CDO中赚来的钱，拿出一小部分再购买CDS，并且这个CDS也是可以投资和交易，这样一来全美的保险公司也跟着卷了进来。资本的扩张变成了一条完整的食物链，从城市和房地产的崛起开始，差不多整个金融体系，银行、投行、基金、保险公司，全都卷了进来，资本扩张和过剩日益严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质是美国房地产泡沫崩裂后，金融市场通过自己的非理性调整，开始挤出部分泡沫。只是这一切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因为美联储在美国政界和金融界的压力之下，采用的挤出泡沫的方法是持续的“量化宽松”，这导致更大规模的资本量被释放出来。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最关键的阶段与世界大体同步。

中国的城市化，是从“经营城市”（Urban management）开始的，最早的概念源自于1993年的沿海城市大连。大连是中国最早通过“经营城市”，改变城市面貌，成功吸引外资的地方，进而也为全国的城市化建立了一个可参照的、直观的样板。此后，就是“安居工程”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推行。但当时的中国经济内忧外患，为亚洲金融风暴以及中国的通货紧缩所困，实质进展不大。

199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多个场合表示，要把住房建设作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注]。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及中国房协等单位商定，以中房集团发展研究所为主，成立了“住宅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研

究”课题组。此后，朱镕基考察深圳，点名找王石做相关的企业汇报，并指示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做成支柱产业。200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件”），正式明确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且从“十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连续三个“五年计划”，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对通过城市化刺激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期盼。

在中国政府官方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在大量资本的刺激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拿出了惊人的成绩单。2012年的时候，大连每平方米3万人民币的房价，曾经让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球星大为咋舌，但这个价格很快就成了“过去时”。从2003年开始，土地出让政策使得地方政府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土地财政模式得以固化，中国的土地出让价格开始迭创新高，从根基上推升房地产价格的上升。2012年，北京万柳地块在拍卖时出现了一个“地王”价，楼面价高达4.02万/平方米，但此后这个价格几乎就是一个通行标准了，如2013年北京朝阳孙河“地王”的楼面单价的估价就是4.4万元/平方米，但该地块还要求建设一定的教育设施等，因此该“地王”的价格最终可能高达5万元/平方米左右。到了2015年，北京的房价更为惊人，楼还没有建起来，市场销售价格就已经被锁定在7万—8万元/平方米。其实，自从2009年的“4万亿”刺激政策，以及随后的房地产信贷狂欢，汹涌的货币缺乏投资渠道，于是大举转而流入房市。人们惊叹，不是房子贵了，只是钱更不值钱了。

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中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轮世界城市化的疯狂进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城市化同步叠加，产生了惊人的价格以及资源需求，以此拉动、凝结、消化了大量的全球资本，同时刺激了资本的狂热扩张。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的欲望往往掩盖了资本风险，缩小了市场的名义风险，扩大了市场的实质风险，最重要的结果是推动全球资本走向严重过剩。二是全球资本是流动的，一处的投资会溢出到世界各地，全球化使得资本过剩的

影响也实现了全球化。物流的便利，互联网的便利，同时也创造了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便利，使得风险无处不在。三是市场没有能力自动地调适，使得资本供应处于适当的水平，但市场会通过大规模的信用贬值，“作废”大量的资本，制造大量债务，创造金融危机。四是全球政治家都明显具有推动资本过剩的偏好，为了确保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他们总是会利用各种借口和契机去实现这一点，历史上如古罗马的城市化，今天如美国“9·11事件”之后的现象。

长期以来，人们试图用资本泡沫理论来解释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现象，来解释资本的过剩。至于泡沫产生的原因，则被忽略、淡忘和一笔带过。如果认真查找和追究资本泡沫的根源，你会发现，通常的解释无非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与预期相关联的过度投机行为、幼稚投机者的交易行为、规范失灵、诈骗行为和道德风险等导致了泡沫现象的出现。这种猜测式的假设，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经典的经济学假设而存在，人们意识到了泡沫的存在，发现了资本泡沫的可怕影响和冲击，但却没有进一步深究资本泡沫产生的根源和机理。

实际上，泡沫是一种中间现象，这是资本过剩必然会产生的一种中间现象。根源在于城市化推动了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了大量的资本活动，这些资本活动在某一市场或商品集中爆发，就产生了泡沫现象。而资本过剩也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城市化是真正的发动机，资本是城市化这部发动机的润滑剂。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以谋求发展为借口，对城市化的刻意青睐和拼命追求，才导致了可怕的资本过剩。所以，城市化是根源，资本过剩是结果。

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人的生存本能和欲望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灾祸的源泉。消费主义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美好生活，还有时刻可能触发的各类资本陷阱。

不受约束的欲望，必然导致不受约束的结果。

在今天的现实世界里，世界银行、麦肯锡公司和发展经济学大力鼓吹的“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已经成为经典的谬论。它最大的荒谬之处在于其假设人是简单的“经济人”——现实中的人都是心理学家沙因所说的“复杂人”㊟。因而我们这个世界中根本没人会自觉自愿地采取适度而理性的行为，社会和资本也不奖励这样做的人。相反的是，泛滥、畸形和夸张反倒是世界市场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可以想见，那些最愿倾听世界权威声音的“好学生”，无论是国家还是地区，他们所遭受的发展灾难也必将会是最大的。毫不夸张地说，人们是自觉自愿地竞相走向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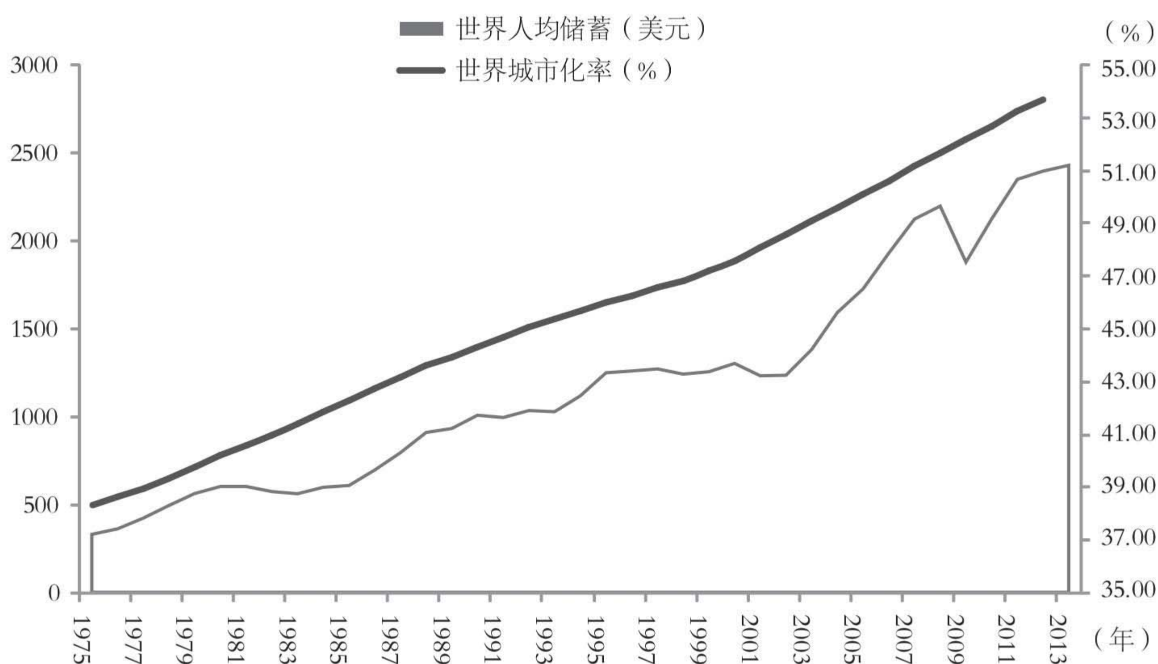


图2-1 世界的城市化与人均储蓄资本呈现正相关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说明：储蓄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从长周期趋势来看，城市化与资本积累几乎完全同步，说明了两者相伴相生的关系，城市化就像鸦片一样让人类上瘾，促使人类发动战争去掠夺，大力挖掘自然资源，辛苦工作赚取资本，方式不一，但目的都是获得资本，建造城市和住宅，并且不断累加。而在金融事件爆发的时间节点附近，我们又可以看到，反映资本的曲线甚至还会超越城市化而居其上，表明所谓的资本泡沫及其爆裂，其实只是资本曲线超越城市化曲线的压力表现。这一切真的不是假设，而是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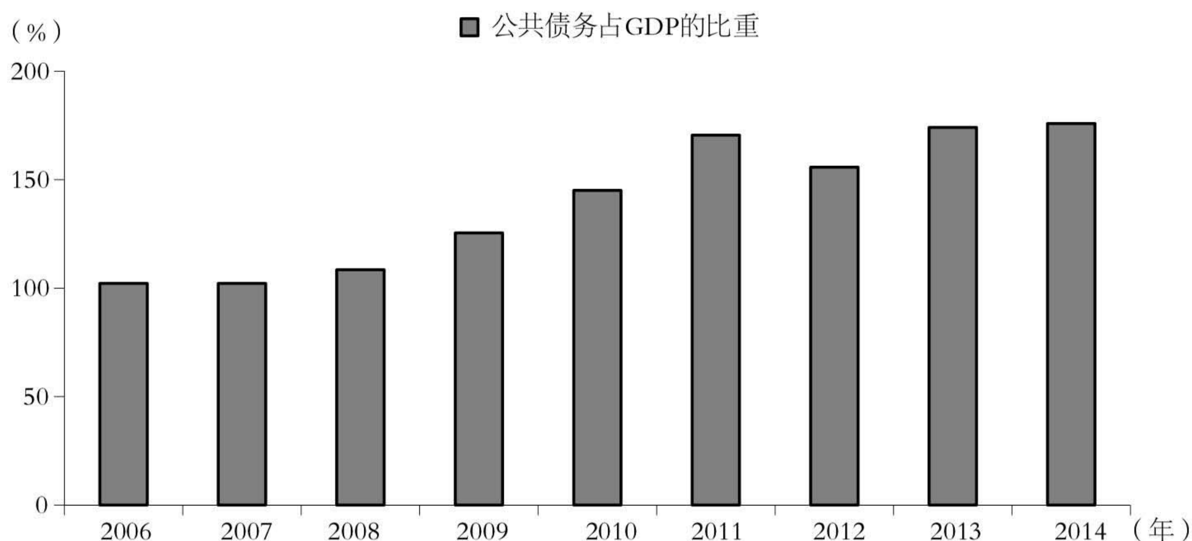


图2－2 希腊债务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

说明：希腊是一个被高速经济增长率拖垮的例子，债务只是后果的一种表现，让人们“过上好日子”，从来都是一种充满诱惑力的借口，尤其是在有大量外部资本流入或是可以轻松获得资本的时候，更是如此。人们很少会考虑这样的增长速度和债务所导致的问题，他们更愿意相信，城市化可以永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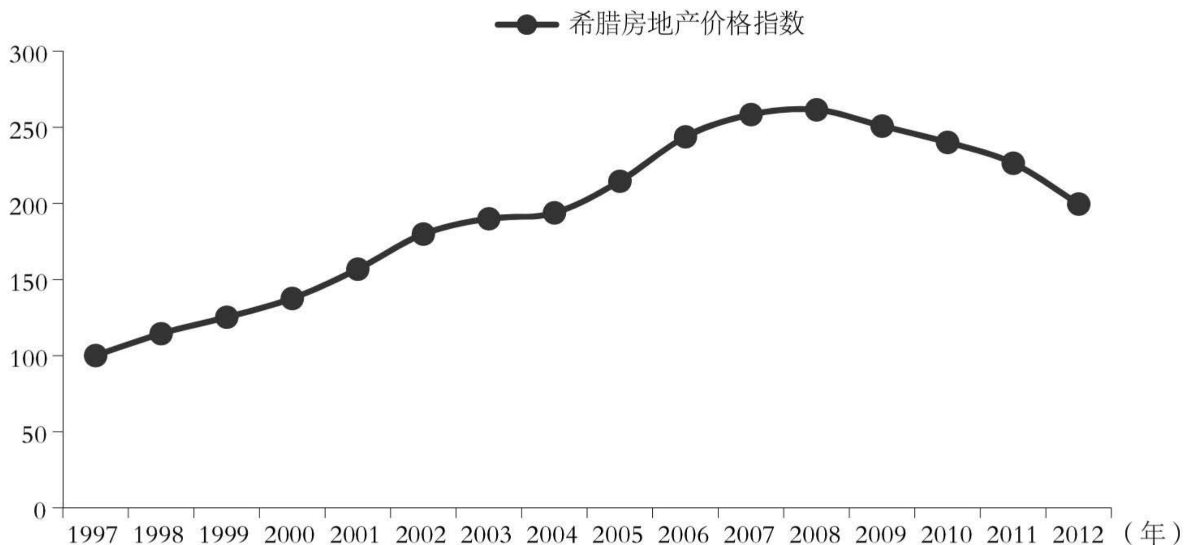


图2－3 希腊房价与奥运会

数据来源：希腊央行，商务部网站，2013年8月

说明：希腊房地产业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迎来一个发展高峰，由于宏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房地产价格一路攀升，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希腊房地产业的发展戛然而止。这说明，政府通过举办大型活动推升城市化的做法是值得深究

的，资本积聚可以让城市获得一时的表面改观，但同时也会给城市留下深刻的内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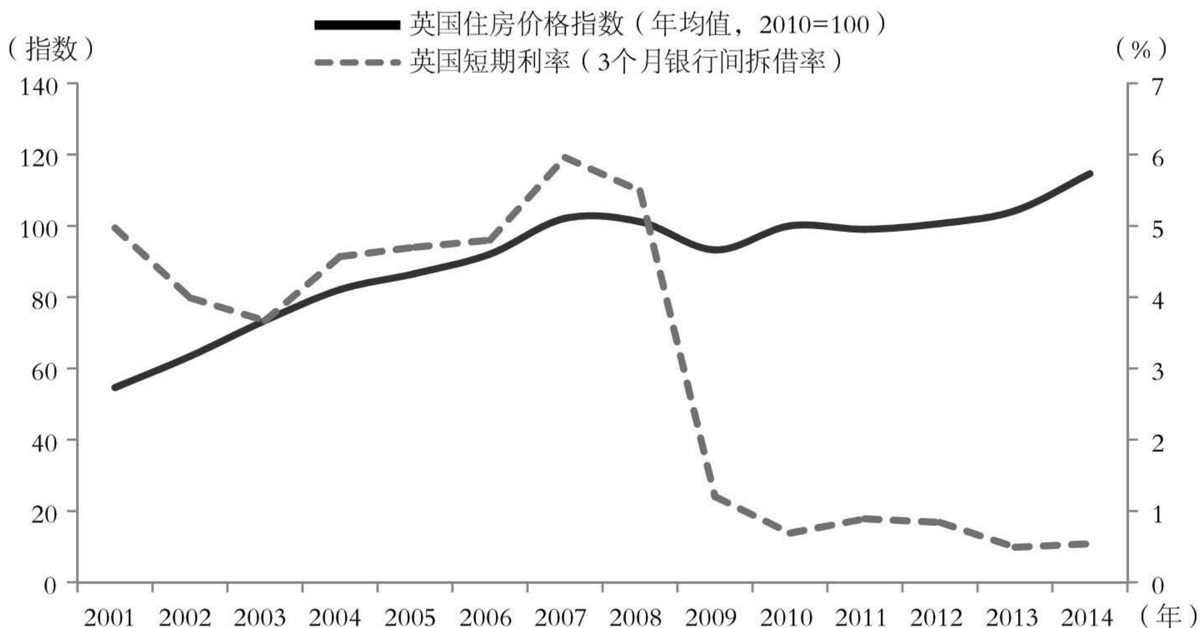


图2－4 英国房价与短期利率表现

房价数据来源：Eurostat利率数据来源：OECD.stat

说明：英国的再度城市化过程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房价走高而利率走低的趋势极为明显。在这个过程中，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英国货币当局同样释放了大量的货币资本，造成了房价的危险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再度城市化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资本集聚具有竞争性，如果央行有能力控制得当，则资本过剩的危险虽然始终存在，但却不会立即爆发成为危机，而这往往又会以其他地方的重大危机爆发为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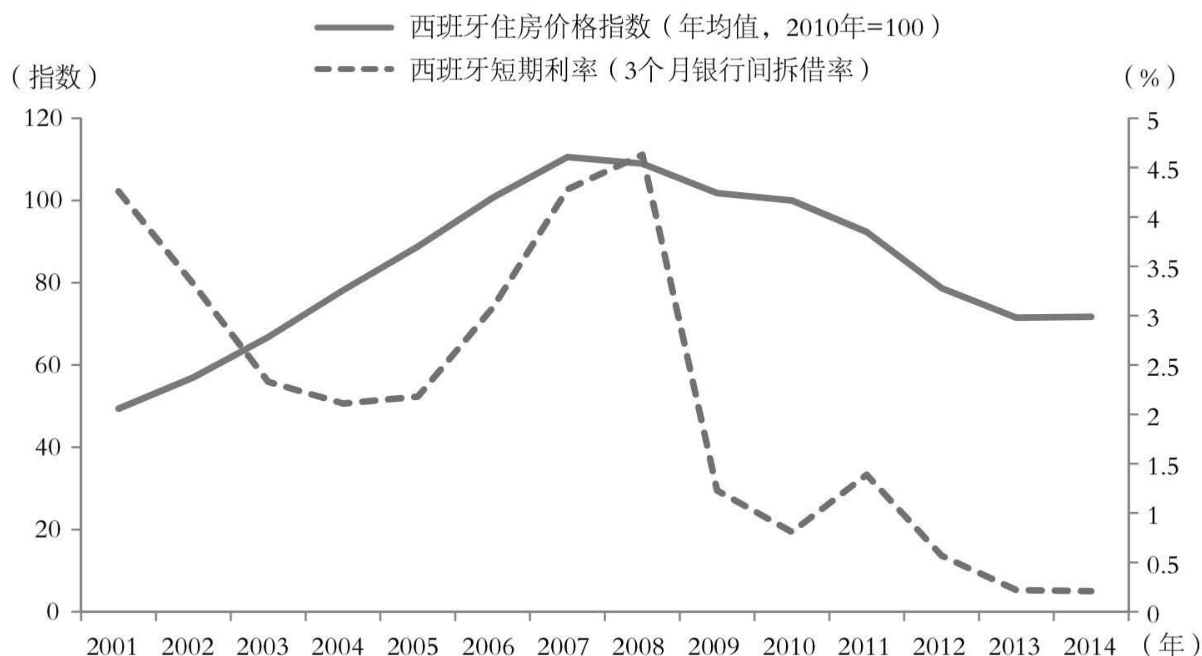


图2－5 西班牙房价与短期利率表现

房价数据来源：Eurostat

利率数据来源：OECD.stat

说明：西班牙与欧洲其他国家近似，图形均反映出一定周期内，利率一路走低，释放出大量的资本；同时房价阶段性的处于历史高点，并开始走低。欧洲各国的区别主要在于资本对于各自房价的支撑力度有所不同，有的明显下滑，有的依然可以维持。



图2－6 美国的利率水平

数据来源：美联储
说明：金融世界是存在交叉影响的，美国的利率政策不但刺激美国金融业释放出了大量的资本，同时也刺激世界其他国家释放出大量的资本，加剧了世界的资本过剩。从美元机制的角度来看，说美国就是世界资本过剩的根源也不过分。由于资本的全球流动，实际美国金融业也感受到了资本过剩的压力，他们寄托于金融创新来解决问题。CDO和CDS就是这一阶段的金融创新产物，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同时还拖垮了雷曼兄弟公司，制造了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金融创新的失败具有历史性意义，它告诉人们债券的根本是以时间换空间，而金融创新并不能解决资本过剩的根本性问题，资本过剩的发动机（城市化）依旧在高速运转，随时可能冲垮世界各个市场的平衡。有趣的是，世界要求美联储维持谨慎的货币政策，但美联储一定紧盯的是美国的科技创新，因为只有科技创新尚有些微可能冲销资本过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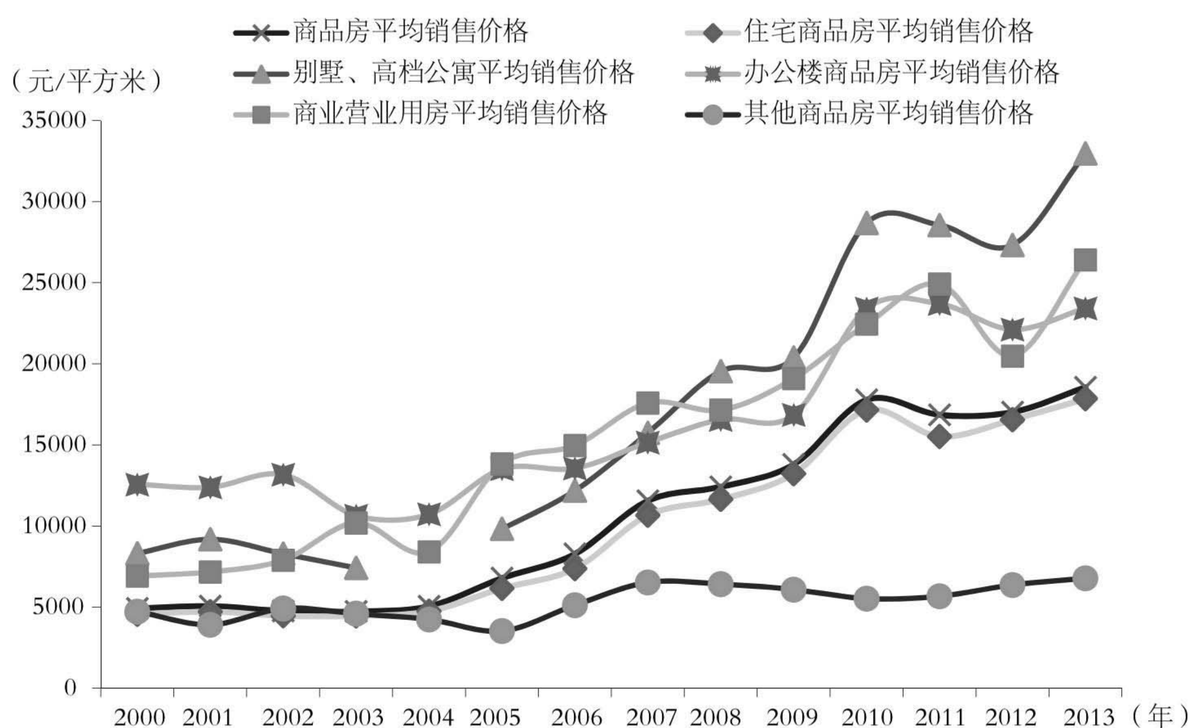


图2－7 北京2000年至2013年房地产价格表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说明：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房地产市场，在户口制度的严管之下，实际也没有城市化，因而中国实际是一个更好的观察模板。我们可以看到在度过起步期之后的房地产价格，从2004年之后开始飙升。同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快车道，房地产价格冲天而起，社会综合成本也大幅上升，第二产业开始转移，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储蓄资本开始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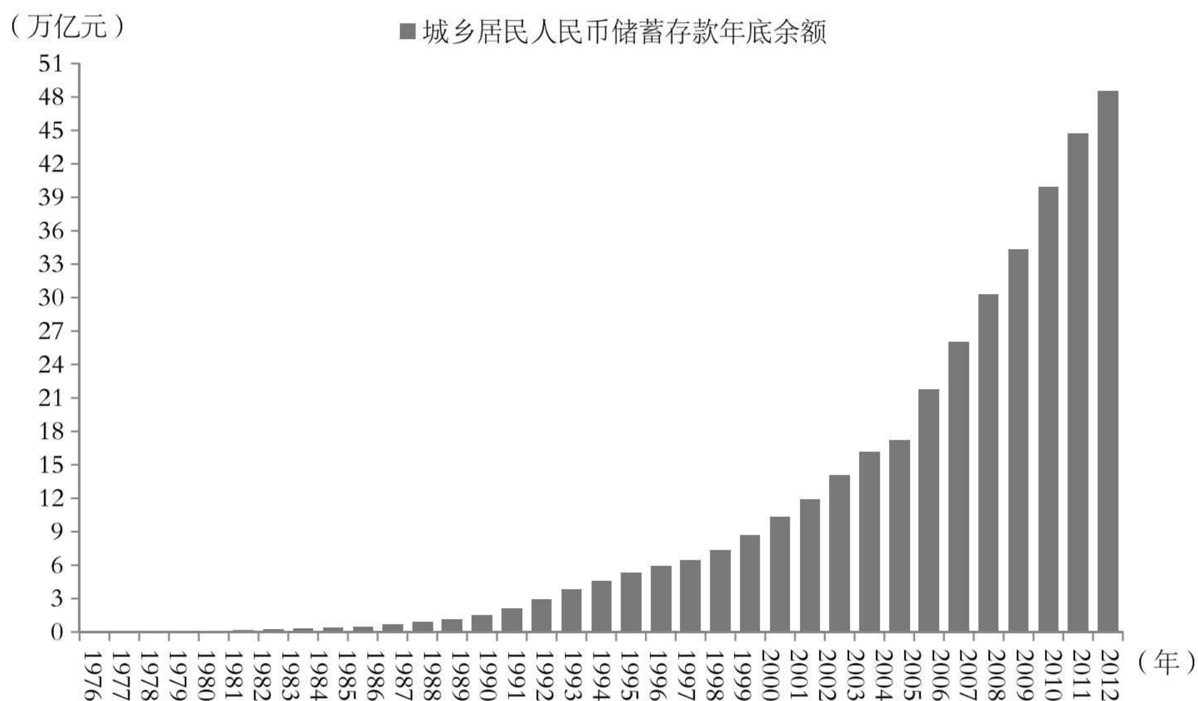


图2－8 1975年至2013年的中国储蓄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说明：我们可以轻易发现，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储蓄增长与房价增长同时进入了快车道。这显示城市化与资本的相关性，如果要说区别，只能说中国由于城市化的速度太快，所以资本过剩的情形更为严重。这种情况下，发生股市的大幅震荡，各种商品市场的波动，都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如果没有税收措施的平衡以及市场空间的改变，这些都会在今后的一个长周期中必然不断发生。危机和动荡，实际均源自资本过剩的驱动。中国如此，日本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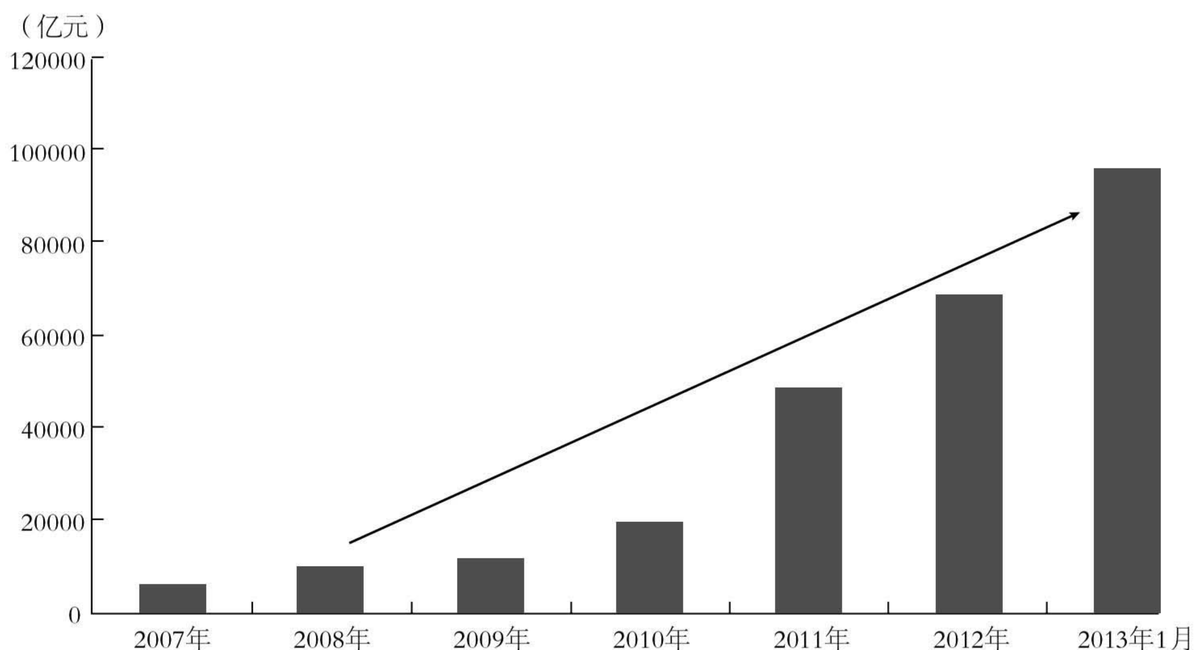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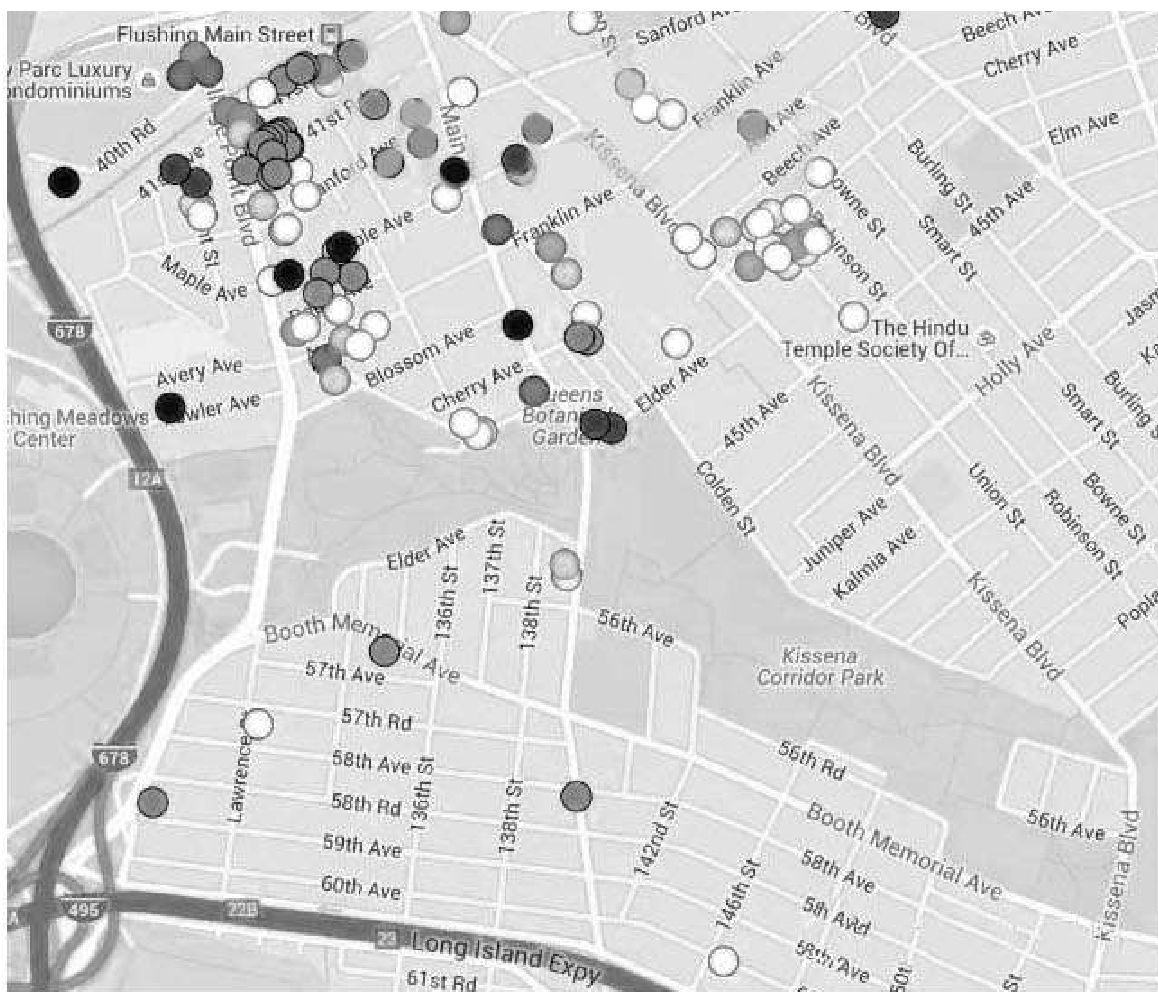
图2－9 中国银行业理财产品余额暴涨

数据来源：宏源证券

说明：由于储蓄过快的增长，中国的资本过剩非常严重，这从中国的银行理财产品可以轻易发现。事实上，除了银行理财产品之外，地下金融也泛滥成灾，私下交易的高利贷制造了无数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都与资本过剩存在密切的关联。

法拉盛历史交易价格与在建项目热点图





过去三年交易价格（美元）

60000-267000

267000-338000

338000-404000

404000-475000

475000-548000

548000-645000

未来建案单位数（个）

0-15

16-35

36-100

100以上



图2－10 纽约一个社区（法拉盛）的房地产交投密度和价格

数据来源：UTOFUN

说明：纽约是美国的一个典型的城市，图中密集的交投量，仅仅是纽约其中一个不大的社区。所以，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市场动荡，如果放在短周期来看，是一场金融危机；如果放在长周期来看，这就是一场典型的资本过剩危机。实际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就与城市化（再城市化）紧密相关，房屋开工数量就已经经常出现在美国金融业高管的嘴里。更加要命的是，这种长周期危机，还没有找到消解的好方法，所以还会继续在世界上演出令人胆战心惊的戏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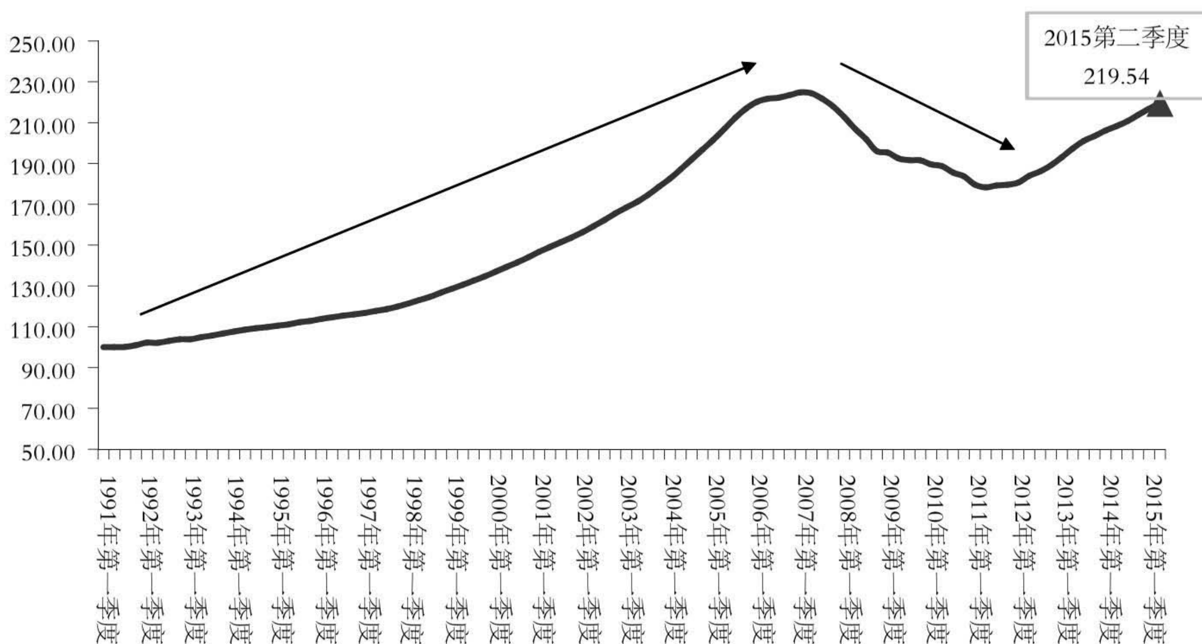


图2－11 美国房价指数，1991年第一季度=100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

说明：美国的房价指数说明了美国房地产仅仅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动荡之后，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走低，此后继续走高。城市化依旧是美国经济的主力军，依旧是资本的发动机。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利用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增长，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

1. .《负利率的欧洲：你借钱银行倒贴》，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3月1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

20150301/162421617430.shtml。

2. .陈听雨：《西班牙银行坏账率创15年新高》，中国证券网，2010年12月19日，http://www.cs.com.cn/ sylm/jsbd/201012/ t20101219_2715118.html。

3. .陈坤：《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基本情况、原因及对我国的启示》，豆丁·商业案例频道，http://www.docin.com/p-582874267.html。

4. 此事经众多新闻报道之后，后因冰岛出现政治方面的问题，尚悬而未决。——作者注

5. 所谓的“劳伦斯魔咒”就是发生于这一时期。1999年，德意志银行证券驻香港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Andrew Lawrence）首度提出“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 Index）的概念，他发现，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往往都发生在新高楼落成的前后。因为政府宽松的经济政策和对经济乐观的态度，经常会鼓励大型工程的兴建。让我们看看被现实验证过的“魔咒”：1908年前后，美国“纽约胜家大厦”和“大都会人寿大厦”相继落成，接着金融危机席卷全美；1913年，美国“伍尔沃斯大厦”落成，美国经济出现收缩；1930年、1931年，美国“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完工，纽约股市崩盘，美国与全球经济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197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1974年芝加哥“西尔斯大厦”相继落成后，发生石油危机。——作者注

6. .张劲松：《“支柱产业”确立始末》，《中国房地产报》，2013年6月3日，http://www.china-crb.cn/resource.jsp?id= 13254。

7. 美国科学家德加·沙因首先提出了“复杂人”人性假设。该理论认为，人不是单纯的“经济人”，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人”，而应该是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作者注

第三篇
虚假繁荣的连锁反应

> 城市化推动资本浮滥，资本浮滥推动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看起来，这个对人类生存产生威胁的非理性循环似乎是可以一直进行下去的。不过有些事情并非总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虚浮而夸张的城市化，它的脚步也有停顿下来的那一天。当这一天真的来临之际，事情立即会显现出本来的面目。

城市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支撑，城市的发展和运营，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和生产材料，所以城市的发展也会导致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些城市的相关产业在享受表面繁荣的同时，也受到资本过剩的传染和洗礼。

世界是复杂的，但很多人的头脑是简单的。

我们的世界并不像理论家所想象的那样——人们奉行的是一种简单“经济人”逻辑，资本刺激消费和投资，消费和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一切都是完美的，城市的发展可以从中获益。问题在于事情不是这样运转的，所谓的“完美”只是一种想象；现实是从城市化到土地，再到商品和矿产，再到消费和金融，一旦资本浮滥，就将刺激市场的狂热，推动一切进入泛滥成灾的轨道，世界由此进入一个非理性无所不在的时代。

先让我们来看看智利的铜矿采掘业。

《彭博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用有趣的笔调描述了城市化之下的矿业荣景。自从两年前来到位于智利北部的埃斯贝兰萨（Esperanza）铜矿工作以来，埃里克·莫雷诺（Erick Moreno）的薪水已增加了两倍，并且正准备购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他表示，这里工资待遇非常好，所以他绝不会换工作。他一厢情愿地表示："我打算在这个行业干到老，我不会考虑其他地方。"莫雷诺完成了在安托法加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ntofagasta）的工程学学业，而他的许多同学则辍学到铜矿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拥有自己的房子，许多人还开上了保时捷跑车。

矿工的消费正惠及智利的整体经济，不但助长了一波消费热潮，还推动了失业率在第二季度降至6.2%，创下197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注]。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智利已成为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年前的4780美元上升至2015年的约1.63万美元。铜矿开采业的发展和技术工人的短缺意味着，每隔两三年签订新合约时，许多矿工就会获得超过3万美元的奖金。

矿业巨头必和必拓表示，埃斯康迪达（Escondida）铜矿上卡车司机每年的收入相当于8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奖金，远超过他们的美国同行。

在我们的世界中，许多人上下班要乘坐公交车，发达国家的人士也要自己驾车上下班。但在智利，人们上下班乘坐的是专门的飞机。许多来自智利南方贫困城市的工人每次会在北方的矿上工作数周，然后再飞回家中休息几周。每天，拉塔姆航空公司（Latam Airlines）飞往阿塔卡马沙漠的航班上都坐满了这些工人。

在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全球最大的铜矿公司智利国营铜公司（Codelco）、波兰铜矿冶炼与工业集团（KGHM Polska Miedz）和日

本泛太平洋铜业公司（PanPacific Copper）都在大肆扩建，以满足亚洲需求。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来自亚洲的需求在过去10年已推动世界铜价翻了两番。

铜是制造电力电缆和电线必不可少的材料，任何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扩建，恐怕都离不开铜和铜的产品。直到不久前，由于城市的迅速扩张，中国对铜的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这不但推高了铜价，同时也刺激了对采掘业的疯狂投资。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仅仅智利的采矿业2012年就吸引了3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智利经济在2012年增长了5.6%，该国央行预测2013年的增幅为4%—4.5%。

有了投资，当然就会有消费，但没人关心所谓“合理”的程度。智利矿业部长埃尔南·德·索米尼哈克（Hernán de Solminihac）表示，矿工们出手如此阔绰，以至于每创造出一个采矿业工作，就会为其他行业带来三个就业机会。这些新增的工作岗位很多是在零售业。全球著名的奢侈品连锁店Tais DFS的首席执行官马里亚诺·加西亚（Mariano Garcia）在伊基克免税区开设了四家门店，而该地区非常接近必和必拓、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和嘉能可超达（Glencore Xstrata）所运营的矿区。

Tais DFS公司销售奢侈品香水、手表和化妆品。加西亚说：“矿工进店一下就要三四瓶香水，他们还会选择Carolina Herrera、Hugo Boss和PacoRabanne等高端品牌。”Ditec Automoviles的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多·考斯特巴（Eduardo Costabal）表示，该公司计划于12个月内在该国的矿业中心安托法加斯塔开设第一个保时捷跑车的展厅。该公司是捷豹、路虎和沃尔沃在智利的代理商。

科皮亚波矿工协会（Miners' Association）会长爱德华多·卡塔拉诺（Eduardo Catalano）指出，现在，智利北方城镇的超市将开始出售鱼子酱和蜘蛛蟹来填饱矿工们的胃口，而当地人以前根本就不知道这类佳肴的存在。

当然，这种繁荣能否持续，智利人几乎完全同意，这完全取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智利矿业部门的负责人表示，由于中国对铜的需求走软，已经导致今年铜价出现了下跌，这是一个不妙的消息。这个部门还预计，由于价格疲软、成本上升及环境法规收紧等一系列因素，未来10年铜矿开采投资总额将为700亿美元，远低于政府预计的1120亿美元。

虽然来自市场和资本的信号不太妙，但所谓“繁荣”从来都是非理性的。智利的矿工莫雷诺还在指望铜矿开采业继续繁荣下去，因为他正在为买房攒钱。他说：“埃斯贝兰萨至少还拥有50年的生产能力。铜价造成的影响不大。矿工虽然不能再大赚特赚，但收入仍然很可观。该行业有能力承受价格下跌，也将让矿工继续赚钱。”

热门产业如此，冷门产业的情景也类似。

加拿大是世界油砂的主产国，阿尔伯塔省又是加拿大的油砂中心。该省面积约66万平方公里，东接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西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南部为美国，北部为加拿大的西北地区，是加拿大少有的两个不靠海的省份之一。车子从阿尔伯塔省首府埃德蒙顿出发，经过约430公里到达油砂重镇Fort Mcmurry。一路上先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是森林，极少看见村庄，可谓人烟稀少。油砂城Fort Mcmurry也只是一个10万人口的油田城市，建筑物稀稀拉拉，基本是围绕油砂作业而建。

加拿大油砂资源丰富，综合加拿大国家能源委员会、阿尔伯塔能源储备委员会、《油气杂志》等的评价结果，加拿大油砂探明储量约为1763.8亿桶，油砂资源量大致为1.8万亿桶，分别占到世界油砂探明储量和世界油砂资源总量的80%和84%。根据加拿大国家能源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底，加拿大油砂累计产量为75.11亿桶，仅占加拿大油砂探明储量的4.25%，开发潜力巨大。

问题在于，油砂矿的开采成本太高了，这是一个需要巨大投资的行业。

即便不考虑环境成本和行业监管成本，将近来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原住民问题先放在一边，加拿大近年油砂行业的各项支出成本也呈逐年攀升的状态。有统计显示，油砂原位开采与露天开采两种方式的全周期保本成本均高于70美元/桶，就开发成本而言，油砂矿与世界各其他油种相较明显处于劣势。这样的成本水平，只有当全球资本处于超级浮滥的状态，当世界的投资者失去理性并对未来盲目乐观的时刻，才会吸引到投资者。也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加拿大的油砂才会看起来像是金矿。

事实上，由于油砂的投资巨大，前景不明，长期以来处于加拿大冻土带的油砂生产公司数量一直不多，主要企业仅有15家，其中加拿大本土油气企业有8家，非加拿大本土油气企业有7家。

显而易见的是，资本的浮滥可以推动任何事物走向极端。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城市化导致资本极端扩张的主要地方，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非常惊人。其结果就是，中国公司进入加拿大冷僻的油砂领域大幅增加投资。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石油公司通过并购方式向加拿大该行业的累计投资至少为267.5亿美元。当然李嘉诚在这个领域的投资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他在22年前收购赫斯基能源的股份时，这只不过是一家资本支出与负债过高的中型石油公司，而当年的石油价格曾跌至每桶11美元。但李嘉诚当时就曾预言：“世界石油价格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升幅，长远来说可以看好。”[注]做地产出身的李嘉诚，他本来就是城市化的受益者，投资加拿大的油砂只是从资本收益上再赚一桶金而已。

城市化推动资本浮滥，资本浮滥推动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看起来，这个对人类生存产生威胁的非理性循环似乎是可以一直进行下

去的。不过有些事情并非总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虚浮而夸张的城市化，它的脚步也有停顿下来的那一天。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事情立即会显现出本来的面目。

时间指向2015年，现在你如果再到加拿大的油砂城，情况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由于油价下滑，已经有不少大项目关停。如森科尔能源公司（Suncor Energy）一个投资额达100多亿美元的大项目已停止（已经投进了30多亿美元），损失巨大；道达尔公司的损失也很大，面对不断升高的成本和低迷的油价，该公司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已经投了不少资金的项目。“这几个月街上走的人明显少了好多！”在位于加拿大石油之城卡尔加里的英国石油中心大厦（BP Center），来自中国的中天石油有限公司总裁魏民生感慨地说。[注]失重条件下的城市化，就连加拿大人自己现在也不断追问：这个争议巨大的油砂工业，还能持续多久？

在这个问题上，说了算的是城市化。

从古罗马到现代，人们追逐资本的动力都是城市化。而以城市化为基础的资本，远远不只倾向于矿产和能源，在政治家们的推波助澜下，资本会渗透到城市化的各个角落，渗透到所有人类需要的空间领域和资源领域，而不会过多地考虑生态环境。过去参与城市化的资本，必须面对高耸入云的玻璃和钢的建筑或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品才会慷慨解囊；现在的资本，则仅仅需要一个可有可无的梦想，只要它动听到能够打动资本的管理者，哪怕仅仅是某种遥不可及的可能性，廉价不堪的资本都会蜂拥而至。

当然，从城市化的发展空间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更大的空间。

于是，印度开始引人瞩目。

印度新当选的总理莫迪是一位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城市化领域，莫迪甚至比中国政治家的积极性更高，为了让印度后来居上超过中国，莫迪建议印度要建设100个智慧城市。不过，印度《今日商业》在2015年3月15日发表的一篇报道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宣布印度将要建成100个智慧城市的计划，现在看实现起来有些困难。莫迪的宣布是在一年前，但目前印度建设智慧城市的努力仍然举步维艰。印度城市发展部部长温凯阿·奈度表示，印度还根本没有推出智慧城市的建设计划，2014年7060万卢比的联邦预算中没有一分钱用于支持智慧城市的建设。

目前印度有3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印度打算将这一数字增加到50%。也就是说，印度必须要为这8.1亿城市人口提供“良好的环境”，而目前的印度城市只是“由于缺少规划”还难以做到这一点。显然，印度不但正在大力提升城市化水平，而且也在试图效仿中国的城市化。这样纯粹的政治家梦想是否会吸引全球资本？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中国也曾经因为城市化吸引过大量的资本，并且导致资产价格屡创新高。

中国的城市化率在1978年时仅为17.92%，到了2012年，迅速提高至52.57%，在34年的时间里，令人吃惊地提高了34.6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现在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口住在了城市中，这些来到了城市的人口，不但要买房子，还要买汽车和家具，还要使用家用电器等一切必需设备，而支持这所有一切的毫无疑问就是资本。事实上，为了支持中国的这一城市化进程，中国央行同样释放出了惊人的资本总量，仅仅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中国政府就推出了所谓“4万亿”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注]，就资本规模而言，相当于中国中央政府2007年全年财政收入的80%，同时也是美国168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的3.5倍。此外，加上地方财政、投资商以及银行资本

的释放，估计在2008年之后，中国为应付城市化高速增长而释出的资本规模达到了30万亿左右的惊人水平。

从城市化到资本过剩，魔鬼总是披着漂亮的外衣。

如此大量的资本释出量，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发展问题。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后果，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产价格虚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市场危机。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从1998年到2012年，涨了3—10倍甚至更高。随手翻阅一张中国房地产的价格图表，1998年的时候，中国主要城市的通常房价还都是在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到了2010年，就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6000—7000元，一条清晰的价格曲线笔直地高高上扬，同时带给人们欢乐与哀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3年展示的一组数据显示，世界房价最贵的十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东京、悉尼、广州、伦敦和重庆，其中有7个是中国城市，还有5个在这份房价最贵的榜单上名列前茅。

在资产价格虚高方面，中国的房价首先站在了世界之巅。

以中国西部的城市成都为例，20世纪末，成都一、二环路之间的9层电梯公寓价格“喊”到每平方米2180元。在城南临近二环路附近的电梯公寓，每平方米2500元的价格表现已算很“温柔”。在城北的李家沱，房价还在每平方米1800元的上下徘徊。而在成都当时的城西，而今的浣花溪板块，已经显示出绝版地段的价值，品质好的花园洋房价格已经接近每平方米3000元。

其后的十几年，成都的房价始终保持上扬。到了2015年，成都档次高一点、地段好一点的房子都会要价12000—20000元每平方米。而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成都市场还属于比较典型的温和上涨类型，如

果到了北上广深这种高热度的一线市场，这一时期价格曲线的上扬，远比成都更为激烈。

资产价格的虚高，还反映在股票之上。

由于投资品市场开放得比较晚，中国并非一个资产品种丰富的国家，社会合法的主要投资品种除了房地产就是股票，这就导致资本过剩的狂潮不可避免地要袭击股票市场。中国的股票市场这些年也是迭创新高，但行情震荡严重，充分显示了资本的游资属性。

2007年的中国牛市中，中国船舶的股价达到了300元的天价，同时股市升到了6124点的历史性高点。2015年的中国股市，一只叫作“全通教育”的股票，达到了348元的高位[注]，成为中国第一高价股，而这个时候的上证股票指数只有3687点。2015年3月24日，该公司发布的提示公告显示，这个时候的股票市盈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748.2倍。3月25日，资产质量远逊于主板市场的创业板指数，平均市盈率也达到了91.82倍。此后，虽然天价股“全通教育”一度回落至256元，但与此同时，另一只股票“朗玛信息”却接棒成为中国第一高价股，股票价格达到了288元。

那么这家公司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原来是做互联网社交服务，再后来据说募集资金准备进入互联网医疗以及参与发起一家民营银行。就是这样的“互联网医疗+民营银行”的虚妄概念，又让“朗玛信息”的增发价格达到了惊人的158.36元/股。同样是这家公司，自2012年上市以来的3年时间里，净利润分别只有8778.59万元、5630.36万元和3474.98万元，而且一路走低。

中国是典型的资本浮滥推高的市场，这样的市场以50万亿元的储蓄为基础，几乎一面倒地会为所谓的“游资”，也就是社会资本所主导。每当出现有利的时机，市场会一哄而上，拔地而起；出现危机信号之后，又会大海退潮般地倾泻而去，难以抑制、左右和主导。因此

在资本过剩的支配下，中国股票市场的频繁震荡，甚至是市场大地震，几乎必定出现。在这一问题上，其他技术性因素是次要原因，资本过剩是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根源。

从城市发展史来看，中国实际上只是不折不扣地重蹈了日本城市化和资本过剩的覆辙。

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是和股市泡沫同时存在的，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共同构成了资产泡沫，促成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经济的形成。1985年，日经平均股价还在1.2万日元上下浮动，但从1986年起就持续上升，1989年底猛增至3.9万日元。四年间上涨了两倍。

在国民总资产的金融资产中，股票资产由1985年底的242万亿日元增至1989年底的890万亿日元，增加了2.7倍。日本上市股价总额从1985年底的196万亿日元增加到1989年底的630万日元，增加了2.2倍。股票平均价格从1985年底的608日元涨至1989年底的1626日元，增加了1.7倍。注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经济繁荣的形势下，土地价格也随之猛涨。六大城市的商业区地价指数从1986年的200上升到1990年的600多，约增长2倍。全国平均地价上涨幅度虽小一些，但增幅也在一倍以上。国民总资产中的“土地及其他项目”（主要是土地）从1985年底的1049万亿日元增至1989年底的2024万亿日元，约增长一倍。在日本约50%的人拥有土地，还有20%的人有土地继承权，真正无土地者仅为30%左右。因此日本人中的大多数感到，自己的财产在四年内虚幻地增加了1至2倍。

然而，脱离实际经济的资产价格不可能持久，势必要返回到正常水平。日经225指数以1989年为顶点转为大幅度地下降，从1989年12月29日的38915点下跌到1992年8月18日的14309点，虽然日本政府不断采取对策进行资本刺激，但股价依旧不振，到了2003年4月，甚至一度跌

至7607点的谷底。上市股价总额从1989年底的630万亿日元降到1992年的299万亿日元，3年内减少了331万亿日元。号称“没有理由下跌”的日本房地产价格，居然出现连续14年以上的下跌，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50%。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吉川元忠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该来的终究会来。

资本泡沫曾经被认为是非内生性的，经济内部没有蕴藏必然的动力，而且泡沫经济可以避免，经济周期波动则无法避免。不幸的是，这样的认识未免太过乐观、太过粗糙。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周期来看，从古罗马的“造城”开始直到今天的“造城运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几乎可以用城市化的过程来解释，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城市化展开的，人以及人的积聚，也就是社会，所追求的发展方向始终就是城市化。这个过程除了少数时期被战争、自然灾祸打断，主线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那就是对“造城”的追求。事实上，“发展”这个词几乎可以等同于“造城”，所以城市化才是造成资本过剩的内生性根源。

至于经济周期，“账房先生式”的经济学家自有一套算法和数据来评估，但对于周期系统内部的研究并不能取代和解释经济周期发生的真正原因[注]。经济周期的出现其实也是受城市化支配的，经济周期的起伏表现实际就等同于城市化受挫与爆发的必然现象，割裂开城市化这一根源，抛开世界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造城”冲动来研究这些现象，即便不能说是毫无意义，也属于对表面现象的片面结论。

我们必须牢记一点，人类社会的所有经济灾难绝非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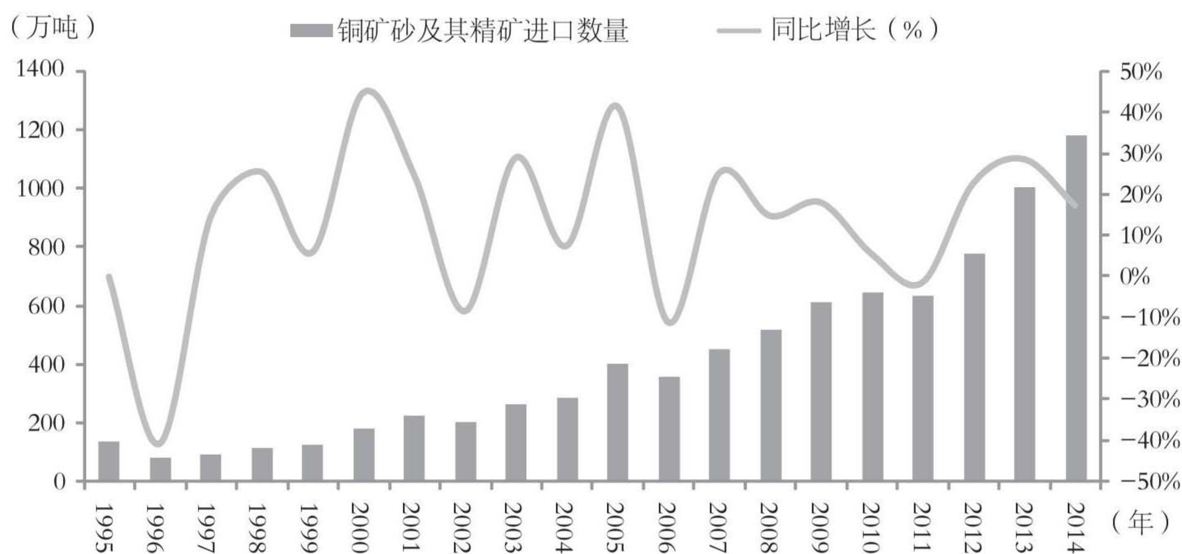


图3－1 中国铜矿进口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说明：“造城”运动总是需要各种生产资料的支持，因而金属矿、玻璃、森林、能源、水泥等来自自然界的需求会迅速上升，而资本过剩又会极大地支持这种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开发，形成一条从城市到资本再到自然界的灾难链条。中国的铜矿需求猛增与智利的铜矿开采，只是这一灾难链条中的一条，实际在“造城”运动中，还有无数这样的链条存在，它们创造了城市，创造了资本，但自然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很多还是不可逆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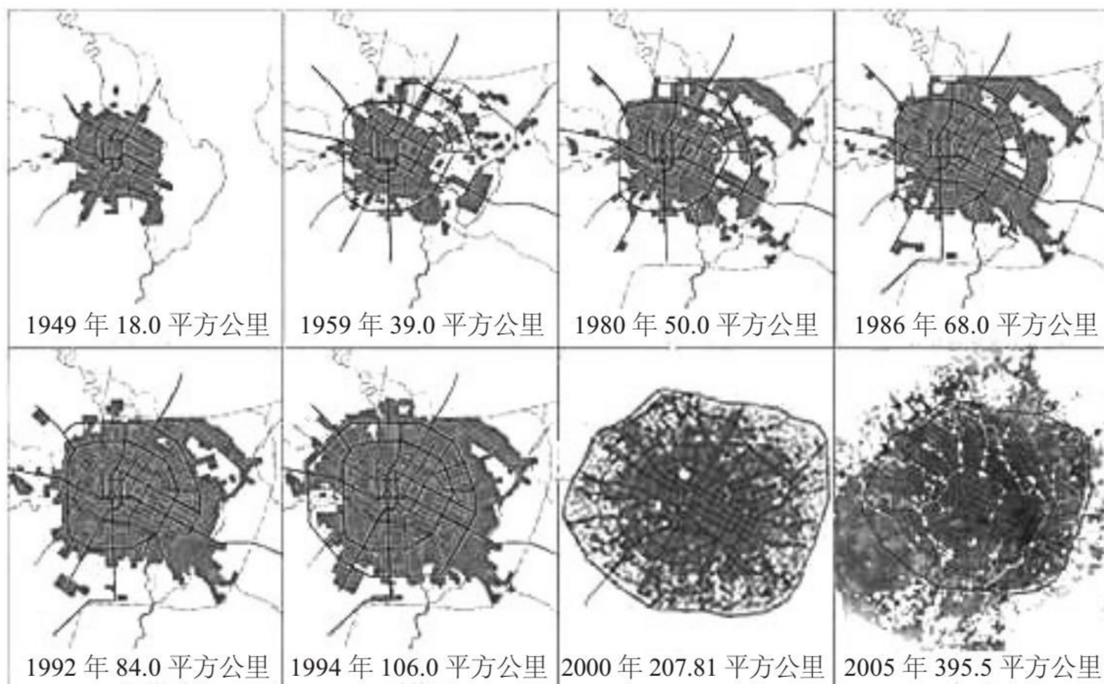


图3－2 1949年至2005年成都市建成区的扩张面积

资料来源：四川经济信息网

说明：成都市的房价在中国尚属“平稳”的，但已经清楚可见其扩张的面积之大，其他房价高企的中国城市，城市扩张的幅度更大。而所有这一切，请牢记，是由铁、铜、铝、水泥、钢筋等堆起的。所有的城市，没有无缘无故的崛起，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衰落。古罗马人为了“造城”不断去打仗抢钱，现代人向自然界索取，向印钞机要资本，华丽而更华丽的城市，就是印证。



图3－3 深圳股价与纳斯达克市场的比较

资料来源：比尔·格罗斯，凤凰国际iMarkets，2015年6月4日

说明：深证指数显示这个市场的股票是世界最贵股票，市值高于纳斯达克股票指数和摩根士丹利国际股票指数。深证综指在2015年市值曾经上涨超过一倍，达到4.7万亿美元，已超过英国整个股票市场，朝着日本的5.1万亿美元靠拢。考虑到深圳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资本过剩一旦出现在单一市场所导致的泡沫堆积规模令人吃惊。大家需要注意和思考的是，泛滥成灾的资本来自哪里？资本泡沫又是如何出现的？这些虚高的股票价格，清楚地显示城市化以及资本为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

---

1. ．《智利矿工买得起保时捷》，原载于《彭博商业周刊》，凤凰网转载，2013年9月27日，http://finance.ifeng.com/a/ 20130927/ 10771447_0.shtml。

2. ．《价值投资》，360DOC，2008年9月23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0923/12/32668_1667560.shtml。

3. .冯连勇：《加拿大油砂业，现实很骨感》，《中国化工报》，2014年10月21日，www.ccin.com.cn/ccin/news/2014/ 10/21/306656.shtml。

4. 《国际金融公报》，2008年11月11日，其中有这样的文字，“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经初步估算，到2010年底将需要约4万亿元的投资。在这其中，铁路投资将会占据一半的份额，……最新批复的2万亿元投资资金，将主要分三部分使用，一部分用于高铁建设，一部分用于城际铁路，一部分用于铁路干线的完善。”实际这是一项宏观经济的刺激计划，涉及的金额远远超过了4万亿，包括有地方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很大一部分资金，估计在30万亿左右，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投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俗称“铁公基”。——作者注

5. .《全通教育：登上348元巅峰后走下神坛》，《新京报》，2015年3月30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 2015-03/30/content_568843.htm?div=-1。

6. 凌星光：《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及启示》，《管理世界》，1993年3月。

7. 本人无意贬低不同科学框架内的分析方法，但也应承认不同的科学分析框架通常会分布于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低层次系统或是子系统层次的科学分析框架，无论使用何种复杂的数据，均很难客观地反映事物的全貌。——作者注

第四篇
资源消耗犹如战争

以1938年为基础，如果按照购买力1：16的比例计算两次世界大战的军费开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93万亿美元。这当然不是精确的数字，因为没有人能够计算生命的价值，但供我们评估两次世界大战所消耗、熨平的资本规模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发明的最残忍的资本冲销模式——战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资本浮滥的问题。

请不要忘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同样也是处于经济高增长的时代。

城市化与世界大战一样，都是需要人类社会支付巨额资本的事情。因此，战争会以可怕的方式冲销大量的资本。

2007年9月，一位北约历史学者在布拉格发现一份17页的文件，苏联当年制订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计划就此浮出水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件解密，外界对苏联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也了解得越来越清楚，这份计划为人类的嗜血战争勾勒了一幅可怕远景。根据计划，苏军总参谋部将全球划分为14个战区，覆盖了从远东到北冰洋的广大区域。最激烈的战斗将发生在中欧。1977年，库利科夫调任华约组织总司令，指挥着驻扎在民主德国的7000辆坦克、6500辆装甲运输车和700架飞机，以及华约国家的100个师近200万名士兵，随时准备对欧洲腹地发起致命一击。注

然而，这些还并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作战力量。按计划，苏联军队“一旦受到帝国主义”攻击，将以核弹为先锋，第一波发射131枚核导弹或核炸弹，消灭北约军事力量，摧毁西欧国家的机场、通信中心、政府机构、发电厂以及交通枢纽。解密的华约部队作战地图显示，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德国的慕尼黑等重要城市都被以红网标注，很明显是打击的主要目标。为加快作战节奏，华约部队将在核弹爆炸90分钟后冒着核辐射大举出动，兵分三路，杀向欧洲腹地。

冷战史专家发现，为应对苏联的进攻，英国当年也制订过一份核反击方案。不过专家认为，与苏联的战争计划相比，这份方案更像纸上谈兵，纯粹是心理安慰之举：面对苏联军队的突然袭击，英国如何能保存自己有限的核力量，又如何能将核弹投射到苏联领土上去呢？

没有人能够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军费开支将会有多大，核战争甚至可能直接终结人类的存在。不过，人类为了战争的胜负总是不惜血本的，一场战争究竟能够消耗多大的资本？这个数字恐怕没人会知道，也不会有人可以精确计算。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将以往战争的成本来比较评估一下。好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费开支，学界已经有了长期的研究，虽然谈不上精确，但披露出的数据已经足够惊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帝国主义的野心，给参战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战历时四年，战争期间，协约国总计动员军队4218万人，损失2210万人，其中死亡515万人。同盟国方面总计动员军队2285万人，损失1540万余人，其中死亡380万人。一般认为，交战双方直接军费约为1863亿美元，各交战国的战争损失达3316亿美元[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战争。仅在欧洲，战争破坏造成的物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可达当时的2600亿美元。军队死亡1690余万人，居民死亡3430余万人，合计死亡5120余万人，仅苏联就达2000余万人。同样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交战国的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为1.3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收入的60％—70％，各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4万多亿美元。

由于币值不同、时代不同，以1938年为基础，如果按照购买力1∶16的比例计算两次世界大战的军费开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93万亿美元[注]。这当然不是精确的数字，因为没有人能够计算生命的价值，但供我们评估两次世界大战所消耗、熨平的资本规模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发明的最残忍的资本冲销模式——战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资本浮滥的问题。

请不要忘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同样也是处于经济高增长的时代[注]。

曾经有一位欧洲人用带着眷恋之情的文字描述过那个时代的普遍繁荣：“也许向今天这一代人描述我们当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是困难的。我们欧洲所有国家，几乎普遍感觉到的繁荣业已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华美，人口一年比一年增多。1905年的柏林已不能和1901年见到的柏林相比较，柏林已从一座首都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些城市，我每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人们从各种事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这样一些先前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施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自从工作时间缩短以后，无产阶级也发家致富起来，至少有一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谁敢作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书或一张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愈是大胆，愈是舍得花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愈能保险赚到钱。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

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注]

令人感到奇妙而又困惑的是，历史的轮回让我们现在又面临同样的情况。而且这一次同样是城市化，以及遍及世界的为壮丽城市所驱使的“造城运动”。

世界银行对全球2000年至2010年的基础设施项目市场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即便不包括发达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市场，仅仅计算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以及私人企业部门参与的投资，在这10年间，在电信、能源、运输、供水和医疗设施的建设方面就投资了109万亿美元[注]；并且根据麦肯锡的研究，从2013年到2030年，全球还有5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注]。在房地产直接成交额方面，一家针对全球房地产市场公司戴德梁行（DTZ）开展的研究表明，虽然世界各地历年的房地产成交额波动较大，但仅在2014年，全球房地产市场就创下13.6万亿美元的成交纪录，同比增长了4%[注]。以这些数据粗略估计，从1998年至2014年的15年间，世界城市与“造城”相关的资本形成总规模已经大大超越两次世界大战所耗费的资本规模。

如此的资本过剩景象将会令世界重蹈战争的覆辙吗？没人真正知道答案，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1998年到2013年，世界房地产繁荣，资本规模的影响几乎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世界各国的政治舞台到城市的家庭生活，从宗教冲突到自然界的呻吟。世界的疯狂“造城”运动，在奠定金融资本、矿业采掘、土地开发、房屋建造、消费品制造、能源建设以及交通网络等诸多领域繁荣的同时，也奠定了灾难性全球经济危机和剧烈冲突的深刻基础，问题只是现在人们大都还不愿正视这个曾经被人百般称颂的“繁荣”背后的隐患。

事实上，世界的“造城运动”所引发的巨大风险，即便是喜欢看到房价上涨的房地产从业人员也有所担忧。有人表示，在超低利率环

境中，手握大量现金追求回报的投资者，是房地产市场这波繁荣的主要推动因素。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所有地区的杠杆都出现了下降，原因是银行继续缩减对房地产市场的敞口。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5年里，受惊的银行业一直在撤出这一领域。戴德梁行则警告说，寻觅房地产交易的资金如此之多，在部分市场已经引发了过热迹象。接受该公司调查的房地产业人士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资本过剩是这一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

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研究主管约兰德·巴恩斯（Yolande Barnes）则开始尝试反思这一轮房地产热潮，他将之归咎为“表面上的金融环境”。他指出，在整个发达世界里，资本集中于老一辈、自有房产的家庭手中。在全球范围内，资产富裕的“婴儿潮一代”（Boomers）和资产贫乏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之间的年代差异不仅显而易见，而且在不断增长。战后婴儿潮一代生活在一个高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时代，这种条件有利于买房和快速偿还债务。

“造城运动”所引发的潜在问题也引起了联合国的重视，但联合国的观点更侧重于世界城市化的进程能否持续下去，以此“造福”人类社会，而不是担忧由此可能引发的全球危机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更为沉重的打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部人口处的统计数据显示，1900年至1950年，世界的城市化从13%到29%，而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0%。2014年7月10日，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70亿人口中有一半目前生活在城市地区，到2045年城市人口将超过60亿。与此同时，联合国的报告也警告说，这些国家面临的关键挑战将是为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诸如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和就业等基本的服务。

所有这些都需要资本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城市化高度乐观的支持者们忽略的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对待资本规模扩张

之后的资本过剩问题。他们沿着惯性思维一味思考着如何延续这样的荣景，让其永不落幕，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也曾在亚洲和非洲建设了一批3万—5万人口的实验性小城市，试图平衡大中城市的发展，但实验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吸引不到足够的人口，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在整个20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量日益增多，其拥有的人口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在大中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大部分小城市在萎缩。在日本和美国中部地区，1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都在萎缩，只有大城市周围的小城市保持繁荣。如加州的硅谷就主要是得益于大城市的辐射和小城市的产业结构，而不是来自小城市自身规模的活力。

所以，城市化的问题被其支持者们不可思议地高度简化了，似乎城市化仅仅是一个城市建设的问题，最多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他们回避了城市化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回避了城市化与世界经济周期构成之间的敏感关系。实际上，世界经济周期的形成，正是由于世界城市化的推动，两者的关系呈现典型的正相关。

根据联合国统计司的数据，世界从1960年开始，到了2000年后明显进入了一个高增长时代。2000年初的时候，全球GDP总值是33万亿美元；到了2013年，全球GDP总值已经达到75万亿美元，整整增长了1.3倍。从1960年开始的这一个时期，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城市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但同时也请不要忘记的是，这仅仅是大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城市化所推动形成的几个经济周期中的一个。而且城市化的背后，还有一头怪兽在嗷嗷狂吼，这就是资本过剩以及后来的群魔乱舞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要消除这种潜在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熨平浮滥资本，人类社会通常会做一些或痛苦或快乐的尝试。

第一种尝试是战争，我们已经看到世界范围的无节制“造城运动”所掀动的资本规模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同，如果存在某种形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注]，那么它的血腥存在也是为了消化掉这种资本的浮滥，这是人们在狂喜之后需要付出的代价。第二种尝试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无论是哪一种市场表现，其目的都是冲销掉资本过剩，让生态、资源、商品和服务重新体现出实际的价值。当然，这种让名义价值大贬的方式，为世界带来的痛苦并不亚于战争。第三种尝试比较无痛苦，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在理论上可以吸纳大量的资本，但关键在于它是否真的可以创造出更强劲的生产力。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世界正在努力这样做，尽可能地吸纳大量浮滥资本，只是前景不明，因为令人羡慕的“生产力的创造”大多还停留在纸面上，而不是实际的就业、增长以及对文明的建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0年，科技公司的产值贡献只占所有经济活动总量的7%。像苹果公司那样的科技企业，每诞生一家，同时会伴有数十家科技公司破产[注]。第四种尝试是税债冲销，以福利的名义，大幅度增加税的品种，发行大量的债券，冲销资本，这同样是一种用痛苦来冲销繁荣的方法。第五种尝试是金融创新，这是一种痛苦与快乐兼而有之的尝试。这方面的责任主要是在华尔街，美国人在金融创新方面也有着看似无穷的干劲，可惜他们失败了，最佳的证明就是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家们在华尔街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试图消除资本过剩主要市场表现之一的债务规模，延展违约事件，缓和违约压力，但最后随着CDO和CDS等金融发明的破产而告终。

城市化导致的周期性风险依旧存在。

这样巨大的风险是一场人类社会的“战争”吗？或许不是战争胜似战争。人类社会已经经历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但这一次规模和烈度更为空前剧烈的“战争”，则是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因为在城市化日益演变为世界各

国的政治追求，人类的物质欲望被无节制地释放和激励的现代，这种条件下的城市化，对自然界的掠夺性与战争是完全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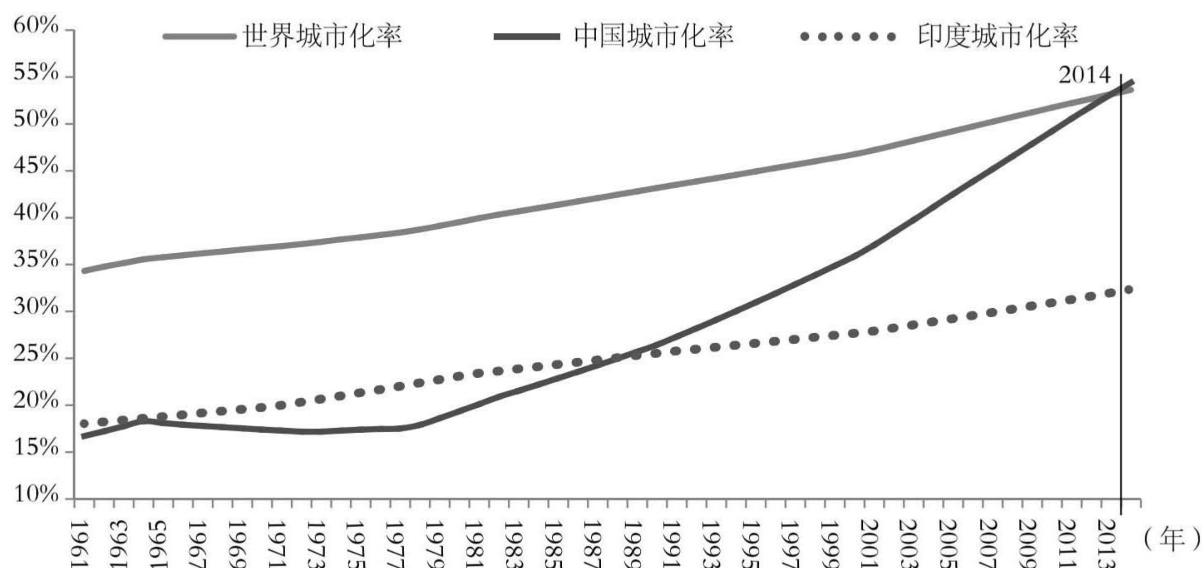


图4－1 世界的城市化率以及与中印两国的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说明：战争与和平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动乱纷扰的时期，城市化相对迟缓，资本因为战争被大量削减；和平时期，城市化则进入快车道，资本迅速积聚。大致看来，世界的城市化率始终在上升当中，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来，上升趋势更为明显。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后的上升则更是完全可以用“浪潮”来加以形容。至于内部纷争不断的印度，城市化则较为平稳，大致与世界的平均水平同步。城市化的速度非常之快，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很难想象在如此快的城市化速度之下，在世界各国“利用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高调口号之下，城市能够妥善解决发展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一向认为，增长中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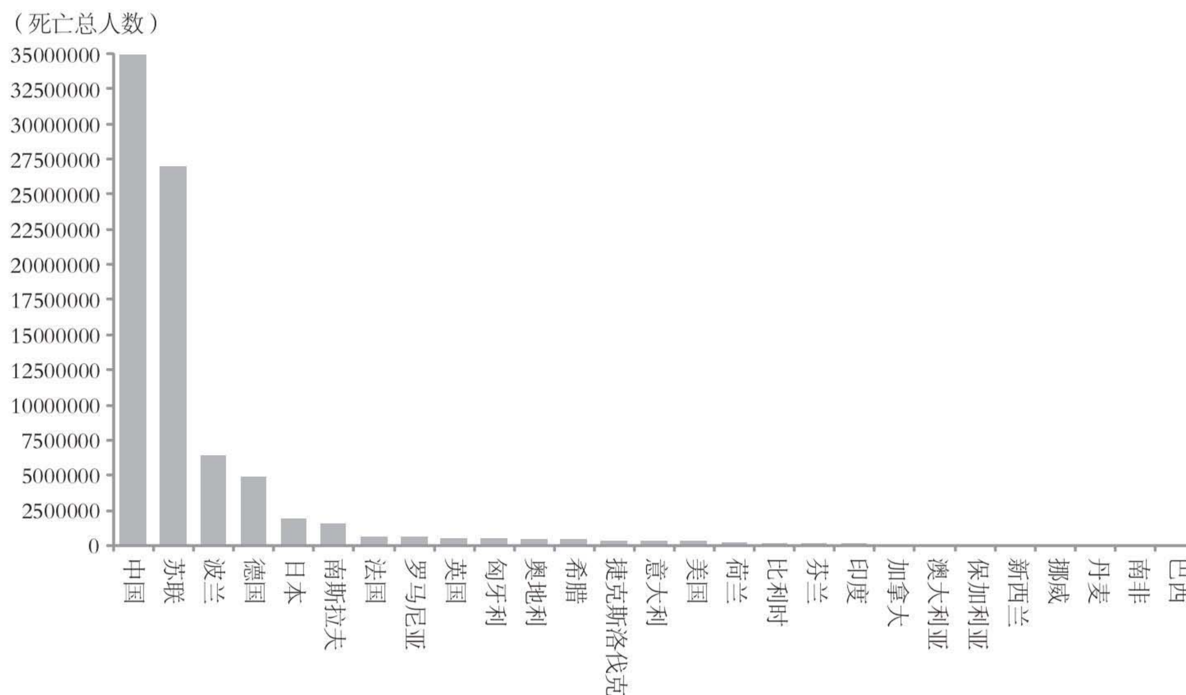


图4－2 “二战”死亡人数

数据来源：新华社（其中没有包含加拿大、新西兰、南非以及巴西的平民死亡人数）

说明：现在资本过剩的规模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损，这样惊人的规模不是无意义的。它启示着我们，从历史到现在，每一轮的城市化高峰过后都面临剧烈的“调整”，这种“调整”还往往意味着战争。而战争也的确扮演了资本过剩的最有力的剪刀手，以巨大破坏的形式，平抑资本过剩，同时推动形成下一轮城市化高潮。人们有时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一个可怕的问题是：高潮过后，留下的是什么？

1. .《苏联曾密谋第三次世界大战：计划发动核攻击》，《华西都市报》，2013年7月12日，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7/12/27424084_0.shtml。

2. 根据一般出版物的粗略统计。——作者注

3. 1938年1美元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6美元，是根据网络数据的粗略估算。当时一辆福特500—600美元，教师年薪约800美元，兼职帮工周薪2—3美元，那时在美国，35美元算是低收入水平。——作者注

4. [美]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佘江涛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作者在书中以德国为例指出，即便是小零售商的数字也在1907年至1925年出现了戏剧性的增长，从69.58万增加到84.79万，增长率为22%。而1870年至1914年则是新帝国主义追求市场空间的时代，代表着对海外殖民地的系统开发。——作者注

5. [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吴桐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写于1939年至1940年。

6. 世界银行：《2012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7. 麦肯锡公司：《基础设施产出：如何每年节约1万亿美元》，公司报告，2013年1月30日。

8. 申敏雅：《年成交量超10万亿美元全球房产市场“过热”》，《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6月17日，http: //house.hexun.com/2015-06-17/176785833.html，

9. 陈功：《文明冲突的下一步是全球宗教战争》，360DOC，2015年11月17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17/13/10155602_513807786.shtml。事实上，作者倾向于认为，一场全球性的宗教战争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作者注

10. [美]纳特·西尔佛：《信号与噪声》，胡晓姣、张新、朱辰辰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

第五篇
自然界走向崩溃

>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自由竞争的市场几乎就是自然界的一个天然敌人，而政府机构，尤其是那些立场比较中立的政府机构，则尚有希望扮演更为有利于自然的角色。事实上，这也几乎是我们这个世界唯一的希望。

城市化是一场针对自然界的掠夺性战争。

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2000多年后列夫·托尔斯泰也讲过这样的话：“在从乞丐到百万富翁的男子当中寻找，1000人中你也不会找到一个对自己财产满足的人……今天我们必须买一件外衣和一双与之配套的鞋子；明天，我们还得买一块手表和一条项链；后天，我们又必须在一所大公寓里面安装一个沙发和一盏青铜灯；接着我们还必须有地毯和丝绒长袍；然后是一座房子、几匹马和马车、若干油画和装饰品。”㊟

对于这些反消费主义的言辞，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人类的贪婪正是造就进步的动力。但这样冠冕堂皇的话，并不能代替危险的现实，因为自然界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预测，到2050年将有2.89亿公顷的热带雨林遭到砍伐。该中心的研究指出，这一结果对气候的加速变化有危险的含义。因为砍伐热带雨林将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1690

亿吨，相当于4.4万座燃煤电站运转一年所释放的二氧化碳。环境经济学家乔纳·布什指出，“迄今砍伐热带雨林的最大驱动力是农业产业化生产的全球交易商品，比如大豆和棕榈油”。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消费水平必然日渐提升，日常生活中对于油脂产品的需要节节提高。所以说白了，热带雨林的丧失还是为了满足城市化的需要。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普利策奖的得主，他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以复活节岛为例，研究过社会发展对自然界造成的破坏，他的研究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无懈可击，因为这不是一种实验室研究，而是戴蒙德发现的一次违背人类欲望和理想的自然实验。

现在的复活节岛是一个全球著名的旅游胜地，从智利乘坐喷气式飞机也要5小时才能到达。人们只要登临这个小岛，就会看到很多高大的石像，这些石像清一色都是长耳朵无腿的男性巨人，大部分15到20英尺高，但最高的石像可以达到70英尺的高度，比一栋现在的5层楼还要高，重10到270吨。在复活节岛上，这种石像分布在火山口的周围，总数有397座。沿着海岸线，还有300多座废弃的平台，原本也是为了摆放这些石像，而且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曾经摆放过石像的，只是后来石像被推倒在地，故意被毁坏，甚至被弄断头部。

复活节岛是1722年由荷兰探险家雅各布·罗泽维恩发现的，早在这位欧洲探险家到来之前，岛上的神秘事物就已经存在了。他看到了很多的半成品石像，甚至还有工地，散落的锤子、凿子等工具，以及石像外表人为的破坏痕迹。他发现，原始的岛民仅拥有几只漏水的小木筏，最多只容一两个人。他对自己的发现大惑不解，他在日志中写道：“我们看到石像后大为惊诧，实在无法理解这些人在缺乏厚重木材和粗壮绳索的情况下如何竖立起30英尺高的巨型石像。”他看到的复活节岛一片荒芜，不但没有任何树木，灌木杂草也最高不过10英

尺。而要雕刻、运输和竖立这些巨型石像，需要一个复杂且人口众多的社会，必须仰仗富足的环境才行。

这些谜团困惑了人们达3个世纪之久，而这个谜团的解开也令人深感震惊。

原始的岛民早在约公元1200年就来到了复活节岛，这些岛民的数量，根据科学推算，最多时可达3万人，每平方英里就有90—450人，岛民们为了提高农业产量而精耕细作，为此甚至建起石头砌就的防风墙，并用石头来保护植物的根部。就像所有地方一样，随着生活的富足，人口开始增长。岛上的土地被分割，然后成立了各自的部落和社区，每一块土地都有自己的酋长和放置石像的祭祀平台。再接着，就是社会的纷争和残忍的战争。

几个世纪以来，复活节岛上的酋长们认为这些石像代表着力量和实力，他们互相竞争，比谁建的石像更为巨大、更为壮观。有人竖起五个并排巨像，随即就有人竖了十个；有人雕出一座最高的人像，随后在自由竞争的催生之下，就有对手就在自家人像头上再加上一个12吨的大石冠。然而，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并不简单，需要砍伐无数巨木充当搬运工具，还得拼命砍伐森林，造田养活劳动力。科学家们计算的结果是，为了建造石像，粮食需求比复活节岛人口的需求量还要再多出25%。

根据花粉以及碳测定，原本复活节岛上森林密布，依赖森林的野生动物到处都是，为人类提供了很好的繁衍之所。人类抵达后开始砍伐森林，开辟土地，到了15世纪，终于达到了高峰，而到了17世纪复活节岛上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随着森林的消失，食物开始短缺，于是竞争发展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阶段，人们开始了战争，推倒石像，开始互相残杀吃人肉。岛民们的口头历史中充满了人吃人的故事，据说对敌人最具攻击性的辱骂莫过于：“你妈的肉塞了我的牙缝。”

到了1774年，库克船长再度发现复活节岛的时候，这些欧洲的船员看到的岛民，只能用“瘦小”“胆怯”和“凄惨”来形容。船员们的记录显示，岛上的人口已经大为减少。见到了欧洲的船员，这些岛民试图要求进行交易，他们激动而绝望地不停地大喊着一个词“米鲁”“米鲁”。而困惑的欧洲人后来搞清楚了，原来“米鲁”这个词的意思是建设船只所必须要用的大型木材。

作为一个自然实验样本，复活节岛为人类社会展示了一幅末日图景。从繁华到没落，再到绝望和自相残杀，最后是苦苦挣扎。这些石像的社会作用和价值，宛若现代社会中的由玻璃和钢铁搭建的扭曲而豪华的超现实建筑，它们是社会发展的符号，现代化和财富的象征，也是灾难的开始。盛极一时、灿烂辉煌的人类社会——在我们眼前闪现，然后又轰然崩溃。

同样的事情还有可能再度发生于世界其他地方吗？现在依旧可能再度发生吗？答案是肯定的。曾有学生问戴蒙德：“当那些岛民砍下最后一棵树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呢？难道人能蠢到这个地步，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行为把自己推到灭绝的边缘吗？”戴蒙德的答案是，因为砍掉最后一棵树的岛民并没有见过最初的森林，这种“景观失忆”是人类常犯的毛病。

在戴蒙德看来，如今世界正处于环境破坏与筹划对策的过程中，他自称为“谨慎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人们至少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戴蒙德和《崩溃》一书的认同者显然都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城市的未来，需要新的发展哲学，虽然远在数千年前古罗马时代的维特鲁威已经清楚地告诉过人们这一点[注]。

关键是财富和自然的关系，为克制自由市场竞争所极易导致的竭泽而渔，世界银行在1999年提出了“真实储蓄率”的概念[注]。真实储

蓄率是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指标。提出这一指标是为了直接说明一个国家是否走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之上。它衡量的是财富被创造或被破坏的速度，即在考虑了人力资本投资、生产资源的损耗以及环境的损耗和破坏后得出的真实储蓄。真实储蓄如是负数，那就说明财富总额在减少。不过，世界银行的这个所谓的绿色指标，虽然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效果有限，因为财富总额依旧在其中起着支配性作用，而且竞争因素也没有被排除掉。如果财富总额较大，依然会显示数额很大的真实储蓄，甚至还可能会成为进一步促进激进经济政策的理由。

如撒哈拉以南的贫穷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真实储蓄率急剧下降，一直是负数；加勒比地区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国家，真实储蓄率也是负数。而中国的真实储蓄率却高居世界第二，海地则成为世界第一的真实储蓄率国家。至于厄瓜多尔，石油的勘探和开采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益处，他们的真实储蓄率一直是零。

近几年还有一个概念开始出现——生态矿业，这是人类社会在意识到经济发展对地球环境的强烈干扰之后开始酝酿的。长期以来，矿业免不了受到环境的诅咒。中国从来都是一个矿业大国，矿产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之一。但只要有煤炭、水泥和矿业设施，附近的环境就无不遭殃，街道上重卡飞驰，城镇笼罩在废气和尘土之中，河流为之变色，水体臭不可闻，有毒矿渣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和良田。

目前世界每年的矿产品总消费量达500亿吨以上，这个数字约是世界所有河流每年搬运入海的沉积物的3倍。世界各国的工业为了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利用的矿物已经有450种左右，而元素周期表中可提取利用的元素只有70多个。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现在矿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已经远不是20世纪70年代那样只有石棉、汞、铅、镉等少数几种矿产品的影响。事实上，从矿产的开发和毒理的角度来看，不仅

仅是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以及能源矿产的开发和利用都会给自然环境带来不良的后果。

据保守估计，每年仅从选矿及冶炼厂释放到环境中的镉金属就有7000—70000吨。1750年至1880年期间，有多达2%的铅在冶炼过程中转变为气悬颗粒，1960年以后这一数字降为0.06%。镉可以引起肠炎和心肝肾的病变以及化学性肺炎，铅会危害人体造血过程，锌、铜、镍、钼、锰、铬、钒、钴、砷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毒理效应。突出影响环境的几种非金属矿产品如石棉、磷酸盐岩、萤石、硫、硅藻土等，可以诱发石棉沉着病、肺癌以及间皮瘤等疾病。

对阿拉伯国家环境的研究指出，约旦的磷采矿剥离出3.71亿立方米的覆盖岩土，导致整个约旦约有18%的耕地为采矿及废石场所占用，而用磷酸盐岩矿石生产磷肥中产生的磷石膏废料是一个重要的污染源。磷酸盐岩中的镉含量是磷肥使用时的一大障碍，因为其所含的镉从磷肥而到土壤，再进入人体，参与整个地球化学循环，危及人类健康。此外，建材用砂石的开采对环境也有很大破坏，最直观的影响是破坏自然景观，包括农田、林地、湿地、动植物群落等，危及生态平衡，并且还影响到水文、农业、交通设施，等等。[注]

矿产品的开发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壮丽城市的背后，是自然界的呻吟和惩罚。

北京的空气污染和尘霾众所周知，所以有人发明了一个词叫作“北京雾”（Beijing Fog），实际世界主要大城市的天气都好不到哪里去。

英国《独立报》网站2015年3月23日报道劝慰法国人说，对巴黎人来说，他们可能还要继续忍受雾霾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不过与其他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居民所面临的情形相比，这都不算事儿。来自英国的安慰是有原因的，在过去的一周，巴黎当地政府的决定已经惹恼了巴

黎的市民和往返巴黎的通勤者。为了还这个风景如画的首都一个蓝天，巴黎市政府对巴黎市内上路的车辆数目进行了限制。

对大多数国家的首都来说，情况更为糟糕。

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公布的涵盖2008—2012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以及印度首府德里，这些城市空气中的污染物是巴黎的2倍多。在欧洲内部，情况也没有多大改观：克拉科夫、伦敦和柏林的空气污染指数也相当高。

法国一家专门对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的非营利性组织——大巴黎地区空气质量监测网提供了一些数据，PM10——空气中能够引发严重健康问题的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立方米100微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PM10浓度水平控制在每立方米20微克以下为宜。不过全球很多城市的PM10浓度都远远超过了这一标准，以2015年3月22日为标准来看，迪拜160μg/m^3、多哈160μg/m^3、乌兰巴托150μg/m^3、开罗140μg/m^3、安曼135μg/m^3。克拉科夫市内道路旁的观测记录显示，3月22日的PM10浓度也达到了100μg/m^3。英国伦敦的PM10在3月22日也达到了48μg/m^3，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μg/m^{3}要高出1倍多[注]。此外，柏林还面临二氧化氮（而不是PM10）严重超标的问题。

彭博社在此后不久的2015年4月21日的报道中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新报告中，对中国城市化的进展表示惊讶，因为35年来，有5亿多人迁入城市，让中国超大城市数量现在达到了15个，世人似乎大大低估了中国超大城市增长的规模。但经合组织的这一研究报告对这样的城市化速度明显持保留态度，这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组织指出，在中国，空气污染每年导致35万人死亡。在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城市环境空气污染数据库收录的112个中国城市中，只有22个城市的空气中细颗粒物浓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城市发展的背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社会在发展之余，应当回答一个问题：多少算够？

答案是：几乎永远没够！

美国著名的纽约世界观察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艾伦·杜宁（Alan Durning）写过一本书《多少算够》，他在前言部分就写道：1992年早春，当我在华盛顿特区写这本书的时候，明尼苏达州布鲁明顿的建筑工人正在加紧完成世界上最大的购物街。这个购物街是环绕一块3公顷的室内娱乐公园而建的一座大型的批发兼零售的商店，它的设计者们称它是“美国之街”，并且如果他们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个购物街每年将吸引比麦加和梵蒂冈更多的参观者。

艾伦·杜宁就这样开始了对消费主义的口诛笔伐。

消费社会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由于它自己和它的星球的未来可居住性的原因，所有的父母都想给他们的孩子一个较好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生活不可能由更多的小汽车、更多的空调、更多的预先包装好的冷冻食品以及更多的购物街组成。

艾伦·杜宁指出，人类社会因为消费的差异而被划分为几层，它们是消费者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穷人。消费者阶层有11亿人口，中等收入阶层有33亿人口，而穷人有11亿人口。消费者阶层食用肉制品和加工过的袋装食物，并且饮用那些装在由不可降解材料制成的容器中的软饮料或其他饮品；大量的时间待在装有空调的建筑中，这些建筑配备着冰箱、洗衣机和烘干机，还有充足的热水、洗碗机、微波炉和许许多多的电能驱动设备；乘坐私人汽车和飞机旅行，并且被大量暂时性的、一次性的物品包围。这样的消费者阶层把世界总收入的64%带回家中——比穷人多32倍。

这样的消费者阶层遍布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城市居民以及中东的石油酋长国居民。也许半数的东欧人和英国人也属于消费者阶层，还有五分之一的拉美、南非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的居民，也属于消费者阶层。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宣布新经济福音，他宣告，美国经济的“首要目标是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以后的几代人忠实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平均算来，今天的美国人比他们的父母在1950年时，多拥有2倍的汽车、多行驶2倍半的路程、多使用21倍的塑料和多乘坐25倍距离的飞机。

自从消费社会在美国诞生以后，尽管它的最明显特征仍然保留在美国，但它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美国国界。消费社会的核心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从美国扩展到了西欧和日本。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德国和英国加入进来，钢材的人均使用量增加了一倍，水泥和铝的进口量增加了一倍多，纸张的消费增加了2倍。今天的每个日本人平均比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人多消费4倍多的铝、几乎5倍的能源和25倍的钢材，人均拥有那个年代4倍的轿车。

对于消费主义的扩张，英国经济学家保罗·伊金写道，有一种文化倾向认为，“拥有与使用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的物品和服务”，是主要的文化志向和可看到的最确切的通向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成功的道路。在美国学生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把“有许多钱”列为“尤其重要”的百分比从1977年的不到一半，上升到了1986年的三分之二，居于生活目标条目的首位。而社会极端的荒谬情景也出现在这个阶段，纽约许多每年挣6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雇员觉得自己很贫穷，为此经受着焦虑和自疑的折磨。一个沮丧的经纪人哀叹：“我一文不值，你明白，一文不值。因为我一年只挣25万美元，那什么都不能干，所以我什么都不是。”

对鼓励自由竞争的市场而言，消费主义显然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市场规模和空间。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谈论鞋子的特性，你只需要一两双。如果谈论流行式样，你就是在谈论无数双鞋子”。所谓“市场”这个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美国的青年人每年被大约2亿美元的广告费所推动，使他们购买鞋子销量的30%。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自由竞争的市场几乎就是自然界的一个明显的敌人，而政府机构，尤其是那些立场比较中立的政府机构，则尚有希望扮演更为有利于自然的角色。事实上，这也几乎是我们这个世界唯一的希望。

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就处于合作当中。由于人们焚烧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等，以及砍伐森林并焚烧树木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透过性，而对地球发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吸收性，能强烈吸收地面辐射的红外线，导致地球温度上升，即温室效应。全球变暖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不仅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还威胁人类的生存。

为阻止全球变暖趋势，1992年联合国专门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公约于同年在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签署生效。依据该公约，发达国家同意在2000年之前将他们释放到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至1990年时的水平。另外，这些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60%的国家还同意将相关技术和信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技术和信息有助于后者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截至2004年5月，已有189个国家正式签署了上述公约。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愿意为自然界付出努力。

总体来看，艾伦·杜宁在清算消费主义的道路上，算是一个生态乐观主义者，他在《多少算够》这本书中，扮演的是一个布道者的角色，书中充满着神圣劝告的意味。他盛赞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讲话：“金钱从没有使一个人幸福，也永远不会使人幸福。在金钱的本质中，没有产生幸福的东西。一个人拥有的越多，他的欲望越大。这不是填满一个欲壑，而是制造另一个。”他虽然对消费主义做出了宣战，指出“不消费就衰退”根本是一种神话，但就现实世界而言，明显看来指望不大。

寻求与自然的和谐，自古皆然，唯有现代人似乎不懂。

古罗马时代，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就对城市设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尽量强化城市与自然的和谐。要求城市的设计必须充分利用好阳光、土壤、岩石和地形，他甚至用古希腊的例子来劝告罗马皇帝，没有必要轻视泥砖墙体建筑，即便是希腊的强大国王，有赋税和战利品，完全可以建设大理石建筑，但他们也没有这样做，而是善用泥砖建筑。而远在公元前27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就颁布了法律，要求对建筑物的高度进行限制，同时界墙的厚度不得超过一足半。这一切努力，都与避免浪费、节约资本有关，让城市尽量与自然构成和谐的环境，同时又不失壮美。应该说，古罗马人做得很不错，所以现代人迄今还怀着敬仰的心情去参观他们创造的奇迹。但遗憾的是，一旦现代人拥有了对城市进行肆意改造和设计的权力，似乎立即就忘却了一些本应牢记的东西。

时间虽然过去了很久，但在发展哲学方面，现代人并未超越古罗马人。

究竟何为“现代”，何为“进步”，依旧是个严肃的发展哲学问题。

人类社会的生活，始于“洪荒时期”，这个时期的人类，生活艰难，与洪水猛兽竞争生存，没有生命保障；这个时期的人类，一切皆由大自然的环境左右，听天由命，因而人与自然极为均衡。接着而来的是农业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掌握了种植和畜牧，从这个时候开始，生态环境开始受制于人；城市开始出现，人口开始增加，但人们基本上还保持着对自然的尊重，就地取材的造城方式，对自然环境的干预和改造力度也比较小。第三个时期是工业革命时期，这个时期城市的建造都采用大规模的方式，人类也获得更多的技术和能力，不但对陆地表面造成了极大变化，而且还影响到海洋和大气。第四个时期是科技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人类在这个时期因为科技发展，获得了极大的干预自然能力，而且这种干预早已超出适度的范围，甚至超出了地球，影响到宇宙空间。

可以这样说，人类对自然界最大的破坏就发生于这个科技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对自然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其程度完全可以用摧残和滥用来形容。

自然界不仅仅提供了矿产和商品，它也是重要资本的源泉。

历史上，黄金是一种重要的矿藏，更是一种作为货币的金属。我经常看到大段大段的金融学家对黄金本位制度的解释，现在想想都是市井之言，极少切中重点。黄金是自然界中的有限矿藏，黄金本位是古人用自然界的约束条件来抑制资本贪婪的高明做法。到了信用经济的时代，纸币的发行终于挣脱了黄金的约束，信用停留在理论之上，各国的纸币却早已如雪花般飞舞。人类的贪婪和索取，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无法抑制，虚假的信用为精心设计的各种纸面财富所代表，人们已经习惯用数据来代表真实，虽然数据不能吃，也不能喝。到了这个阶段，人类有着表面辉煌的城市，但人与自然已经彻底失去了平衡，资本必然失控，资本过剩必然形成，这一切都是无法遏制的事情。

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在其散文集《崩溃》一书中曾经写下一个名句：“毋庸置疑，所有生命都是毁灭的过程。”那么这些生命积聚在一起呢？

这或许就是人与城市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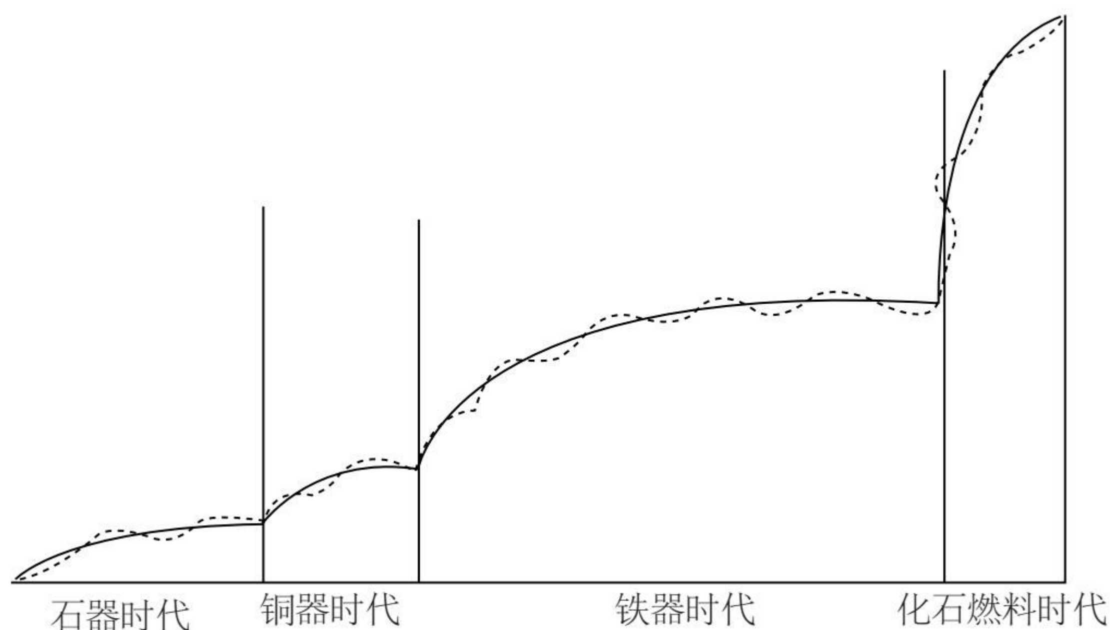


图5－1 人类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能源以及对自然界的干预程度
资料来源：Martinez-Alier，1987年
说明：现代生产活动包括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持，需要更大程度对自然界的干预，造成自然界巨大而且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害。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只有极少部分人会认真考虑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问题，而大多数人只是顺其自然，坦然接受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甚至不择手段地去索取。这样的发展模式和进程，是否值得认真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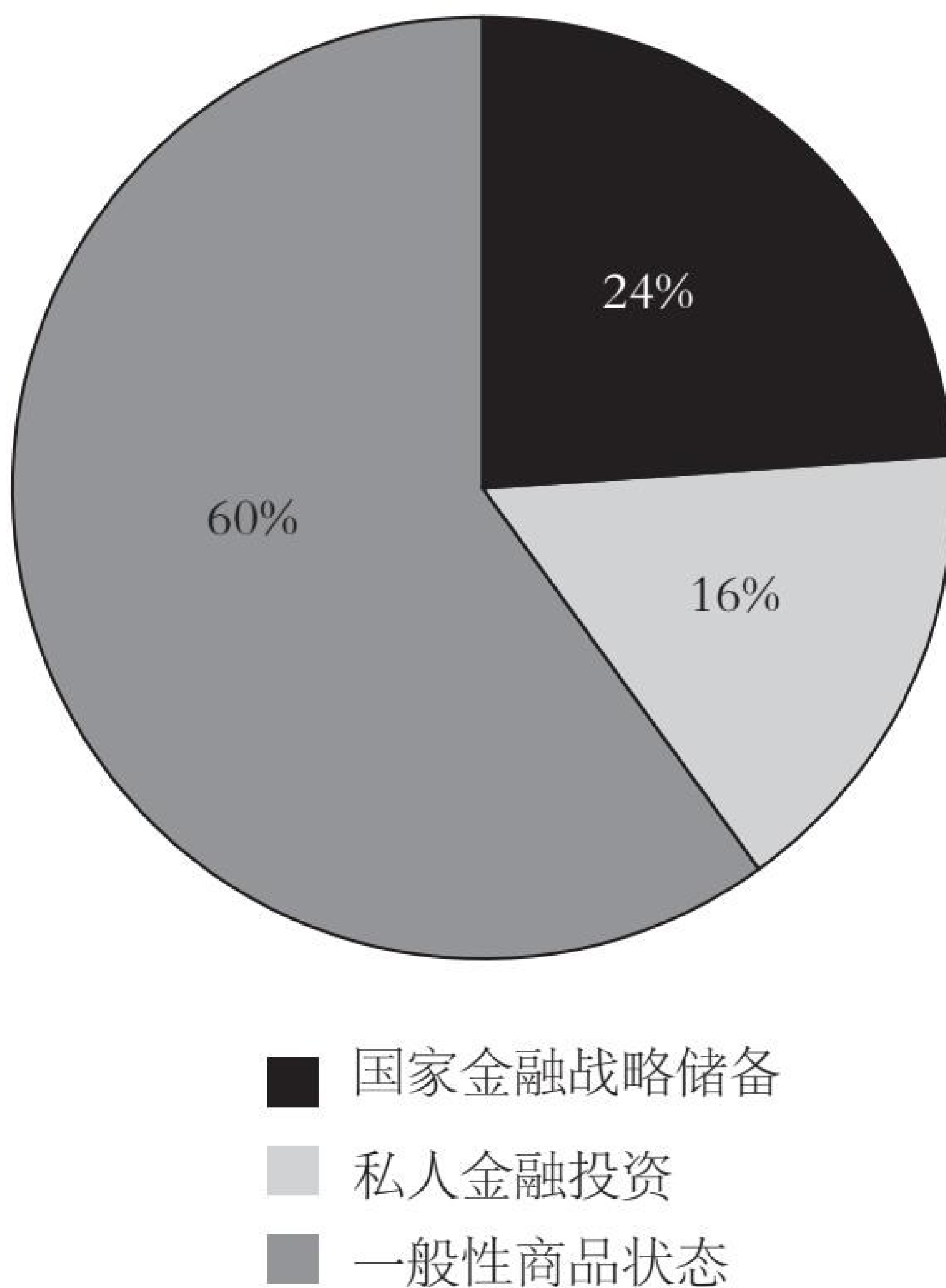


图5－2 世界黄金存量的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黄金协会

说明：地球上的人类在数千年文明历史中，从这个星球上共挖出来总量15万多吨黄金，目前这15万多吨黄金其中的40%左右是作为可流通的金融性储备资产，存在于世界金融流通领域，总量为6万多吨。其中3万多吨的黄金是各个国家拥有的官方金融战略储备，2万多吨的黄金是国际上私人和民间企业所拥有的民间金融黄金储备；而

另外60%左右的黄金是一般性商品状态存在，比如存在于首饰制品、历史文物、电子化学等工业产品中。需要注意的是，这60%左右的黄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随时转换为私人和民间力量所拥有的金融性资产，参与到金融流通领域中。问题在于，这样的黄金总量依然还不足以支撑资本的需要，因此在1973年黄金本位制崩溃了，资本这个魔鬼得以彻底解脱出来，开始自由奔驰。



图5－3 全球水资源危机状况

资料来源：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说明：1961年，全世界消耗的资源只是地球生态承载力的一半多点。而现在，全世界80%的国家所消耗的资源已经超过了其自身的生态承载力。环球足迹网络（GFN）发布的报告称，如果全世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像美国人一样奢侈，人类需要五个地球来提供所需资源。地球在可见的未来尚不能复制，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越来越突出，人类在此情况下会互相做出什么呢？

1. [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美]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滢、叶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3. 世界银行：《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4. 张新安：《矿产资源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及环境问题对矿业界的影响关于矿业与环境问题对矿业界的影响》，《地质科技动态》，1993年1月12日。

5. 《巴黎空气污染不算最糟欧洲以外超标普遍》，参考消息网，2015年3月25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 world/ 20150325/717816.shtml。

第六篇
“危机三角”的噩梦

> 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三角”是：城市化、资本过剩和经济危机。应该说，在所有的经济学发明中，“危机三角”是一种最不幸的发现，它揭示了事物的复杂性，带你走进舞台幕布的另一面。
>
> 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循环过程，使历史上以及现在的世界城市化浪潮，此起彼伏，制造出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动荡，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成为人类痛苦的真正幕后黑手。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经济周期，并非是偶然的社会发展现象，而是一种由城市化导致的内生性的周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下意识追求。

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机构以及著名和非著名的经济学人物，他们扮演着神圣的角色，不遗余力地推进世界城市化的进程。

著名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表了一份名为《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用令人欢欣鼓舞的笔调写道：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都要归功于目前在中国前所未见且方兴未艾的城市化浪潮。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25年，将有大约10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届时，中国将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随着中国城市人口总数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国民财富必将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从任何可能的

情景判断，持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将确保中国实现去年“十七大”确立的经济增长目标，即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对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而言，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规模无疑都将孕育新的市场。

麦肯锡这家著名的战略咨询公司，看到了城市化对经济体的巨大影响，也充分意识到“国民财富必将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注]，只是它没有意识到这种因城市化而导致的巨额财富积累，下一步会给这个国家和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世界银行传统上一直是世界城市化的重要推手，而发展经济学又始终是世界银行推崇的显学。世界银行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麦肯锡类似，甚至更重要，因为世界银行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发展机构和经济推手，往往拥有逃避怀疑和批判的“特权”。而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事实上是以能够与世界银行合作而深感荣幸的，因此要他们去怀疑世界银行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以其理论素养，还是学术实践，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高级顾问沙希德·尤素福（Shahid Yusuf）是世界银行出版的《中国城市化》一书的作者，该书的另一位作者是哈佛大学的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这两位作者在这本书中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取得“成功”。他们在该书的导读中指出，中国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城市化的同时，设法抑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或者将其引导到中小城市[注]。中国的城市拥挤，但基本没有贫民窟。中国城市化战略的一个基石是户籍制度，用户籍来控制人口流动，并设法把流动人口引导到中小城市。尤素福说，中国快速城市化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它设法对这个过程加以抑制，使得尽管居住条件拥挤但贫民窟极少。

两位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成就。

这两位显然不了解中国城市化实际进程的《中国城市化》的作者，他们的盲目笔触着实令人惊叹。他们显然渴望扮演发展中国家的导师，但真实视野却极其狭窄，甚至连中国城市中的“城中村”也视而不见。即便如此，作为典范的中国城市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常见于世界银行的赞美词当中。

实际上，中国与世界银行的紧密关系似乎是从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开始的。斯蒂格利茨其实在世界银行总共才待了三年时间，然后就被要求辞职，黯然退场。不过，斯蒂格利茨显然是当时中国官方在对外交往中，能够接触到的少数有地位和影响力的著名西方经济学家之一。他有关“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两件大事”的预言，让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极为受用，因此斯蒂格利茨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经济顾问，经常参与中国经济增长政策的研讨。

斯蒂格利茨认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持续，中国需要一场变革，必须要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向更多的国内需求，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持续。他建议，未来几年，中国应该逐渐脱离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型的经济，尤其是扩大研发、教育、保障性住房以及公共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以加快城市化进程[注]。

很显然，斯蒂格利茨先生高度赞美并且力主的“两件大事”，其实恰恰是导致世界资本浮滥以及经济危机的根源。只是无论过去和现在，斯蒂格利茨先生似乎都未告诉中国政府这一关键点。

皮凯蒂（Thomas Piketty）是一位在本世纪初突然爆红的经济学家，算得上是世界经济学界的70后新锐，甚至他本人都认为自己出名有偶然性，只是他本人并未对此加以深究。他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财富分配，他发现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世界“出

于某些不明原因”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给世界的分配机制造成了更大的不均衡，因此他希望能够有所改善。

在让皮凯蒂走红世界的那本《21世纪资本论》中，他通过漂亮的数据图表揭示了一条财富收入“不平等”的U形曲线，这条曲线展示了1910年至2010年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前10年到20年代，这一高收入群体一般会拥有45%—50%的国民收入；随后因为先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20世纪的40年代结束前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30%—35%，战争冲击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从80年代开始，皮凯蒂注意到，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又令人惊奇地重新恢复到了占国民收入45%—50%的水平。几乎与此同时，1870年至2010年的欧洲资本收入比呈现的情况也非常类似。作为理论经济学家的皮凯蒂已经发现，伴随着世界城市化的步伐，我们的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大量集聚了来源不明的大量财富。

皮凯蒂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高收入阶层的技能或是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还有一种可能是高收入阶层拥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权力，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权力不受限制。皮凯蒂认为，他倾向是“权力”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但同时他也承认，要“做到全面分析并非如此简单”。总之，皮凯蒂相信，这一时期财富收入的大量增加，仅仅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平造成的，他并未注意到世界财富总量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城市化而出现的暴增。

克鲁格曼与皮凯蒂相比，知名度可能更高一些，因为他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这个奖项并非是那位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遗嘱中提及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而是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奖项，1969年第一次颁奖，其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给克鲁格曼的颁奖词中说：“自由贸

易与全球化有什么影响？全世界范围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保罗·克鲁格曼创立并阐明了一套全新理论，可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

这是真的吗？

不一定。

保罗·克鲁格曼在探索资本本身就是麻烦根源的努力看来还没有尽头，最起码他起步的时间比较晚。他在2015年8月24日撰写的评论中希望尝试性地推导出《世界经济为何不断栽跟头》？在这篇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他察觉到繁荣最终变成了泡沫，在迸裂的时候造成了严重损失。大量资本制造的问题显而易见，比如有大量资本从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涌入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到头来变成了泡沫，这些泡沫在2009年至2010年迸裂，引发了欧元危机。他注意到，这是一种全球资本过剩，而且过剩的资本在到处寻找目的地。先是巴西的雷亚尔危机，接着是新兴市场危机。他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他写道：“这种全球过剩是如何形成的？也许有诸多因素。世界范围的人口增长正在放缓，尽管大家在炒作最新技术，但它似乎既不能提高生产力，也不能显著扩大对商业投资的需求。”不过，他明确警告说，“无论具体有哪些原因，当前重要的是，决策者必须认真看待储蓄过剩和全球持续疲软成为新常态的可能性。”

保罗·克鲁格曼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不是互不相关的，而都是因为“有太多的钱，在追逐太少的投资机会”。

美国拥有庞大的经济学家群体，所以总有出人意料的观点。克鲁格曼关注的是泡沫的成因，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却曾经有过一个

较为著名的论断，更为靠近我们的研究本意。他认为，不断膨胀的美国贸易赤字的成因不是国内因素，而是“全球储蓄过剩”。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远远超过投资，而这些储蓄流入了美国以求回报。他有点儿担心这些流入的资本没有进入商业投资领域，而是正在进入住房市场。他关注到了城市化繁荣背后的一些因素，如储蓄过程。

事实上，伯南克并未提及全球性的资本过剩，他显然没有更进一步，作出更为深刻的思考，因而也未能探询到周期性波动的密码[注]。

还有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席勒，他在著名的《非理性繁荣》第三版的原稿中指出，今天的美股牛市为“后次贷时期的繁荣”[注]。席勒当时认为，对于推动股市上涨，低利率可能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债券收益如此微薄，投资者可能把资金转入股市，以期获得更好的回报。但是在最后一刻，据席勒说他换掉了这个说法，现在他称我们的时代为“新常态下的繁荣”。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学界对于城市化是非常赞赏的，我们很难从中国以至世界的经济学家口中，听到对于城市化的非议。他们似乎已经习惯扮演城市化最忠实的粉丝，只看舞台幕布前的一切，而不愿意到幕布之后去看上一眼，看一看卸妆之后的城市化浪潮。

为了澄清困惑，也为了简洁地表达城市化浪潮与资本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关系，我们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估一个“危机三角”。

这个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三角”是：城市化、资本过剩和经济危机。应该说，在所有的经济学发明中，“危机三角”是最不幸的一种，它通过事物运动的共生关系揭示了经济周期的复杂性，带你走进舞台幕布的另一面，看到了耀眼明星的真实一面。在这个“危机三角”中，第一步，消费主义竞相攀比的城市化带来了席卷世界的“造

城运动”，在鼓励竞争的自由市场的催生之下，以挖掘和制造各种财富为契机和理由，从需求角度不可遏制地创造出惊人规模的资本，远超“适度”与“恰当”的范围。第二步，资本过剩，这个因城市化导致的因素，将会产生令人震惊的动能，制造出大量的泡沫，如大潮般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产生。第三步，人类的欲望以及对所谓“文明”和“进步”的渴求，总会在危机修复之后，再度将城市化浪潮作为追求的目标，并不断地重复这一可怕的循环过程。

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循环过程，使历史上以及现在的世界城市化浪潮，此起彼伏，制造出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动荡，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成为人类痛苦的真正幕后黑手。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经济周期，并非偶然的社会发展现象，而是一种由城市化导致的内生性周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下意识追求。

这样说并不过分，只要对历史稍作追溯，大家就会看到，“危机三角”所揭示的轮回，一次接着一次，走出经济危机或是在经济危机平复之后，世界都会再度重启资本规模更大的城市化浪潮，似乎别无选择，绝无例外。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轮回，但它在历史进程中真实存在。

人们有可能平衡这样的发展关系吗？有可能扯断“危机三角”的纽带关系吗？

可能性不大，由“复杂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有着无数的原因导致他们对城市生活真切的渴望和需要，而在这种城市生活中，因为欲望而对品质和规模的要求是无止境的；而支持和满足这种无止境要求的要素，只有资本并且往往是溢价后的资本，这就会最终导致资本过剩。表面上的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以及发展节奏的变换，实际的市场基础都是世界的城市化浪潮。均衡只是理想条件下的设想，人类却容易被梦想支配。而自由市场的交易体系，追求的是溢价再溢价，进

而会夸大所谓的“潜在需求”，直到潜在的需求，变为可望而不可即的虚幻泡影。所以，资本只会被盲目地放大，而不会理性地收敛。

那么，人们推崇的全球化能够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吗？

表面看，全球化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似乎有助于消化掉浮滥的资本。问题在于，全球化只是空间的扩大，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在其他的地方发生，发展的轨迹是相同的，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三角”，依旧可能发挥微妙的作用。事实上，全球化正在使得区域市场的谨慎，变得即便不是毫无意义，也是影响甚微。最终，区域市场之间互相抵消正面影响，而放大负面影响。市场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冲销，结果都是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放大资本规模。这样的竞争游戏始终在进行，而且规模可能因全球化而竞相扩大，甚至最后达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与全球化相比，货币区是另一个努力的方向，这种努力因为争取步调一致而受到普遍关注。如果理论能够成功映射到现实当中，则货币区可以因共同市场纽带的存在，降低互相抵消的效应，减轻资本过剩的负面影响。遗憾的是，因为欧元区的举步维艰，这种努力已经明显受挫。我们看到的是，因为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政策，货币区甚至正在创造出更大程度的资本过剩。

所以，只要稍加用心体察，就可发现以往的现实与理论并不相符。现在的世界，遍布全球的产业区正在铺开，侵占着森林和土地，从东亚到南亚，从拉美到非洲，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已经告别安宁和祥和，正在饱受工业废料、肮脏的空气、喧嚣的噪声、陌生的人群、迅速上升的服务价格以及拥挤交通的困扰。全球化起到了资本过剩放大器的可怕作用，人们只是被“据说”存在的市场空间所支配，进一步推升资本过剩的严重程度。看到了更多的扭曲和夸大，看到了更多的资本规模的放大。

一个明显可见的悲观结论是，人类社会终将无法摆脱各式各样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人类社会只能经过最为痛苦的方式，比如战争、通胀或是通缩，才能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注)。但不幸的是，当痛苦的危机平复之后，人类又会重新步上旧途，再次重复这个轮回。而且即便到了那样的时刻，人们似乎也只会徒然感叹，“危机三角”依旧存在并且发挥着难以遏制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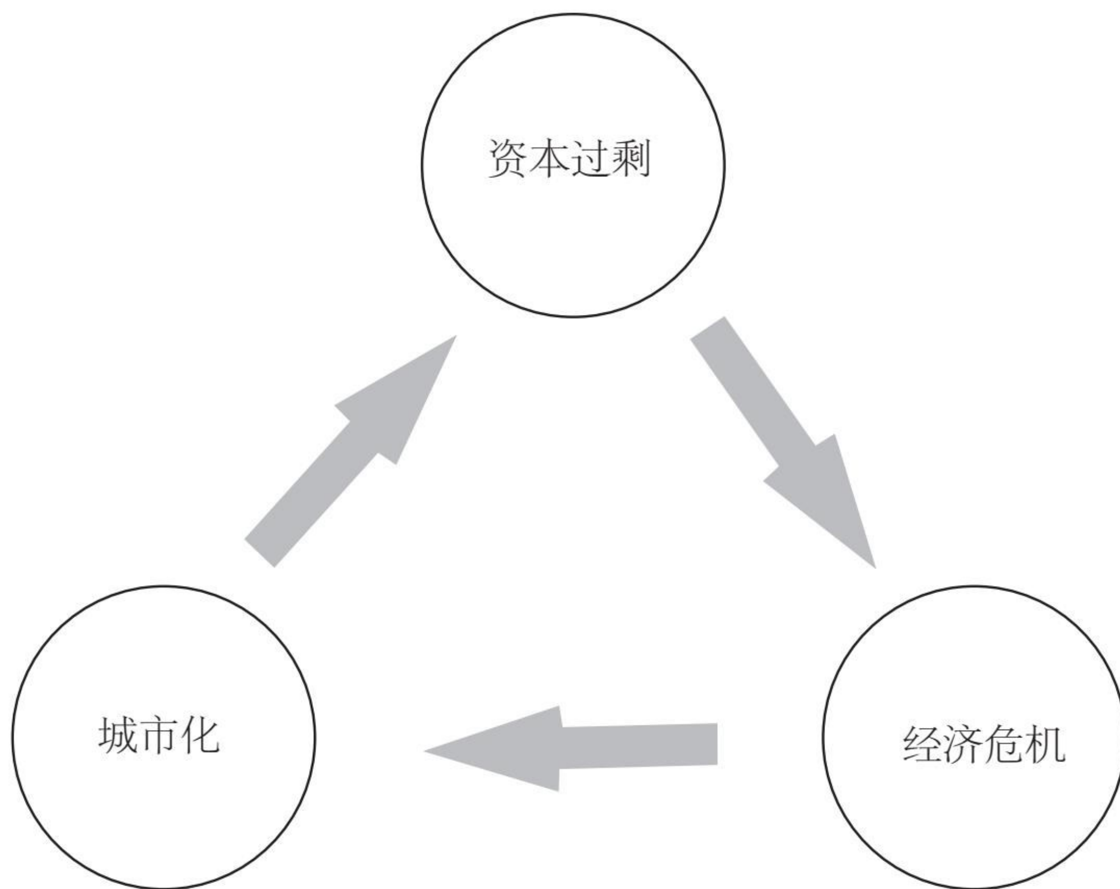


图6－1 危机三角

说明：“危机三角”指由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危机构成的循环，在这一展示共生关系的循环中，城市化刺激产生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制造各式经济危机。这一循环的背后是城市化亮丽的外表、汹涌的资本大潮以及相伴相生的必然性市场危机。现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消沉，自由市场在当今世界占有主流的意识地位，但自由市场带给人类的是远远超过理性需要的无止境的欲望，催生和刺激对自然界的巨大破坏，同时还制造了痛苦不堪的各式各样的市场危机。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还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可能性。除非各国政府能够做出划时代的、革命性的转型，成为真正理性的乌托邦式的公共福利组织，联起手来，共同制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方面，出生的苗头在北欧国家，至于世界其他各地都还深深陷入自由市场的非理性泥沼当中无法自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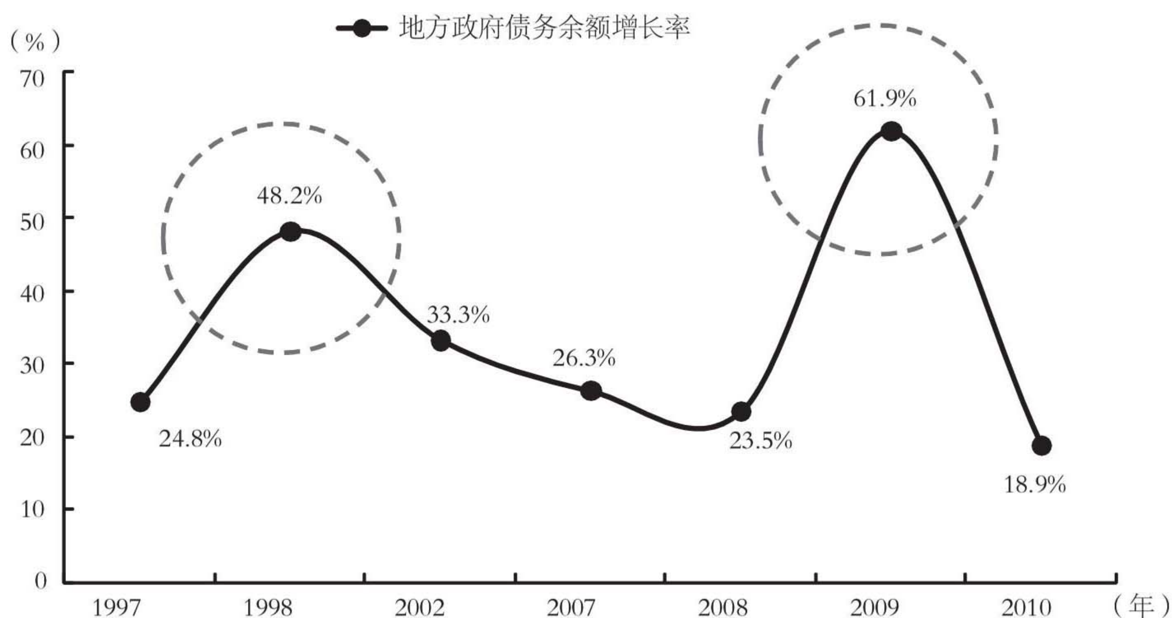


图6－2 资本过剩导致的债务和危机

数据来源：国家审计署、东方证券研究所

说明：中国全国10.7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兴起于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充分证明中国政府的政策操作实际也与世界各国政府同步联动，大家都是在危机过程中试图利用注入更多的资本来走出危机。而且彼此是竞争性扩张资本总量，犹如一场货币战争。你的货币便宜，我的货币要比你更便宜。很显然，这种做法当然会进一步提升世界资本过剩的总水平。事实上，在同一周期里面，每一次的危机和市场震荡，都是各国政府注入更多资本的借口，危险的资本过剩现象从而不断积累，直至火山爆发的那一天来临。



图6－3 中国土地出让面积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说明：麦肯锡和世界银行都是对中国城市化最为兴奋的研究机构，它们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并且有能力在政府间进行游说和扩散影响力，因而也更为有害。事实上，它们与世界学术界的普遍性观点一样，非常片面地看待城市化，凭借主观意愿，仅仅着眼于财富增长，而忽视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均衡，实际也破坏了均衡发展。这样的学术，从长周期来看，具有框架性的错误，因而也是一种有毒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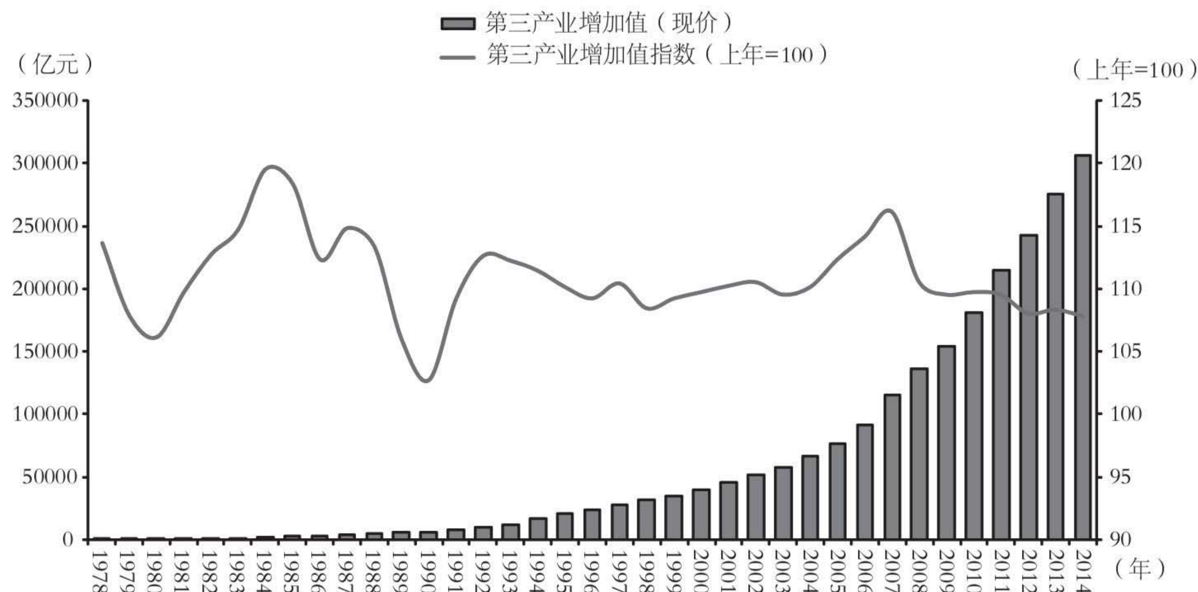


图6－4 中国第三产业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说明：斯蒂格利茨建议中国搞城市化的原因，在于为中国寻求一条更富有魅力的增长之路，扩大内需以代替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也就是说，要用第三产业代替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问题是，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发现一个“宝贝”，这就是城市化。因为城市化可以有效地实现这种产业更替，进入城市的人们一定要消费，因此中国在此后出现了所谓“腾笼换鸟”，出现了对制造业外资的歧视，甚至驱赶。直到后来发现政府债务积累到危险的程度，各种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开始显现，才模糊地意识到中国城市化走得过早、过头和过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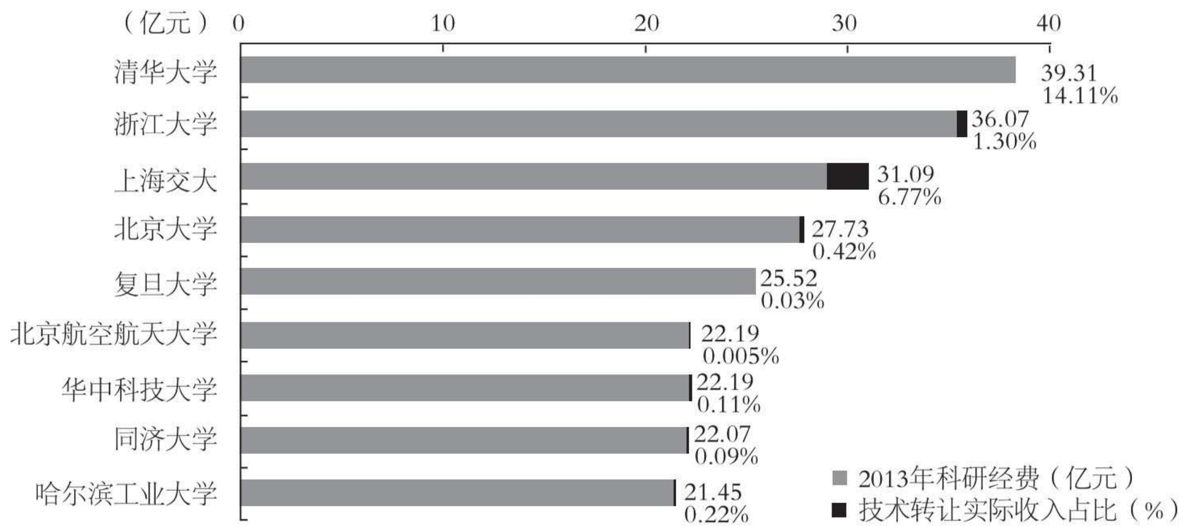


图6－5 中国科技遭遇转化生产力的难关

数据来源：《2013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说明：科技可以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吗？人们的期待一向如此。在理论上，科技会冲销掉一部分资本，现在资本争先恐后投入所谓科技创新，甚至连电影明星都乐此不疲就是一个证明。人们期待人工智能有所突破，期待石墨烯等新材料可以广泛运用，进而有机会改造我们的世界。问题是，这种"期待"从算盘的发明开始，就没有终结过，我们所看到的失败的科技创新远远多于实际运用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工智能研究，经过了35年的"革命性创新"，到现在也依旧是个"期待"。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大学虽然拿到了惊人比例的经费，但技术转让形成的产品和服务的却乏善可陈。即便是在科技创新的大国美国，同样也有不少细心的观察者在不断警告，从经济的角度，尚看不到科技带来的明显进步。所以，科技作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还会继续，但并不能指望科技能够驱离资本过剩这个魔鬼。

1.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百度文库，2008年3月，http://wenku.baidu.com/link? url=Th1Ft80ERTclzMpBwIx0oi4SZCHFR1rJze7r-J2xp8 At0XbbLE_S-KK7JNP-Kvg0Y78RCxKclwqFJnBMer6aDtGt0GdSWz0KQ0qr6uvuUxy。

2. 世界银行对于城市化的态度一向非常积极，有关城市化的论著更是连篇累牍，但从2009年以后态度开始趋于缓和保守。转折点是比较著名的一篇报告《经济上和生态上可持续的城市化是新方案的重点》，文中指出，世界用了数百年的时间才建成了今天400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地区。根据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作出的城市化预测，仅仅再用30年的时间，发展中国家就将建成同样面积的城市地区。——作者注

3. 顾晴：《斯蒂格利茨:城市化将使中国成为世界领袖》，《城市化杂志》，2010年9月6日，www.ciudsrc.com/new_fangtan/zhuanjia/2011-04-24/11715.html。

4. 其实，中国人的那种"赚钱买房安身立命"的消费主义生活哲学，在世界各地都是同样的。只是消费动机经常为人所忽略。金融学家更多的因为受到学术框架的潜约束，

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资本，忽略了资本背后的消费动机，因此常见的现象是“就资本而议资本”。实际上，笔者认为资本不仅仅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更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关系之中。很显然，与此相关的各种讨论，将会拥有另外的重点，属于另外的一篇“大文章”了。——作者注

5. 《席勒将发行〈非理性繁荣〉第三版》，腾讯财经，2015年1月8日，http://finance.qq.com/a/20150108/053656.htm。

6. 《枪炮、病菌和钢铁》《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等作者都曾经努力从人类的进化和哲学意义上劝说人类在追求现代生活的同时，要照顾自然。本书的作者也从城市发展和金融的角度同样在做此努力，试图告诉人们，我们必须拥有一种全新的发展哲学，否则人类社会必然会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走向自我毁灭。——作者注

第七篇
世界危机的循环

> 流动性陷阱的前提是资本过剩，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承担政治风险，宁愿相信“更多的钱”可以冲出流动性陷阱。于是，资本过剩在一定周期中，像魔鬼一样推高了世界上很多东西的名义价格，让大家看到一片梦幻般的繁荣景象，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似乎“钱”景无限，令人感觉世界变得格外美好。实际呢？资本涌到哪里，就会在哪里造成混乱和虚假繁荣，而当资本像潮水一样退去的时候，留下的是商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留下的是一片狼藉。

按照“危机三角”的模型，资本过剩必然导致全球商品交易市场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中。现在的世界市场正是如此，金融危机和经济紧缩的信号响彻云霄。

在西方国家，欧洲正在失去绅士风度，欧元区国家继续深陷债务泥潭，希腊危机始终游走在边缘状态，随时可能脱离欧元体系，重归德拉克马（Drachma，希腊货币）体系。而希腊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走在欧洲城市化前列的整个非德语区国家，尤其是南欧，都可能步希腊之后尘，造成现有欧元体系的全面崩溃，让欧元浓缩为德语区货币，这才是最大的危险。而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欧洲只好全力抢救希腊，但这也让欧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实际上，希腊已经绑架了欧洲，而欧洲已经自顾不暇，完全失去了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最近，难民问题又严重困扰着欧洲。表面看这是“阿拉伯之春”的后遗症以及叙利亚战争造成的祸患，但实际却有着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因为难民正在逃离的是经济渐入危机的南欧，而奔向了经济更显稳定的英国和德国。来自法国的非洲难民，大量集聚在英法隧道，冒着生命危险攀爬过往车辆，希望逃离法国，奔向非欧元体系的英国。这种情况甚至造成了英国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聚焦在经济角度看这个问题，结果是非常清楚的——现在就连难民都已经明白了，欧洲这条船正在下沉，能做的就是逃离危险区。

由于资本过剩和本币超发严重，现在世界各国的内部市场已经无法顺利消化，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纷纷出现了贬值，甚至重贬。

印尼货币贬值到17年的最低点；南美的“好学生”巴西货币过去一年就贬值了三分之一，世界杯的作用一点都没有显现出来；马来西亚的货币到2015年7月，已经贬值到了16年来的最低点；泰国货币贬值到5年来的低点。原来的理论说法是，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实际上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却是衰退的，这表明这些国家实际已处于经济紧缩的状态。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的资料显示，全球2015年5月货物贸易动力下滑1.3%，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动力为负的2%，发达国家的出口动力也是一个大零蛋。中国的出口，也让全球市场“意外地”看到动力不足的现象出现。

紧接着出现的危机现象就是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这同样是全球市场紧缩的表现。

小麦期货，2015年7月以来出现了4年来最大的单月跌幅，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的价格是6年来的最低点。煤炭价格的下跌已经不能用“暴跌”来形容了，一向善于精明筹措的日本住友商事和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急不可待地将澳大利亚的焦煤矿以1澳元的象征性价格转让。而著名的沃尔特能源（Walter Energy）公司在7月已经宣布破产，另一家公司Arch Cool要求进行债务重组，被美国银行断然拒

绝。还有大幅限产的、从股市退市的，数不胜数。就连美国两大石油业巨头，埃克森（Exxon）和雪佛龙（Chevron）的股价也跌至近年的最低点，随着全球石油价格从2014年的115美元高位一路跌到47美元左右，全球石油业的裁员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也已经达到了7万人。

原本平静而乐观的水塘，现在不是被扔进了一颗石子，而是被砸进了一块巨石，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层层巨浪，翻卷着伸向远方，触及所有边缘地带。现在，甚至连拉丁美洲的波多黎各都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出现了债务违约。这个负债高达720亿美元的小国是美国的属地，原本这个国家还指望美国的资本援助，但据悉已经被自身动荡不安的美国断然拒绝。在马来西亚，其最主要的国有投资公司也因为巨额债务而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国香港则出现了较为罕见的知名连锁企业老板悄悄弃店“跑路”的现象。

对资本过剩反应最大的必然是股票市场。

2015年8月24日全球股市的表现甚至让美联储也感到一定程度的震惊，开始犹疑原本明朗的加息态度。这是一个平静如常的星期一，但美国两大交易市场，刚一开市就陷入全面猛烈暴跌的状态，而且跌势并没有缓解的迹象。首先是纳指期货罕见地触发“熔断机制”，在短时间内自动暂停一切交易，随后标普和道指也步其后尘，触发了“熔断机制”。毫无疑问，这一信号代表着投资者的猛烈抛售潮。

早在1987年，为了控制股票交易风险，美国各大资本交易市场就设立了“熔断”这一机制，但因为遭到自由市场派的反对，并没有实质性地执行，这次却用上了。所谓“熔断机制”（Circuit Breaker）是一种自动停盘机制，是指当股指波幅达到规定的熔断点时，交易所为控制风险采取的暂停交易措施。整个“熔断机制”分为三级：第一级的“熔断机制”是当跌幅为7%的时候触发；第二级的“熔断机制”是当下跌13%的时候触发；第三级的“熔断机制”是当跌幅为20%的时

候触发。一般“熔断机制”被触发后是暂停交易15分钟，但是当第三级的“熔断机制”被触发之后，全日交易停止。

实际上，当天不仅仅是美国股市出现了暴跌，欧洲股市的跌幅也在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8月25日北京时间21：15，欧洲股市F泛欧绩优300指数扩大跌幅至6.2%，创下2008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在中国台湾，当局立即颁布了卖空禁令，禁止在借入股票价格低于前一天的收盘价情况下将其卖出。同时，韩国最大的交易所在遭遇了5年来最大的周跌幅之后，韩国财政部长立即表示将采取紧急措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印尼股市的基准股指都从最近的高点下跌了至少20%，彻底进入了熊市区间。法国兴业银行的全球策略师基特·朱克斯（Kit Juckes）此后做了一番在金融界颇有代表性的评论，他指出：“全球大宗商品和股市之间的悲凉并不是新的‘剧本’，但是现在的危险是，两者正在重新修正关联。就像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新兴市场危机打开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开端。”

危机化的全球市场，除非全球资本过剩能够得到消弭，否则不会是一两次，而将是间歇性地大发作，直到天量资本被打了水漂为止。

2015年8月24日的美国股市大地震刚刚过去不久，9月2日，欧美交易市场又再度出现大幅暴跌，美股三大股指以及欧洲股指均大跌近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跌463.87点，跌幅2.81%，报16064.16点；标普500指数收跌57.52点，跌幅2.92%，报1914.6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跌139.40点，跌幅2.92%，报4637.11点。纽约油价在三天暴涨逾27%之后再度重挫7.7%。这一次，金融界分析人士找到的理由是，全球多个国家的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下降，因此再度惊扰了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情绪加重。他们尚未察觉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资本过剩导致全球发生紧缩危机。世界既然没有战争来扮演消化资本的角色，那么就会由通缩这个收割机来割掉资本。

中国的证券市场同样不能幸免资本过剩的袭击浪潮。

2008年，中国为了应对所谓“华尔街金融危机”，启动了“4万亿”宏观刺激计划，由此拉开了一轮规模空前的大投资，极大地强化了中国的资本过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在2015年博鳌论坛上谈及“4万亿”问题时也承认，由于银行循环贷款的原因，从2008年到2010年我们政府实际投资了30万亿[注]。他所估计的数字与中国其他经济学者的估计差不多，即“4万亿”拉动了一轮惊人的投资规模，估计数从25万亿到30万亿都有。而所有这些投资，是产业，是企业，也是项目，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人来做，于是就有了收入，有了消费，有了储蓄。中国的储蓄随之开始狂增，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中国的居民储蓄从20万亿元攀升至超过50万亿元，使得中国的资本过剩日益严重。

实际上，中国的股市在2015年7月以后就陷入了不稳定的状态。为了稳定市场气氛，7月8日在中国有关部门的要求下，国资委所监管的111家中央企业“集体承诺”，要做“负责任的股东”，在股市异常波动的时期，不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即便如此，该来的还是会来。

2015年8月25日，中国股市出现了恐慌性的暴跌。沪深两市大幅低开，直接跌破3500、3400两个关口。开盘后股指大幅下挫，板块全线暴跌。当日午后沪指跌掉了9%。见底后曾小幅上冲，跌幅收窄至6%后乏力，再次下探。创业板最低见2152.6点。盘面上，两市板块全线暴跌，仅15股上涨，近2200只股票跌停。截至收盘，沪指跌8.49%，跌297.84点，报3209.91点；深成指跌7.83%，跌931.76点，报10970.29点；创业板跌8.08%，跌189.34点，报2152.61点。

此后，中国政府公开大规模“救市”，不但动用了大量的资本，而且动用了前所未有的行政手段。美国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指出，预

计“国家队”在六七月间可能就已花费8600亿至9000亿元支撑中国股市，相当于总市值的1.6%，或是流通市值的2.2%。而在出现暴跌之后，有关报告称，包括已花去的资金在内，中国政府总救市的资金规模预料已经达到2万亿元左右，而且中国央行还一再保证进一步注入流动性。

据2015年8月24日晚间的新闻报道，中国政府网站已经宣布，国务院印发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养老保险基金可以入市，支持股市稳定。《办法》规定，投资于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的30%。大致上，这表明入市金额的理论上限是1.2万亿左右，实际估计也会有数千亿的资金流入股市支撑市场。此后，股指依旧反复波动，多家上市券商公司在9月1日晚间再度公告，将以公司2015年7月底净资产的20%出资，划至证券公司设立的专门账户中进行统一运作，投资蓝筹，用以维护市场稳定。这一措施，实际等同于罕见的集资“救市”，此前已经有21家证券公司向证金账户划入1280亿元资金。而在政府的统一号召下，多家券商和政府部门已经大幅度提升了自营规模，用于“救市”。

问题在于，用增加资本的方式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显然是南辕北辙的方法。

在中国政府综合动员各方力量，在长达一周多的时间里大力度“上纲上线”的“救市”之后，中国的股市不但没有站稳，反而继续呈现上下大幅度震荡，暴跌压力始终持续，甚至一度向下击穿过3000点大关。这一期间，中国公安部门也动员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刑事拘留了中国最大的券商之一——中信证券的一批高管，认为他们内外勾结操纵市场“做空”。中国排名前十的海通证券甚至被迫公开宣布，“从今天起不再悲观”！在如此强大的行政干预重压之下，中国

的证券市场居然依旧没有稳定下来，股指该跌还跌，萎靡之态，一时看不到尽头。

看不清楚源头和机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这次的故事非常简单，简单到似乎不值一提。从2015年春天开始，因为对2015年经济增长的看法分歧，中国少部分学者认为“2015年经济增长不比2014年差”(注)，对于这样的观点，中国股市也有乐观反应，出现了稳定的上涨趋势，但大致也只是稳中向上靠拢4000点附近。

此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中国证监会可能应政策需要而公开提出了所谓“改革牛”的观点(注)，中国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因为“乐观预期”得到验证，所以有人积极配合，测算出“市场拥有数万亿资金”，可以支持中国股市指数涨到6000点，甚至突破上一个纪录。这样一来，中国股市等于获得了政府背书，立即大幅上涨，大量原本拥挤在房地产、理财产品甚至高利贷中的社会资本涌进市场。

到了这个阶段，那些具有独立分析能力的机构，这其中可能包括“看空者”、外资、券商、私募等机构，立即认识到这种向证券市场提供“政府背书”的做法是幼稚的、不成熟的，甚至简直就是江湖忌讳，所以立即进行反向操作。一个要支持市场，展示辉煌；另一个是我利用你的支持来赚钱。而最大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被忽略，那就是散户的资本规模。中国的散户是挟50万亿储蓄的社会资本力量。他们唯一能做的，现实点儿说，就是“捞一把就走”。他们是两大阵营中的游击队，表面看不见其声势，但加在一起规模巨大，他们实际决定了市场的真正走势。

两大阵营对垒，政府为一方，机构和社会资本为另一方。政府一方，操作轨迹过于明显，无非就是拉升，到了该拉升的时候，做空的一方就赚钱。老百姓的选择很简单，逢低出货，赶紧退场，于是每一次高涨，都成了出货的好时机，高位始终站不住就是这个原因。而政府看到有“做空一方”的对垒，立即大怒，于是就有了现在调查中信证券和国际对冲基金的事情。实际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社会资本的态度，真正的原因在于社会对股市投了不信任票。由于他们的能量巨大，政府的几万亿救市资金是无法填补的。

至于那些“做空”的机构，实际上只是判断错误。他们拿自己的知识、智慧硬磕政府的公权力，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可能是年轻的“索罗斯”，但“中国”不是“英国”，所以这里不是他们成名的地方。以上是按照事件进程来展示的过程，现在中国市场的结尾故事还未出现，但资本过剩的阴影和作祟的轨迹清晰可见。中国只是全球资本过剩这篇大故事中的一个“碎片”，而且是洪流夹杂中故事结尾阶段的“碎片”[注]。

我们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故事”，提供了更多的“碎片”，或许到了某一天，大家终于可以将之拼合成为一幅完整的图景。

1934年，瑞士人制定了西方第一部银行法——《银行保密法》。在当时，德国政府逼迫公民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要全部转入德国国家银行，为保护这些储户，尤其是当时犹太人的利益，对储户信息保密制度开始正式出现。该法规定，瑞士银行一律实行密码制，为储户绝对保密。银行办理秘密存款业务的只限于2—3名高级职员，禁止其他工作人员插手过问，任何外国人和外国政府，甚至包括瑞士的国家元首、政府高官以及法院等都无权干涉、调查和处理任何个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除非有证据证明该存款人有犯罪行为。对于泄露存款机密的人，该法给予严厉处罚。

《银行保密法》的实施加之瑞士的永久中立国地位，使得各国富豪纷纷携带巨款到瑞士开设个人账户。尤其是一些国家的独裁者、政客和流亡外逃者，更是将瑞士银行视为万无一失的保险库，将大量金钱存在瑞士，也让瑞士成为名副其实的银行之国。

瑞士到底有多少银行？

根据维基百科资料，在2008年瑞士拥有327家银行和证券机构，包含从两家银行巨头到为社区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有5000多个，平均1400多人就有一家银行办事机构，瑞士银行在国外还开设了近400家分行，同时，外国在瑞士也有200多家分行。可以说，没有银行就没有瑞士。在银行规模上，瑞银集团（UBS）和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在世界理财机构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七位，它们两家的营运规模即已占了瑞士银行领域的60%。

瑞士国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瑞士银行业管理的离岸资产高达2.2万亿美元，超过三分之一的国际私人财富实际由瑞士管理，每年收益高达140亿欧元，超过瑞士银行系统全部利润的一半，接近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5%。

现在，瑞士银行业为客户绝对保密的原则正在成为历史。2015年5月6日，迫于美国等国的压力，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瑞士，与其他46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实施银行间自动交换信息的标准。这意味着，储户、银行之外，各国执法机构亦有权力去查询本国人在瑞士银行户头的金额。

大家可以想见，富豪们的叫苦之声必定迅即传遍了世界，而这一切实际也是祸起资本过剩。

瑞士银行业实际只是向世界提供了一个资本的阀门和蓄水池，关键还是这个世界不可抑制地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资本，需要在世界自由

流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各国的政府，这个资本过剩的公开制造者，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就要努力设法控制资本的自由流动，于是瑞士的银行保密法终于在各国政府的重压之下以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土崩瓦解了。

欧洲人从来都是骄傲的，美国人经常抱怨说，欧洲人整天无所事事，就知道鄙视美国人。而这样的一个“骄傲的欧洲”正在发生改变，他们正在迎来依靠出售自己国家护照度日的这一天。

马耳他这个名字，对普通人而言也许稍显陌生。但是对喜爱旅游的人们来说，马耳他却是声名远扬：拥有美丽的沙滩、清澈的海水和斑斓的海底世界，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古迹和传统建筑。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常青，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适宜旅游。而在最近，一条重磅新闻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到了马耳他：马耳他政府宣布开放投资移民，并且可以直接入籍，价码是，向国家投资65万欧元。

葡萄牙是一个古老的欧洲国家，他们曾经是新大陆的发现者之一，但这已是过去。在现实世界里，葡萄牙宣布了自己的“黄金居留许可计划”，要求投资者购买50万欧元房产，即可交换葡萄牙的居留权。前5年内是葡萄牙居民身份，5年后可获永久居住权，累计满6年后可以入籍。据悉，计划推出一年后，“黄金居留计划”就已通过327例申请，赢得了1.6亿多欧元的投资。

西班牙，它的黄金海岸非常著名，跳弗拉门戈舞的女郎热情似火，而西班牙的房地产在欧洲也搞得最为火爆，资本过剩的情形自然也是最为严重。

2015年西班牙移民新政策简直可以用“大放异彩”来形容，投资者在西班牙只要投资房产超过50万欧元，就可申请西班牙“投资签证”或“投资居留”。满足相关要求后会得到一年期投资签证，之后

可以转为两年的投资居留。5年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而且无居住要求，无移民监理，有钱就行。

当然，还有希腊，这个也许不用多说了。希腊这个陷入困境的欧洲国家，现在需要的只是投资客的区区25万欧元。

欧洲为了走出资本过剩的困境，还需要更多的钱。金钱制造了可怕的陷阱，但要从陷阱里走出去，还需要更多的钱。繁荣看着亮丽无比，但这是魔鬼的洞窟，而且走进魔鬼的洞窟容易，想要走出去，就必须向魔鬼缴纳更多的钱，才能购买一张未来世界的门票。这样的做法何时才是尽头？这个世界似乎没人知道问题的答案。不过，对于控制资本过剩，“简单做法”也有，只是似乎太不近情理了。这一点我会在下一章讨论。

塞浦路斯，这个国家曾经把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作为自己的追求，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伟大的目标”，成功吸引到大量的资本来到塞浦路斯，尤其是俄罗斯富商的资本。在过去的一些时间里，塞浦路斯甚至被称为“小瑞士”，金融业非常发达。在塞浦路斯的机场上，一度停满了接运富豪的私人飞机。港湾之中，白帆成片，挤满了富人们昂贵的游艇。到2013年2月，塞浦路斯各银行的存款额总计为675.2亿欧元，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国外。

紧接着，资本过剩的魔鬼袭来，用国际金融界人士的习惯语言表达：“泡沫”破裂了。

2013年4月30日，塞浦路斯政府被迫宣布了一个简单直接的减记方法——该国第一大银行塞浦路斯银行存款人超过10万欧元的存款将被切掉一大半，存款人承受的损失最高将达到60%。这个数字大大高于原先投资客的心理预期，他们已经知道危机袭来，自己的存款会有重大

损失，但没想到损失会这么大，政府挥起大刀，直接将储户的财富总额拦腰斩断，实际只剩下末尾一截。

有趣的是，根据塞浦路斯政府发表的公报，塞浦路斯银行中超过10万欧元的存款中，有37.5%将被转为该银行的股权，另外22.5%的存款将被冻结90天，视情况被部分转为该银行股权。这真应了一个段子的说法，存钱存成了股东。据说，此后在塞浦路斯政府开始逐渐放松管制的条件下，塞浦路斯的进口商可以向政府相关部门用支票支付不高于5000欧元的款项，更大数目的支付则需要中央银行批准。

作为一个什么东西都靠进口的岛国，这点钱能进口些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艺术品交易一向是富人们专属的玩意儿，但它也是一个资本过剩故事中的“碎片”，而且更能反映潮起潮落的资本过剩。每当大潮起时，艺术品交易就会出现天价；当大潮退去之时，就会掉头向下，直落下去。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中国专门从事艺术品交易研究的雅昌艺术网发布了2014年艺术品秋拍报告，这份研究报告显示，从2014年起，艺术品持续走低，秋拍成交总额为287亿元，与201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创下了近5年来同期的最低水平。艺术品市场信心度调查也显示，2015年国内艺术品信心指数为18，比上一年下降了16%，已创下了近5年的新低[注]。

来自世界艺术品市场的消息同样不能令人兴奋，英国伦敦2014年末举行了一系列俄罗斯艺术品拍卖会。因俄罗斯受到的经济制裁和卢布汇率暴跌严重影响了市场，仅有不到1300件拍品呈现于佳士得、苏富比、邦瀚斯和麦克杜格尔装饰精致的交易场。尽管拍卖时场内座无虚席，但就最终结果来说，出现了非比寻常的高流拍率——以数量计

算仅有47%的拍品成交，市场的表现令人担忧，这是伦敦艺术品交易市场自2008年以来最低的成交比例。

对于全球艺术品市场的风云变幻，雅昌的研究报告认为，2014年秋拍大幅缩水，最主要的因素为宏观背景中股票投资的利好消息和“牛市”的启动，吸引了很多本该进入艺术品市场的投资类资金，从而导致艺术品市场上的交易量锐减。而投资界对于世界艺术品市场低迷的解释则显得很无奈，他们的说法是，资本太过“任性”了。

其实，资本的性格从未出现过改变。

流动性陷阱的前提是资本过剩，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承担政治风险，宁愿相信“更多的钱”可以冲出流动性陷阱。于是，资本过剩在一定周期中，像魔鬼一样推高了世界上很多东西的名义价格，让大家看到一片梦幻般的繁荣景象，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似乎“钱”景无限，令人感觉世界变得格外美好。实际呢？资本涌到哪里，就会在哪里造成混乱和虚假繁荣，而当资本像潮水一样退去的时候，留下的是商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在这之中，因为城市化而周期性出现的资本大潮，扮演的是一个无情掠夺者的角色，它们像中世纪海盗一样席卷一切，甚至包括在资本大潮当中的一些表现出色的弄潮儿。

表7-1 国际资本市场金融活动的融资工具

单位：十亿美元	1986	1988	1994	1996
证券	228.1	229.9	473.6	766.5
贷款	93.3	142.3	236.2	345.2
其他债务贷款	—	—	4.9	4.5
非保险贷款	—	—	252.9	455..4
总数	321.4	372.2	967.6	1571.6
逐年增长率（%）	13.2	18.4	18.2	22.4

资料来源：OECD

说明：从数据来看，世界市场融资工具的增长率与世界城市化的步调完全一致，时间同样是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的。无论是证券业务还是贷款业务，世界市场均呈现了翻倍的增长。金融市场是为资本服务的，只有资本总量的上升才会带来融资工具这样的增长。

表7-2 发达国家的资本溢价现象

跨国股票、证券交易量	占GDP百分比（%）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1998
美国	4	9	35	89	135	230
日本	2	8	62	119	65	91
德国	5	7	33	57	172	334
法国	—	5	21	54	187	415
意大利	1	1	4	27	253	640
加拿大	3	9	27	655	187	331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1999年年报

说明：溢价现象指的是相对于经济总量，资本的支付超过经济总量的名义价值或面值。随着世界城市化的步伐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逐渐加快，我们看到这种资本溢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资本浮滥的现象遍布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证券交易量只相当于经济总量的4%，日本更是只有2%；但此后资本过剩极大地推升了相较于经济总量的虚拟资产，大家都用虚拟资产来承接资本，使得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资本比20世纪70年代膨胀了57倍，日本膨胀了45倍，实际生产增加部分的价值远远落后于虚拟资产的价值。

表7-3 9个工业化国家的外国投资流量

国家	1991-1997年累计总额（百万美元）	占所列国家总额的百分比（%）	占全球的百分比（%）
美国	362256	41.5	19.4
英国	143455	16.4	7.7
法国	142296	16.3	7.6
西班牙	61483	7.0	3.3
荷兰	57941	6.6	3.1
澳大利亚	45707	5.2	2.5
德国	27050	3.1	1.5
意大利	24999	2.9	1.3
日本	8516	1.0	0.5
所列国家总计	873693	—	—
全球总计	1863201	—	—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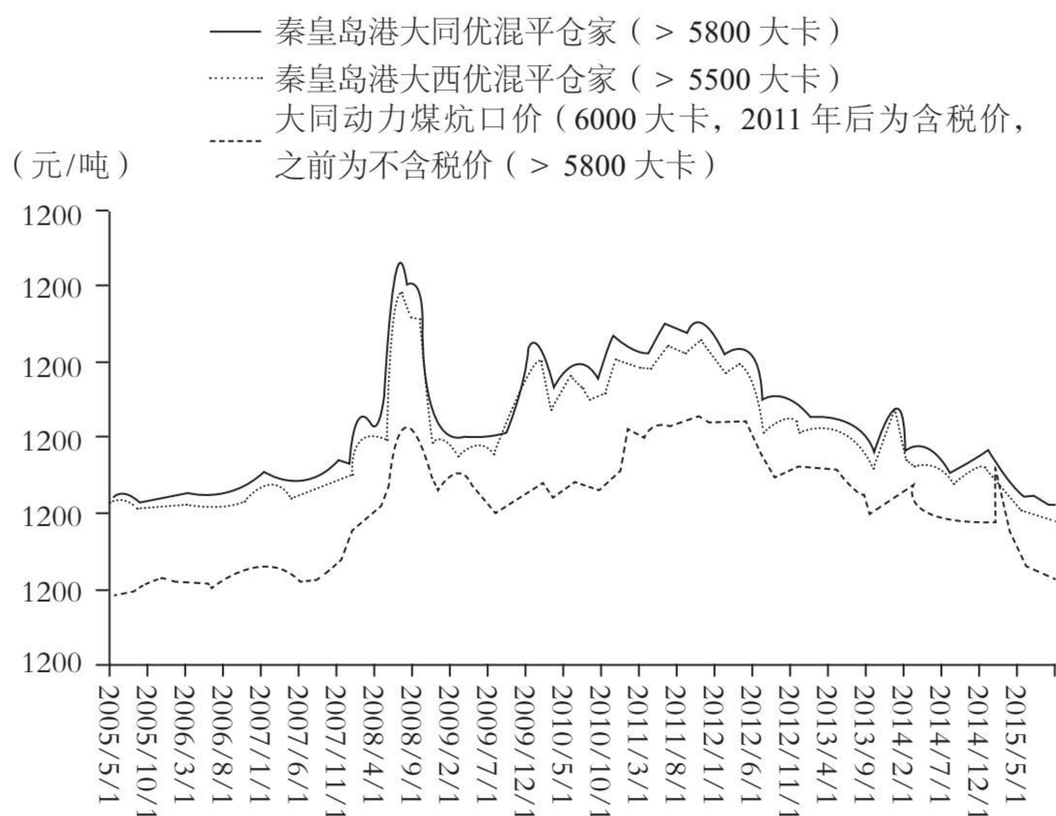
说明：在可以统计的7年时间里，9个OECD国家的一个小市场空间，仅直接投资的资本流量达到8736亿美元，而同一时期，全球以直接投资呈现的资本流量是1.8万亿美元。直接投资仅仅是资本这一大蛋糕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可以评估全球资本总规模所能达到的程度。



图7－1 2011年至2015年石油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

说明：资本过剩对各种市场的冲击形式，主要就是价格的大幅震荡。以石油价格为例，2008年之后，原油价格曾经一度看高到100美元/桶，这个期间的石油价格吸引了大量资本的进驻。此后，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疲软为借口，大量资本又突然撤离石油市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一落千丈，最低曾经被看低到20美元/桶。如此之大的价格震荡，对俄罗斯以及OPEC等产油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能源巨头的损失惨重。



数据来源：煤炭资源网

说明：煤炭价格是另一个典型例子，在城市化的高峰期，中国的煤炭价格高企，制造了众多的亿万富翁，人们将这些搞煤炭生产的富翁称之为“土豪”，他们以阔绰而嚣张的消费方式引人瞩目。曾几何时，中国的城市化因债务、城市病和土地等问题的拖累，发展速度减缓，导致煤炭价格一落千丈，资本纷纷离开煤炭行业，使得全行业陷入萧条。原本的煤炭大省山西，因为煤炭资本的加速撤离，导致全省经济增长率在2014年从原来的全国第20名左右的位置，迅速跌落至全国倒数第一名的位置。单一经济的弊病，一目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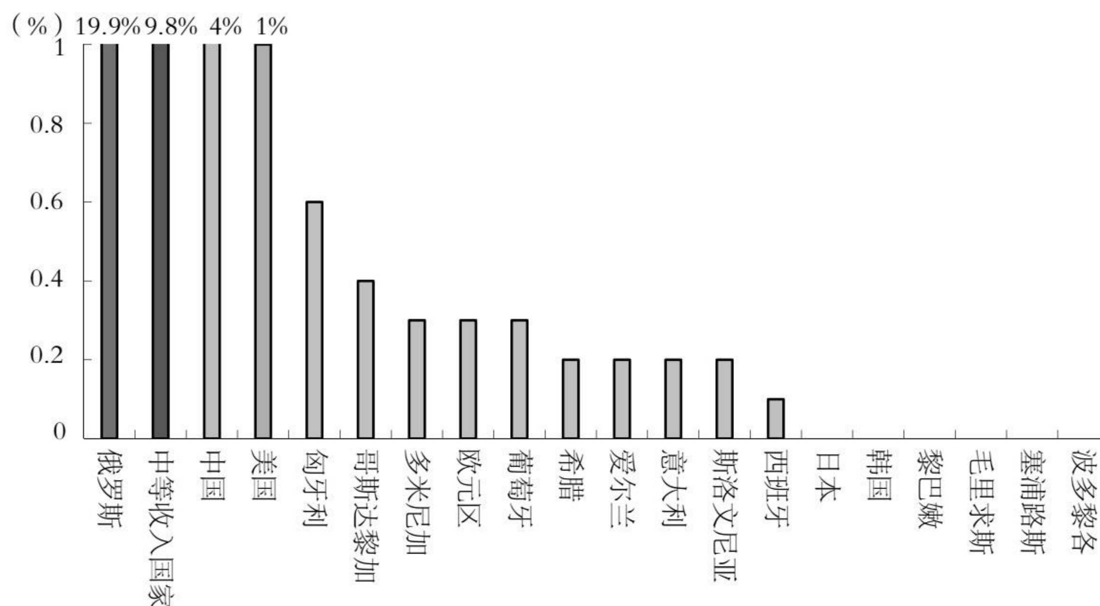


图7－3 自然资源总租金占GDP比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12年

说明：运用“危机三角”和资本过剩原理，可以比较方便地进行世界金融危机预测。通常一国的财富，要么来自资本，要么来源于自然资源。利用自然资源总租金的数据可以发现，占GDP比例很低的国家，通常财富来源不是自然资源，更多的是资本。如果原有产业一切顺利，市场变化不大，则并无问题，一旦市场出现严重竞争或是过剩，则会立即爆发危机。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处于资本过剩的高风险阶段。用这样的原理进行危机预测，根据世界银行的自然资源总租金占GDP比例数据，大家可以发现，从匈牙利到波多黎各，很多国家均处于危机爆发的高风险阶段。其中的部分国家，包括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等国已经爆发了金融危机。至于中国，大家可以自己想象。有趣的是俄罗斯的数据，因为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冲突，俄罗斯在世界金融市场遭遇到了重重围堵，却依旧挺立，原因其实就在于它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仰赖资本，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总租金占GDP的比例高达近20%。

1. 《林毅夫：当年4万亿说法错误实际投资乃30万亿》，网易财经，2015年3月27日，http://money.163.com/15/0327/22 /ALOG7HUC002555CK.html。

2. 有趣的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占主流的学者反而认为中国股市不会上涨。——作者注

3. “改革牛”是指，中国股市起于2014年7月的一轮大牛市。提出者一般认为是国泰君安的任泽平，支持者如《证监会主席肖钢赞同A股上涨是“改革牛”》 一文，CCTV官网，2015年3月11日。——作者注

4. 资本过剩环境中，股市的动荡是最为常见的现象，这是资本过剩所引发的必然反应。事实上，资本大量流向哪里，为哪里带来上涨的同时，就可能产生灾害。这不是正

常的上涨和下跌，源头并非是资产的价值出现改变，而纯粹是因为资本的流动所造成的问题。——作者注

5. 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2014年秋拍“全景图”》，2015年1月23日，http://amma.artron.net/observation_ shownews.php?newid=706602。

第八篇
从“危机三角”到乌托邦

> 未来的世界究竟会怎样？
>
> 对于这个问题，悲观是有理由的。我们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明显的死循环，在无解的道路继续盲目前行，能否蓦然回首，重归理性轨道，要靠世界各国政治家们超脱于政治形态和政治目标的超前努力。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要从灾难的轨道中真正挣脱出来，完全要看世人的自省和良知。这是哲学，也不是哲学，它就是当今的现实。

资本泡沫是经济学框架下对现阶段资本过剩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一直在沿用，从克鲁格曼开始触及此问题到现在，始终如此。而现有的经济学对于资本泡沫的形成根源和机理，一贯地轻描淡写，似乎它是自然而然经由人们的推波助澜而形成的。与理论相对应的是现实世界，2008年的美国、2015年的中国，还有欧洲一直在持续的危机，这是一个世界性危机的有机整体。这是一轮因城市化而起的世界性资本过剩的危机，首先发端于欧美，欧洲是因为欧元化，美国是因为新经济，此后扩大到“金砖四国”，再扩展到整个世界。

如何让全球经济实现再均衡？

资本过剩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过量资本，这些以个人财富、集团财富和政府财富表现的过量资本，在自由流动的前提下，造成了市场的重大波动和震荡，引发全球性的各种危机。削减和冲销这样的

过量资本，对个人来说，是财富的损失，这当然会进入到另一个议题；对世界来说，则是市场秩序的回复，真实价值的重现。如何削减和冲销资本过剩，在现有世界政治、社会环境下，在市场自由主义精神大行其道的今天，确实是一个极为困难的挑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过“资本税”的概念，只是他也没有多大的自信，所以加了很多的“免责声明”。他首先指出，“这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很难想象世界各国近期能够在这一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因为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适用于全球财富的税收安排，然后决定如何分配税收收入”。皮凯蒂所建议的“全球资本税”，根本目的还是打破金融资本主义的支配权[注]，因为他的研究焦点在于，资本主义依旧在制造不公平的经济环境。但无可否认的是，虽然目的不同，皮凯蒂创议的梦幻级“全球资本税”，对于削减全球性资本过剩，同样也是有帮助的。

为了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均衡，除了皮凯蒂的创议，世界各国的政府也在不经意间做出努力，有些还往往出人意外，如战争和经济危机，如通胀和通缩，还有诸如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等等。但如果要让看似几乎不可能的全球再均衡真的实现，就需要高烈度的再均衡实现方法，无可避免地涉及如下三个主要途径[注]。

第一是税债和资本的大规模“报废与中止”。

税收的方法是皮凯蒂那样的经济学家所提倡的方法，除了“全球资本税”之外，其实全球债的发行也是可以考虑的世界性选择。全球债的意义在于，吸纳过剩的世界资本用于世界福利，用于贫困国家的发展，降低因贫困导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目前，世界存在一些运作良好的具有世界性和区域性特点的金融机构和组织，如世界银行等。如果政治共识能够达成，则未来实现的可能性远比“全球资本税”要大。

资本的“大规模的报废与中止”，意思是中止世界各国对开发项目的狂热追求。这需要全球金融界构建全新的货币金融学视角来看待发展问题，正视城市化的浪潮造成了严重的资本过剩。这样的设想，在很多国家不具现实意义，但在某些国家则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在20世纪的中国，在朱镕基任国务院总理的时代，就曾动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中止了当时中国普遍的“开发区热”，稳定金融体系。这样的做法虽然会造成一些所谓的资本“浪费”，但从远期看，实际确保了未来市场的真实价值体现，奠定了发展基础。所以，中国20世纪末的政府试验，对全世界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注]。

第二是福利全球化。

世界银行2013年4月17日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称，发展中国家极度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开始持续上升，稳步接近世行日均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1981年到2010年，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了59%，但生活在每天1.25美元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比例已从50%显著下降至21%。报告显示，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前3位的国家和地区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和中国。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的比例30年来有所上升，而中国这一比例从1981年的43%显著下降至13%。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极度贫困人口仍有12亿人之多。尽管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极度贫困率迅速下降，但世行估计，到2015年仍将有9.7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

全球化成功带来了制造业的全球化以及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现在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将福利全球化，使其遍及世界的每一个偏远角落。这当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发展水平和文化环境的冲突，成功实现极为困难。不过，福利全球化的意义甚大，绝非到处“撒钱”那般简单。福利全球化不但是一个倡导，更是一种改善全球资本环境的有益举措，它可以让过剩资本带来的产能造福于世界的贫

困角落，将原本掠夺式开采的自然资源，善加利用，同时降低世界的族群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

第三是世界范围的货币改革。

货币改革通常包括区域货币以及本币改革。有效的区域货币在理论上可以带来相对一致的发展水平，尤其是避免竞争性货币政策造成的资本过剩。所以货币区是今后世界的一个重要货币改革方向，虽然欧元区依旧举步维艰，但其尝试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尤其是如果能消除货币区刺激投资狂增的隐患，则这样的货币改革即便不能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也会有助于其改善。

货币改革成功的样本在德国。

“二战”后的德国，面临严重的资本过剩，表现为通货膨胀。战后的1948年，德国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由于战争的大面积破坏，制造业产量不足1936年的60%，人均实际消费水平仅约为1936年的三分之二；大部分日用品严重匮乏。而且，战争借款使“第三帝国”的公债在战后几乎达到了1939年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的400%，并导致了数额巨大的过剩变现能力。帝国马克（RM）已丧失作为交换手段的作用，易货贸易已成为日常的交易形式。黑市交易逐渐破坏了物价、工资管理以及商品生产与分配体制。能够刺激人们为赚钱而工作的机制已荡然无存。一般市场上的进口商品很快就会被一抢而光，由于外汇收入必须兑换成帝国马克，致使出口也变得无利可图。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美国的经济学家为德国设计了著名的“科尔姆-道奇-戈德史密斯计划”。这些金融政策的天才设计者们注意到1935年至1945年间非银行部门的现金和活期存款（M1）增长了近500%，而同期GNP却下降了40%多。这种货币供应的急剧增长自1939年起还伴随着价格和工资的冻结以及配给制的实行，其结果是出现了大

量的过剩货币。为了恢复到被认为是正常的1935年的水平上，M1不得不下降90%。因此，金融改革的设计师们建议1个德国马克兑换10个帝国马克[注]，以期把当时的价格水平改变为新的、均衡的价格水平。这一货币改革的结果获得了空前成功，让德国经济在战后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复兴和发展。

此外，布雷顿森林协议也属于货币改革的范畴，有鉴于现实世界的危险性，未来“新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也是令人期待的货币改革。而在这当中，像原来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达成过程一样，世界各国政府的发挥空间很大。

长期以来，政府的作用是令人质疑的。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等自由竞争的信徒，更是将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相信自由市场是万能的。虽然事物从来都具有两面性，这就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解释空间，同一事物总能从另外的一个逻辑角度进行解释；不过，现实就是现实，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可阻挡，在可以预料的将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将会变异成为一种社会福利组织。而对一个社会的发展环境，尤其是金融资本环境而言，这样规模巨大的社会福利组织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问题只需要转换一个视角来看。

其实，政府在一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好坏成败取决于范式和标准。我们的世界，的确存在所谓“好”的政府，也存在所谓“坏”的政府，我们可以质疑“好”与“坏”，但不能质疑政府——这一日渐转向为社会福利组织的公共机构。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规范运作以及各种社会标准，而这是政治哲学，也是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事情。

从“危机三角”的角度来看，政府本来就是始作俑者，祸起萧墙的无数资本和投资都源自于它，但同时人们又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政

府这一公共机构的身上。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的机制有时是失灵的。而对于市场失灵，主流经济学也是承认的，但将其主要归咎于不完全竞争、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交易成本以及偏好不合理的条件性原因，此外还有收入分配不公、经济波动失衡等因素。问题在于，这些条件和因素能够完全依赖自由市场本身加以解决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对于政府这一“社会福利组织”的期待[注]，就源于此。

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商人都会告诉你，追逐利润，越大越好；对于投资，也是越大越好，与理论值相反的过量和过度，这是自由市场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利率那根曲线不断上下波动，也正是因为如此。实际上，受到自由市场信徒疯狂吹捧的体系，更适用于激励人们的狂热，而不适用于抑制风险。理性永远属于冷静，而不属于激情燃烧。资本这个自由市场的产物，激励了自由市场中无尽的欲望，而资本冗余的消化，债券等金融产品，往往同时又创造了更加多的天量资本。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需要一个起码是持有限中立态度的角色来平衡，而这个角色只有政府组织这样的公共机构才能扮演，尤其是在它渐渐真的成为一个社会福利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部门之后。

“马歇尔计划”创造了“二战”之后欧洲复兴的奇迹[注]，但没有世界政府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马歇尔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进入21世纪，我们这个世界还需要更多的“马歇尔计划”去造福世界，造福那些依旧贫困不堪的国家和苦难民众，世界需要“马歇尔计划”这样的区域战略工具。但谁能妥善地执行“马歇尔计划”呢？依然只有世界各国的政府组织。所以未来世界的政府组织运作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世界的稳定和经济健康。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合作的时代。

最后还有几个问题，我们要在这本书的最后阶段进行讨论。

首先，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的基础是资本世袭的力量，这是新马克思主义论述的一个新进展，也是他要求实施全球资本税的基础。世袭的力量依旧有效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但问题是什么创造了世袭财产？皮凯蒂的世袭财产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财产？确保世袭财产能够继续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就在本书之中，世袭的财富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与世界范围内的“造城运动”有关的。

其次，世界必须理解寻求新市场空间的努力。从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到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是寻找新空间的努力。西方国家对此抱有本能的怀疑，这种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怀疑可以理解，但世界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寻找市场新空间的努力，同时也有助于缓解世界性的资本过剩，这是西方政治家目前没有能力理解的事情[注]。事实上，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都与非洲大地存在关联，西方世界恐怕今后不得不正视这一市场空间的需要和存在。

最后，本币升值并不能真正解决世界的问题。人民币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迫于国际压力而进行了过分的升值，很快，美国也将面临本币升值的挑战和压力。如美国因美元升值导引全球浮滥的资本迅即流入美国，实际相当于再度释放一个新版QE，这样导致本币升值的货币政策，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全球浮滥的资本依旧普遍存在，而且表现更为剧烈。因为大量的资本拥挤在越发狭窄的管道中，“激流现象”势必越发汹涌澎湃。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可能仅是一个表面化的假象。因为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经济不可能好转，经过复杂的传导之后，最终回过头来还会抑制美国经济。

未来的世界究竟会怎样？

对于这个问题，悲观是有理由的。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一轮明显的长周期危机，正处于一个明显的死循环当中，在无解的道路继续盲目前行，能否蓦然回首，重归理性轨道，要靠世界各国政治家们超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的超前努力。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要从灾难的轨道中真正挣脱出来，完全要看世人的自省和良知。这是哲学，也不是哲学，它就是当今的现实。

---

1.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2. “危机三角”是一种自由市场的困局，至少目前还没有真正可行的现实解决方案。而本书的根本目的也不是在于提出解决方案，重点是在于解释城市化与全球资本过剩的关系，以及可能造成的全球性市场危险局势。——作者注
3. 塞浦路斯在发生危机时刻的政策，也是“报废与中止”的典型一例。政府的危机政策各不相同，但基本都是对资产的大规模冻结、中止、冲销和减记，目的都是压缩资本规模，使得危机处于可控制的范围里面。——作者注
4. 托马斯·马杰和冈特·塔曼：《激进的币制改革：1948年的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局，唐文华译，http://www.cfeph.cn/cfeph/finance.nsf/102009b942ff9046 4825672e001acac8/bce811f3d0c889eb48256823000875ae?OpenDocument。
5. 陈功：《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创新》，这一研究报告源于中国财政部的项目。作者认为，政府的演变趋势是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公共福利组织。——作者注
6.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笔者提出，马歇尔计划在战略研究领域可以视为是一种战略工具，这一战略工具的运用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作者注
7. .直到目前，由于理论上缺乏系统性，中国自己也没有理解“危机三角”的意义，因此仅仅强调“全球治理”的概念，而在市场空间方面，继续直接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发生对撞，而未能站在寻求世界共识的高度，进行充分的国际协商。——作者注